

專案研究報告

---

# 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 之研究

研究主持人：王信賢教授

協同主持人：張弘遠教授

張執中教授

研 究 員：李宗義

研 究 助 理：翁秀菱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〇 年 十 二 月



# 專案研究報告

---

## 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 之研究

研究主持人：王信賢教授

協同主持人：張弘遠教授

張執中教授

研 究 員：李宗義

研 究 助理：翁秀菱

本報告純為學術研究，不代表委託單位立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〇 年 十 二 月



## 摘要

隨著大陸經濟成長，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已經成為最引人關注的群體之一，而其所帶來的影響，勢必牽動中國大陸整體的發展與穩定。本文從文獻回顧出發，根據中西方學者對於中產階層的定義，深入探討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在當前社會的定位，以及政治、社會與經濟效應。我們認為當前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在政治態度上是保守的，在社會上是活躍的，而在消費上也是保守的，這三種態度彼此交雜在一起，衍生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效應，那就是中產階層與黨國體制結合成和市場體制不相容特殊群體，這樣的群體隨著市場化與階層持續深化，勢必成為妨礙中國進一步往前進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中產階層在社會上的活躍，會讓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更難以控制社會的自主性，短期來看雖然執政權相當鞏固，當長期卻難以封鎖民眾自由選擇與自主的意願。經濟上，雖然中產階層在消費面與供給面刺激了整體經濟，但動能明顯不足，這也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隱憂之一。最後，我們認為中產階層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能夠有效扮演傳達臺灣民意的角色，讓大陸民眾更貼近臺灣，也更瞭解臺灣，對兩岸的發展除了經濟上的助益，也有政治上的正面效果。在政策建議上，我們希望政府建立追蹤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長期研究小組，持續掌握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與消費興趣，而且不單單將中產階層視為經濟的動能，也應該視為兩岸政治交流的催化劑，讓臺灣的公民文化影響大陸的中產階層。



#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文獻分析.....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流程與章節安排.....	11
第二章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現象分析與理論對話.....	17
第一節 從計畫體制到市場經濟.....	17
第二節 中產階層的類別與規模.....	21
第三節 中產階層興起的效應.....	29
第三章 中產階層對中共思想理論的衝擊與政治影響.....	39
第一節 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意識.....	39
第二節 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	46
第三節 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機會結構.....	57
第四章 中產階層對大陸社會的影響.....	61
第一節 中產階層的價值觀與消費.....	62
第二節 中產階層過度集中、城市環境與物價.....	69
第三節 中產階層與社會組織、社會運動及網際網路.....	74
第五章 中產階層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	89
第一節 中產階層消費能力的發展與對經濟之影響.....	89
第二節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消費型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93
第三節 中產階層的興起與經濟過熱.....	103
第六章 結論.....	109
第一節 中產階層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中的角色.....	109
第二節 中產階層興起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118
第三節 政策建議.....	122
參考文獻.....	127
附錄一 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之研究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143
附錄二 中產階層興起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影響訪談紀錄.....	155

## 表圖目錄

表 1-1	中國大陸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	6
表 2-1	中國大陸學者對中產階層的分類與規模估計.....	28
表 2-2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類型與政經效應.....	32
表 3-1	2002-2008 年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發展狀況.....	50
表 3-2	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	52
表 5-1	中國大陸歷年 GDP 指標.....	105
圖 1-1	本研究流程.....	14
圖 1-2	研究議題概分圖.....	15
圖 2-1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與市場轉型時期的階級分類方式.....	18
圖 2-2	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	30
圖 4-1	1978-2007 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長.....	69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市場化改革，中國大陸正進行一場劇烈的政經社會變遷，這個以「經濟改革」為核心的變遷，也對社會結構產生極大的衝擊。而時序進入 21 世紀，中國社會更已經步入了急劇變遷和快速發展的時期，正如同中共官方所言：「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中共中央，2006）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特徵。急劇的社會變遷給中國社會造成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社會的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關係更趨複雜；不同利益主體對發展與變遷的社會預期普遍提高，對自身利益的保護意識日益增強（李漢林、魏欽恭、張彥，2010：121-143）。這種劇烈社會結構轉型最為明顯的就是中產階層的出現。

關於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極具爭議性，也存在多樣性的定義，光就名稱來看，包括中產階級、中產階層、中間階層及中等收入階層等。其中，中產階級適用於階級分析的研究中，階級分析一方面較強調來自經濟不平等的面向，特別是馬克思（Karl Marx）所主張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另一方面則是較強調社會結構的「僵固」，較少顧及上下垂流流動的可能。而中間階層則是相對於上、下階層而言，定義較為模糊；中等收入階層專用於以收入作為分層的研究，過於單一。

相較於此，中產階層之意涵較為謹慎，包括了教育、收入、生活習慣與政治態度等。一般而言，現代社會的中產階層成員首先應該是從事「白領」職業的人，經濟收入應該保持在中等以上的收入水準，代表著社會主導價值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其消費習慣、審

美品味和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共同構成了中產文化；中產階層成員具有共同的身份認同，此外，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態度較趨向於溫和的改良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他們通常不會支持極端的、激進的政治行動（如革命、暴力、造反等），而是主張漸進的改革模式，對新事物和新變化採取開放的、寬容的、相對主義的態度，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傾向被認為是社會穩定以及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李春玲，6：25-32）。因此，為了定義與語意的統一，本研究以下統稱中產階層。

關於中產階層，中國理論界主要有三種劃分方式，一是從社會資源分配的角度進行界定，是根據職業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分類標準；二是從經濟角度進行界定，以收入和財產為標準；三是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界定中產階層。中產階層只是一個模糊的相對概念，與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之間並沒有一條清楚的界線。其劃分的標準主要是收入水準和財富擁有量，同時兼顧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會心態及價值觀念等因素（葛楠，2010：56-57）。關於此，本研究將於第二章進行更深入的說明。

階層理論提醒我們：一個人在社會上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及權力，將影響他所處的結構位置，因此當行動者所擁有資源發生改變，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也會隨之改變，產生社會流動。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啟動了新一輪的工業化，整個社會勞動力與人才流動加劇，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第三產業對於專業人才的需求也促使中國出現了一批新的商業菁英（business elite）。隨著經濟成長越顯著這批人的數量就越大，當他們當收入達到一定的水準

跨過理論對於中產階級所界定的門檻，也就成了一般所定義的中產階層。根據統計，2002年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約8,000萬人，到了2005年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GSS）的綜合分析，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為23%左右，<sup>1</sup>雖然從比例來看距離已開發國家還有一大截，但是從絕對數字來看卻已經是將近三億人口成為中產階層，這也使他們成為一個中國最龐大一個利益集團。

眾所周知，中產階層最早為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的產物。而後中產階層的發展過程也出現在很多後發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如同本研究所關注，隨著中國社會198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變遷，中國的中產階級問題在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背景下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產階層的發展及其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將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與未來發展。就理論看來，西方學界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尤其是李普賽（Seymour Lipset）1959年的研究問世後（1959：69-105），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即成為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以西歐經驗為張本，認為經濟成長將會帶來社會結構的重組與社會價值的多元化，進而出現獨立而強大的中產階層，其對政治參與的提高將會帶來政治民主化，而此即是所謂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論述（Moore, 1966；Huntington, 1968；Rueschemeyer and Stephens, 1992）。

---

<sup>1</sup> 關於中國中產階層的估計方式與結果不一，此部分將於第二章詳述。

然而，問題在於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不斷走向成熟的背景下，中產階層形成的二、三百年歷史，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產生和逐步發展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中國中產階級是被一種急劇的社會結構變動「催生」出來的一個群體，這種時空條件下產生的中產階層以其所產生的效應是否與西方經驗相同是值得考量的（李路路、李升，2007：15-37）。因此，本文關注的問題是：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現象該如何解讀？其興起是否如西方現代化理論所預期的，將是政治民主化的先聲？亦或是其代表社會更加穩定，使共黨權威進一步鞏固？此外，由於此種社會結構變遷可能成為政治轉型的基礎，因為改革即是利益重分配的過程，其分配的規則與結果隱含著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所以，本研究會將重心放在中國大陸中產階層興起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影響，並說明中產階層的出現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將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對兩岸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文獻分析

當前關於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變遷與中產階層興起的相關研究豐富，本研究歸納「中產階層的定義」、「中產階層的形成」以及「市場轉型的辯論與階層再生產」等方面進行說明。

### 一、中產階層的定義

目前學界通常以四個標準來界定中國的中產階層，分別是收入、職業、教育與消費及生活方式，此部分的界定逐漸揚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分析，引入韋伯（Max Weber）學派的觀點，也符合當前國際研究的趨勢（Wright, 1985, 2000a, 2000b）。大陸學者李春玲認為，至少存在著三種主要的中產階層定義：公眾的描述、政府

的定義以及社會學者的中產階級概念。公眾的描述以收入、職業及教育做為分類標準，中產階級應該受過高等教育，收入較高且穩定，從事專業技術性工作或管理工作，但實際上這種分類是中產階級中的少數上層；政府對中產階級的定義主要依據收入標準，但收入劃分的標準有極大差異，從年收入 5,000 到 30,000 美元的分類方式都有，而且此一分類方式由於地區和城鄉收入差距大，未能獲得廣泛的認同；社會學者的中產階級概念則認定中小企業主、自僱傭者和小業主以及普通的白領受雇者是中產階級，但此分類方式呈現中產階級已占中國總人口的 25% ~ 30%，此數據不易為他人所接受（李春玲，2011a：78-79）。

張宛麗等則認為中產階層，是指擁有一定私人生產資料的自雇者和中、小雇主群體。其特徵為佔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資本和職業聲望資本、從是腦力勞動、靠工資及薪資為生、具有謀取高收入及良好工作環境的職業就業能力、對其工作對象有一定支配權、具有維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消費能力及閒暇生活質量、具有專業知識對社會公共事務形成權威評價，以及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張宛麗、李煒、高鴿，2007：11）。周曉虹從建構自我認同或贏得社會認同的心理機制來定義中產階級，群體透過體現生活方式改變的消費習慣來建立認同感，這是由於市場經濟逐步確立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分層邏輯的變化，階層地位是以財富的多寡及消費層次的高地來決定（周曉虹，2010：65）。

## 二、中產階層興起與形成

這類的研究多圍繞在「中國究竟有無中產階層出現」，其中以北京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斷裂論」最具代表性，其在《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一書（2004）中認為，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以來中國社會變遷意義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結構的劇烈、持續、深刻的變化，並以「轉型與斷裂」的概念來表明中國大陸目前上、下階層斷裂的現象。換言之，在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出現「領先群」與「落後群」間的「斷裂」（孫立平，2004），甚至領先群內部形成了掌握組織資源的「政治菁英」、掌握經濟資源的「經濟菁英」以及掌握文化資源的「知識菁英」三者結盟的狀態（康曉光，2002：1-15；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2002：27），就此而論，中國並未出現真正的中產階層。此外，大陸社會目前還是以農民和工人占絕大多數的社會結構，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統計，直至2010年底農村人口為6億7414萬9546人，佔總人口的50.32%，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仍然保持著低收入、低文化水準和低生活品質的狀態，要發展成為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表 1-1 中國大陸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

三層結構	改革利益重組	各階層位置
菁英	特殊受益者	政治菁英：各層級黨國中高級官員
		經濟菁英：國有企業大型事業單位幹部、私營企業主
		知識菁英：知識份子與專業技術人員
中產層	普遍受益者	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
	相對被剝奪者	產業工人、農民
社會底層	絕對被剝奪者	企業下崗職工、貧困農民、大多數少數民族

資料來源：王信賢（2002：5-21）。

然而，根據李春玲（2011a：80-81）的研究，當前中國確實存在著一個上層階層（社會精英群體），它主要由黨政高級官員、大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經理人員、大企業主和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高級知識份子等組成。但中產階層的興起確實是改革以來的一個重要特徵，此中產階層包括了四個群體：企業主階層、新中產階層、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新中產階層內部又可進一步區分為兩個群體：公有部門的新中產階層，和非公有部門的新中產階層。從 1982 年到 2006 年，城市新中產階層約有 10% 增長，老中產階層從無到有，比例增長超過 10%，其數量增長迅速並保持相當規模，是大陸中產階層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中國大陸，新中產階層與老中產階層在共同增長。同時，邊緣中產階層的數量增長也很明顯，也大約是 10%。邊緣中產階層是新中產階層和老中產階層的後備力量，他們的數量增長也預示著中產階層數量還將持續增長，與此相應的結果是，工人階層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持續下降。

就此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社會變遷，出現了較明顯的社會流動現象，主要的動力源於市場機制的引進。舊有的社會結構與新機制之間的互動，究竟是社會結構在適應市場機制，還是市場機制在適應社會結構？固有資本與新興資本之間的關係為何？兩者是否會對社會分層級流動造成影響？關於此，多數學者集中在市場轉型與階層再生產研究，討論市場機制及教育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 三、市場轉型辯論與階層再生產

#### (一) 市場轉型研究

中國大陸社會流動主要動力來自市場轉型，市場機制可能造成人員地區之間的水平流動，也包含在同一地區的不同工作群體或組織之間的流動；市場機制同時也擴大了社會垂直流動的可能性，使社會底層的人有機會藉由教育、技術及經濟條件等，上升至中、上階層，但市場轉型是否真能打破上層及下層之間的壁壘仍存有爭議（邊燕杰，2002）。

倪志偉提出「市場轉型理論」，論證社會主義國家中市場機制的引入將改變再分配機制，政治資本獲得經濟回報的能力將相對下降，人力資本則相對升值（Nee, 1989:663-681; 1991: 267-282; 1996: 908-949）。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不僅受到西方中國研究者的關注，亦引發了美國社會學界對此議題的爭辯，此直接導致《美國社會學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在1996年8月號以此為專題開展了一場關於中國「市場轉型與社會後果」的大辯論，不少學者質疑倪志偉的論證與研究成果，而與倪志偉系出同門的 David Stark，其東歐轉型研究所強調的「路徑依賴」正好成為學者補充倪志偉「市場轉型」的素材（David Stark and Laszlo Rruszt, 1998）。Szelenyi 與 Kostello（1996：1082-1096）在還原其理論後認為，倪志偉的市場概念過於籠統，市場轉型有其階段性，而倪的市場轉型理論只適合解釋「重分配整合經濟的地方市場」這個短暫的階段，此外，必須將幹部區分為掌握政治權力運作者與技術官僚，在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經濟體制中，雖然市場為社會分層的動力，但由於路徑依賴的結果，原



有的技術官僚仍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獲得極大的利益，更加深社會的不平等。

此外，William Parish 與 Ethan Michelson (1996: 1042-1049) 則是以《政治與市場：雙重轉型》為題，說明政治與路徑依賴等在市場改革中的重要性，其認為在市場轉型過程中亦存在著政治市場，不同部門與人群間的政治關係中往往存在著議價機制，換言之，市場轉型的制度形式不只是經濟現象，而是有其政治邏輯的；在實證研究方面，其一方面肯定倪志偉針對市場發展與人力資本經濟回報間的正相關之主張，另一方面則反駁倪志偉關於幹部權力與收入的論述，William Parish 認為掌握權力的幹部其所獲得的經濟回報都是正面的，故幹部的收入優勢一直是存在的。而 Andrew Walder (1996: 1060-1073) 則批評倪志偉自詡為制度論者，但在其市場轉型的研究對產權與相關制度的探討卻是付之闕如，且將經濟成長與市場發展混為一談，再加上忽略政治因素，使其理論與現實的斷裂愈加擴大。

張歡華 (2007) 認為市場轉型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社會的狀況，幹部的權力並不僅僅只是再分配權力，且再分配權力是可以轉化的，因此不必然會造成政治資本的貶值；收入與個人人力資本之間的相關性也顯示教育的回報率偏低。不同的市場部分有不同的人力資本回報率與政治資本回報率，因此無法普遍性地證明人力資本與政治資本相對的消長關係。無論是人力資本或政治資本，由於不同的市場部分有不同的回報率，再加上城鄉二元、單位結構等固有的制度限制，期望藉由個人的教育、技術及經濟條件等（即人力資本）從社會底層垂直上升至中、上階層，仍存有許多困難（吳曉剛，2009：60-84；李煜，2009：88-113）。

## （二）階層分析或階級分析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從階級分析轉向分層研究，但基於研究中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需求，有學者呼籲重返階級分析（馮仕政，2008：203-227）。沈原（2006a：23-25）認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問題，是由於社會安排和社會框架發生劇變及重構，要理解這些變化必須以階級分析反映其特殊視角，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後，出現多種經濟成份及資本力量。基於對社會的認識及價值判斷，仇立平（2007：31-38）主張社會穩定時期是用階層分析，反之則採取階級分析，而現階段中國的社會變革屬於緊張時期，適用階級分析。相對於仇立平採取階級分析的原因，孫立平提出重返階級分析的理由是因為中國社會結構已定型為「斷裂社會」，階層之間的邊界明顯和階層內部的認同度較高，因此階級分析比分層研究更適用於現階段的中國社會。針對此，本研究認為「階級分析」，雖也符合當前中國社會的現況，但其往往過多地強調「不平等」與「衝突」，反而忽略了社會結構轉型的客觀分析，故本研究仍採「階層」界定之。

## （三）階層再生產研究

如果將孫立平定義的上下階層理解為菁英與非菁英，也可發現中國社會存在菁英與非菁英的斷裂現象。菁英與非菁英的社會垂直流動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變化，在中國國內外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Walder, Li, & Treiman（2000）等將中國菁英階層分為幹部菁英及專業技術菁英，幹部菁英掌握再分配權利，而專業技術菁英則擁有技術條件。他認為通向這兩種菁英的途徑是分離的，幹部菁英要求的是政

治忠誠，先決條件是黨員身分；高學歷則是通往專業技術菁英的先決條件。魏昂德主張這兩種菁英在代內是分割的，文化資本與政治資本之間無法轉化，因此中國的政治秩序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然而鄭輝和李路路認為菁英形成的方式無法解釋菁英是否是分割的，應該從代際流動上考察，中國菁英實際上在代際流動上互相轉化，彼此之間並不排他及內固，因此菁英群體間並非分割，而是相互結盟的狀態(鄭輝、李路路，2009：67-68)。

除上述文獻與觀點爭辯外，還有關於「中產階層興起的效應」，此部分將於第二章說明。從上述的文獻我們可明顯發現，中國大陸市場轉型與社會變遷的形成交纏的關係，而巨大的社會結構轉變也可能成為政治轉型的基礎，因為改革即是利益重分配的過程，其分配的規則與結果隱含著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改革、政治統治和社會穩定是「三位一體」的概念。也因此，有必要深入觀察中國大陸中產階層興起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效應。本研究將在上述文獻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中產階層興起所可能產生的效應進行評估，其中包括社會結構的變遷、各式社會組織的湧現、社會抗爭的頻仍，對中共意識型態建構的影響以及所帶來的政治效應、民眾消費行為的改變等。

### 第三節 研究方法、流程與章節安排

#### 一、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研究議題涉及中國大陸整體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其性質融合學術與政策研究，為能有效掌握各項因素進而提出具

建設性之建議，本研究除針對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與整理外，亦輔以田野訪談以及召開專家座談，期能達到相輔相成之效。

### (一) 文獻分析

此研究方法主要在於以各種文獻作為分析的對象，進行內容、歷史或是文獻的分析等。此方法藉由「詮釋」的方式，試圖正確地理解和解釋他人的話語，並且可以配合歷史分析法，以歷史、長時期發展的角度解讀不同時間的文獻意義。藉由這些方法，可望獲得有關研究的真實情況與素材。本研究的文獻的來源主要為中(含台、港與大陸)英文書籍、期刊論文、年鑑以及「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關資料等，其中文獻的內容含括比較政治理論、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理論等。並透過前述資料與中國當前中產階層的發展與所產生的效應進行對話。

### (二) 田野訪談

構成本研究的另一重心則是實地調查訪談，本計畫赴北京與上海兩地各大學與研究機構進行實地訪談，北京方面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與社會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科院社會所、中央編譯局，上海方面包括上海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訪談的主題包括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形成機制、發展狀況與政經社會效應等。

### (三) 專家座談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召開一次專家座談，邀請國內之專家學者，包括政治大學寇健文教授、政治大學經濟系王信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林宗弘研究員以及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博士後研究員王占璽博士等，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以期豐富本研究之成果（專家座談記錄如《附錄一》）。

## 二、研究流程

如前所述，本研究將在廣泛的資料蒐集、田野訪談以及研判分析的基礎上，試圖理解 30 餘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除了快速的經濟成長外，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中產階層的出現，而伴隨此種社會結構的轉變，是否出現新社會現象、制度安排、國家社會關係的轉變，以及政治轉型的契機等。因此，本研究的流程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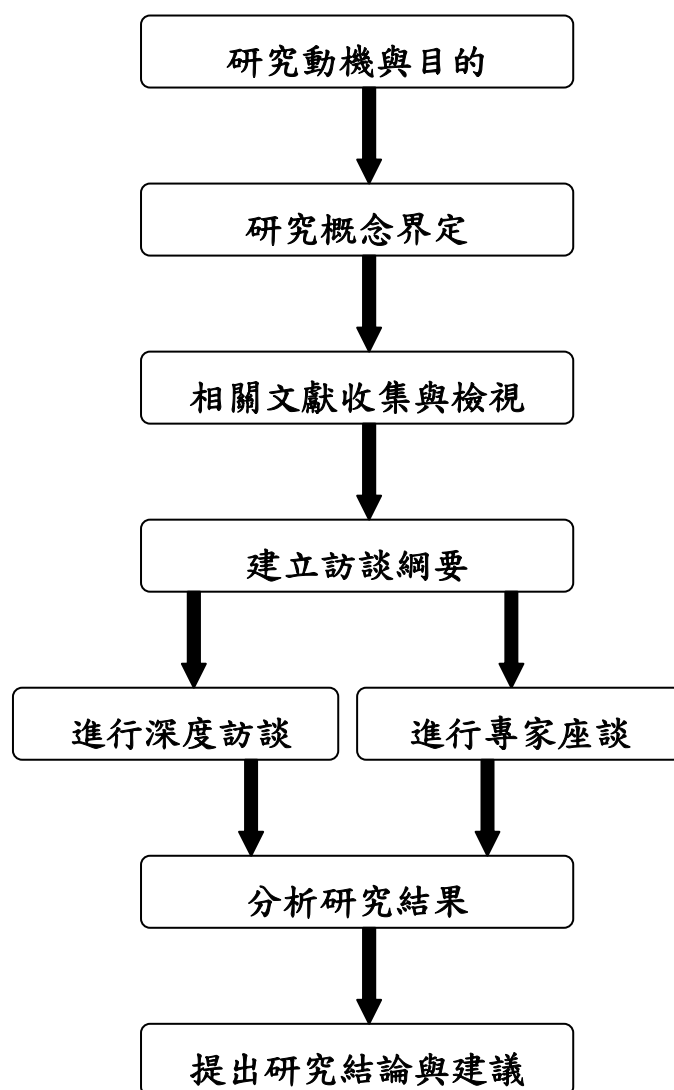


圖 1-1 本研究流程

### 三、章節安排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興起已成為一客觀的事實，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即在針對其所可能產生的效應進行評估，其中各式社會組織的湧現、社會抗爭的頻仍，都會對大陸地方治理產生影響，亦可能對台商

的經營環境造成影響；而中產階層興起所造成中共意識型態的變遷以及所帶來的政治效應、民眾消費行為的改變等都極為明顯。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此些變化雖緩慢，但對我國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析，而本研究最後亦將在廣泛的資料蒐集、田野訪談以及研判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以供政府決策參考。

若以「議題」的上、中、下游為區分（見圖 1-2），在本研究中，「上游」為中產階層的形成機制、「中游」為中產階層的分類與規模，本文第二章的內容包括這兩者，本研究的重心擺在「下游」，即中產階層興起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效應，本文的第三、四與五章屬於此範疇。因此，本研究章節安排與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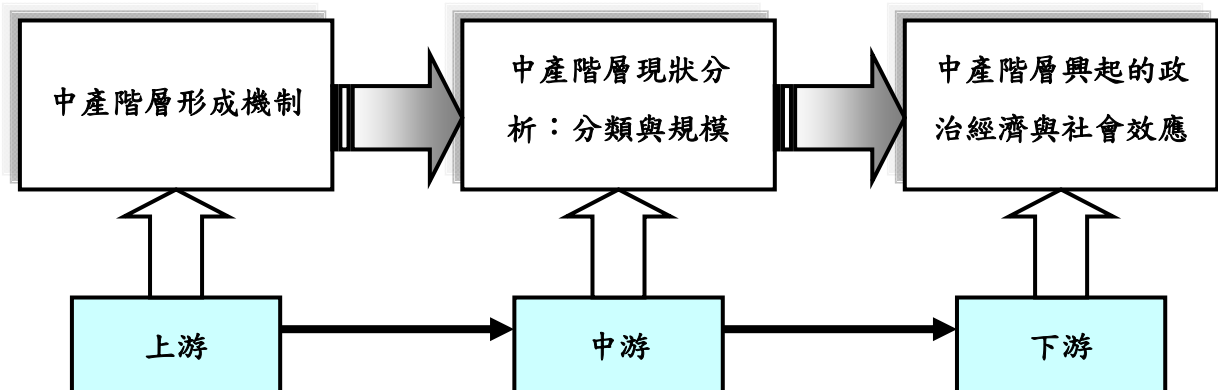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議題概分圖

## 第一章 導論

本章簡介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針對研究背景與既有的文獻進行分析，進而說明本研究的方法與流程。

## 第二章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現象分析與理論對話

本章首先說明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出現，並對與中產階層所產生的政經與社會效應相關的理論或概念進行說明，如前述之現代化理論以及公民社會等。

## 第三章 中產階層對中共思想理論的衝擊與政治影響

本章所要回答的是：大陸中產階層的興起可能產生何種政治影響？他們的出現是有利於維持社會穩定？還是有可能推進社會變革？本章依次說明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意識、意識型態話語權、私營企業主與政治參與以及政治機會結構等。

## 第四章 中產階層對大陸社會的影響

本章延續第三章所述，從中產階層的「社會影響」出發，說明中產階層內部的分化，剖析大陸中產階層多元的價值觀，並從價值觀分析中產階層龐大的消費力量現況，最終論述此種趨勢對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形成以及促發社會運動（抗爭）的可能性。

## 第五章 中產階層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

本章從中產階層對經濟的影響出發，說明中產階層的消費型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區分為供給面與需求面），並以汽車產業、服飾業、黃金產業、奢侈品以及民生必需品等。並推論中產階層的消費熱潮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可能影響。

## 第六章 結論

本章將說明中產階層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中的角色以及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最後並提出政策建議。



## 第二章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現象分析與理論對話

### 第一節 從計畫體制到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階級結構轉型，可以視為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階級結構向市場經濟體制下階級結構的轉變。在古典「蘇聯體制」中，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與指令性經濟為共產統治的兩大支柱（Walder, 1995: 1），政治與經濟間存在緊密的邏輯聯繫關係，此不僅是國家宏觀政經運作的原則，也與微觀個人身份的界定有關。在國家主義下，戶籍制度與單位體制是影響身份與階級界定的主要機制。

在戶籍制度方面，首先，戶口設定了國家及其代表機構對勞動力的獲益權。在缺乏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勞動力與其收益屬於工作單位或人民公社所有，不能自由流動或交易。其次，戶口制度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畫下明確的界限，農民無法獲得城鎮居民從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取得的工資、糧油票券、分房、醫療，以及其他各種福利，這些構成了城鎮居民排他性的權利。最後，通過計劃經濟下的統購統銷政策和農工部門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即所謂的「剪刀差」，國家由農村獲取了大量的生產剩餘，並以此提供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林宗弘、吳曉剛，2010：1-40）。

在單位體制方面，中國的單位制與社會分配以及政治穩定的關係也是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重點之一（Dittmer and Lu, 1997: 115- 122; Lu and Perry, 1997；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曉，2009：1-25）。單位的行政級別與所有制類型可以視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生產關係的延伸。一方面，國有單位或行政級別高的單位透過再分配權力分享較多的組織資產；另一方面，集體或行政級別低的單位則因為缺乏組

織資產不能享受很多資源和機會（林宗弘、吳曉剛，2010：1-40）。前述戶籍制度與單位體制，再加上幹部身份，使得在改革前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出現農村、集體與國家幹部以及農民、集體工人與國企工人的階層（見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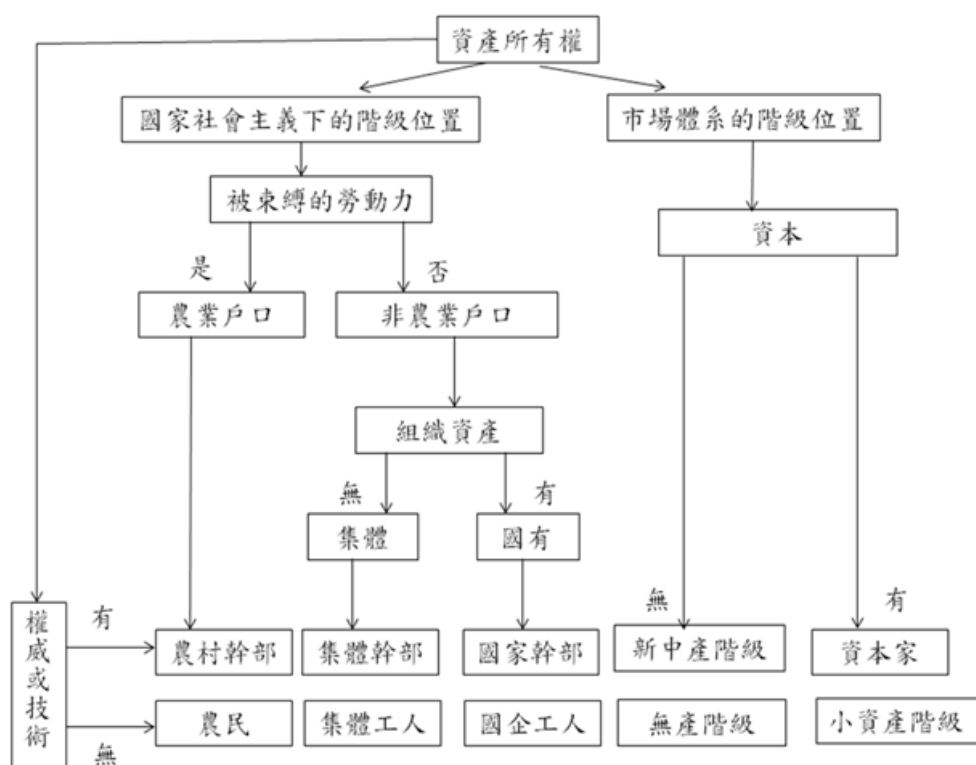


圖 2-1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與市場轉型時期的階級分類方式

資料來源：林宗弘、吳曉剛（2010：14）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巨變，其重要社會後果之一就是支撐原有階層所賴以存在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機制與環境發生重大變遷經濟市場化重構了市場關係與所有權，引起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更，其結果是集權體制的鬆動，產生大量自由

流動的資源、自由活動的空間以及多元利益主體，為新興階層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根據大陸學者俞可平（2006）的說法，八〇年代後中國開始實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放棄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變原來單一的集體和國家所有制結構，成為國有、集體和個人的獨資、合資和外資等多種所有制形式，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這一點是中國新中產階層的興起與民間組織得以蓬勃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

就此看來，1979 年中共中央宣佈為地富及其子女摘帽，並結束「以階層鬥爭綱」的基本路線，代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得中國社會的分層，得以從「符號性」的階層標準轉向職業標準，而這正是中產階層得以出現的前提之一（周曉虹，2010：61）。隨著經濟增長快速，2006 年 GDP 幾乎是 1978 年的 58 倍，城鎮家庭人均收入也成長 34 倍。城市擴張和城鎮人口增長，為大陸中產階層的產生創造了條件。1978 年中國僅有 193 個城市，而 2007 年中國城市數量增長到 651 個，城鎮人口數量也穩定增長增長為 5.94 億，是 1978 年的 3.4 倍（李春玲，2011a：76）。另一方面，自 1999 年至 2005 年期間，大陸實施大學擴招政策，導致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張，大學生人數由 1998 年的 413 萬增至 2007 年的 1880 萬。在產業結構升級上，職業結構中白領職業人群的比例明顯提升。1982 年全國 18 歲以上人口中僅有 7% 的人在從事白領職業，而至 2005 年則上升到 12%。不過，由於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導致了城市人口中白領職業比例在 90 年代相對下降（李春玲，2011a：76-77）。

中國大陸再分配體制的變革，和市場體制的興起，導致在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不斷湧現。「中國社科院社會所」根據 Erik Wright (1997) 的分層模型，針對中國大陸社會階層進行大規模調查，其以組織資源（主要是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系統而擁有支配資源的權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生產資料的所有、使用與經營權）和文化資源（主要是指社會所認可的證書或資格）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將中國大陸居民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陸學藝，2002：3-22）。按職業、教育與收入等界定，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與商業服務業皆是中產階層的組成部分。

而周曉虹（2010：61-63）認為可分為兩個的時期：一是 1978 至 1992 的 15 年間，在此階段伴隨著對私營經濟的「放生」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推行，有兩部分人首先成為中國的中產階層。包括城鄉社會那些首先投身於市場經濟的群眾，以及那些主要通過父母擁有的權力和雙軌制政策而富裕起來的幹部子弟。第二個時期是 1993 年至今，原先在再分配經濟中具有優勢的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此外，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在時間序列與空間分布上皆有其特色。時間序列上分為「老中產階層」及「新中產階層」兩代，老中產階層包括私營企業家、鄉鎮企業家及小業主等，新中產階層則是指專業技術人員及經理階層等；改革開放市場轉型造就了第一代中產階層（老中產階層），第三產業及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則是新中產階層浮現的前提。1949 年至 1978 年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中國社會基本上在

進行一種「去階層化」的運動，改革開放之初階層之間的差距仍不大。相較於西方新舊中產階層的出現相距超過一個世紀，中國的新舊中產階層是接踵而至的（周曉虹，2005：7-8；李春玲，2011b：135-138）。

就此看來，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分化的力量，主要來自市場轉型帶來的流動，以及固有制度或體制的切割（劉平、王漢生、張笑會，2008：56），快速變動的社會及雙重因素的影響，中產階層的定義通常是歧異且模糊不清的。基於各派學者對於中產階層定義之不同，所研究的對象群體亦有差距。一般而言，以收入及職業定義中產階層在操作上較易，但因忽略教育、消費及生活方式等因素，不易有全面性及代表性。也因此，出現各說各話的情況。以下將針對中國中產階層的分類與規模進行說明。

## 第二節 中產階層的類別與規模

如前所述，由於衡量尺度的差異，造成學者研究中產階層對象群體所包含的對象及範疇不易劃分，所估計的中國中產階層總人數亦不盡相同。導致分析數字差異的主因仍是定義界定困難，即使是最易測量或區分的收入和職業標準，也存有各種測量方式，各研究成果在對話上仍有阻礙。中產階層的社會構成，各學者有不同的劃分與分類方式，其規模也隨著組成有所異同。以下將區分官方與民間分類說明之。

### 一、官方分類

就黨國的觀點而言，為了消解中產階層的政治含義，一直有意無意將這一階層稱之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做法，進一步強化了人們根據收入及由收入決定的消費來進行社會分層的傾向。依據大陸國家統

計局的數字顯示，2005 年的中產階層人數為 6,550 萬。國務院研究室主任侯雲春表示，按照世界銀行制定的標準換算，國家統計局將年收入在 6 萬到 50 萬元之間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範疇。至 2007 年，大陸的中產階級人數成長了將近 1,500 萬，已達 8,000 萬左右（國家統計局，2007）。也就是說，大陸人口的大約 6.15% 已步入中產階級行列。

在官方文件中，中產階層常被稱之為「中等收入群體」，這一概念常常與政府的社會政策目標相聯繫。2002 年 11 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十六屆中央全會上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目標，這被認為是政府試圖促進中產階層發展的一個政策信號。中共「十七大」召開前，中共中央統戰會議中確認了中國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這個新的社會階層以及從業人員人數超過 1.5 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 11.5%，掌握或管理著 10 萬億元左右資本，使用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收，並且每年吸納著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的說法，這個新群體的基本特徵包括：（一）由工人、農民、幹部和知識份子分化形成，以知識份子佔多數；（二）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領域，並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三）職業和身份不穩定性大；（四）政治訴求逐步增強；（五）多數是非中共人士；（六）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葉曉楠，2007）。

## 二、學界分類

目前學界測量中國中產階層的標準可分為職業、教育、收入和消費等，以下針對學者的研究歸納並區分為「職業」、「收入」、「階級」與「綜合」分析。

### (一) 職業分類

在劃分中產階層類別的不同變項中，職業分類幾乎是最常用且最重要測量指標（Goldthorpe,1990; Erikson & Goldthorpe,1993; Wright,1997）。就職業或行業標準而言，周曉虹（2005：20）認為中產階層的基本社會構成應包括改革開放後新生的私營企業家和鄉鎮企業家，以及同時產生的小業主、小商販等自營業者和其他形式個體戶；黨和國家機構有連帶關係的黨政幹部和知識份子、國營企業領導人；外資企業的白領階級，包括管理階級和高級員工；大批企業管理和社會組織管理者，是中國中產階層人數成長最快的一部分；因應市場採用高階專業技術的新行業而出現的高收入群體，如建築師、律師、會計師等（周曉虹，2005：5-6）。在此定義下的中產階層不會超過總人口的20%，即約2億5,000萬人。

相近的觀點或分類方式，但卻可能推估出有落差的結果。李強將中國中產階層分為四個社會集團：典型中產階層，即幹部及知識份子（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新中產階層（就職於三資企業或新興行業等高新技術領域）；效益良好的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中的職工（類中產階層轉變為真的中產階層）；最後是大量的個體、私營經營者（組成最為複雜且持續重組中）。此劃分方式將各性質的中產階層做職業分類，然而其推估中國中產階層之人數僅約1億人（李強，2005：40-41）。

中國中小企業主、自僱傭者和小業主以及普通的白領受雇者被認定為是中產階層。其中自僱傭者和小業主被稱為老中產階層，白領受雇者被稱之為新中產階層。社會學家的中產階層界定也遇到了一個問題，依據上述分類，幾乎所有的白領職業人員都被歸類為中產階層，而依此估計的中產階層規模達到了總人口的 25%-30%，但很少有人贊同中國的中產階層達到了如此大的規模。而且，大多數被社會學家歸類為中產階層的人否認自己是中產階層，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遠未達到中產階層的狀態。此外，當代中國社會具有與西方發達社會不同的一個特徵。國家掌控著最重要的和大量的資源，因而，源於政府科層系統中的職位而產生的權力，是決定階層位置的一個重要因素（李春玲，2011a：79）。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社會學家在職業和就業身份的分類基礎之上又增加了一些其他指標，如階級、教育、收入和消費等等。

## （二）收入分類

收入標準是界定中產階層最易操作的方式。蕭文濤以收入作為指標，計算人均年收入在 1-10 萬元、戶均金融資產在 3-10 萬元的人口和家庭數量，估計中國中產階級占全國總人口的 20%至 25%（蕭文濤，2001：94）。201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城市藍皮書》指出，截至 2009 年中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達到 2.3 億人，同時也顯示出中等收入階層在地理（城鄉、沿海及內陸）分布上的不均衡性。



### （三）階級分析

不同於職業標準的分類，李春玲採用 Gordthorpe 的階級分類框架與「東亞中產階級比較研究項目」（EAMC Project）分析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她提出六個階級的分類界定中國各階級的人群，六個階級分別是企業家階級、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邊緣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業勞動者，此分類方式除了以職業為基本分類標準，還加入雇傭狀態做區分，增添階級因素（李春玲，2011c：135-138）。廣義中產階級（大中產階級）包含前四種，狹義中產階級（核心中產階級）則專指「新中產階級」。李春玲以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數量規模推衍至全國範圍，得出全國的大中產階級的比例大約是 30%，（約四億人），但她認為應視中國的狀況調整，扣除企業家階級；核心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大約是 8%-9%（約 1 億至 1 億 2,000 萬人）（李春玲，2011a：81）。

### （四）綜合分析

除了以單一指標（如收入、職業或階級）的方式來推估中國中產階層規模外，也能同時採用各個指標成為綜合標準來估算中國中產階層規模。李春玲以職業、收入、消費與主觀認同作為指標，估計中國全國中產階層的比例為 4.1%（李春玲，2005）。王建平以職業、教育、收入作為綜合指標，認為中國城市的中產階層已占 11.8%（王建平：2007）。

此外，由於城鄉二元體制及沿海優先發展戰略，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大多集中於沿海城市，中產階層的收入、職業、教育及社會地位只有這些地區能夠提供。中國中產階層空間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從學者之研究便可略知一二，如王建平《中國城市中間階層消費行為》聚焦探討的對象即是大城市中的中產階層；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城市藍皮書》也指出，中等收入階層達2.3億，占城市人口的37%。然而也有學者認為中產階層並非只存在城市之中，農村裡辛勤耕種、小鎮中小業主經營良好而發家致富者，都能算是中產階層。

李培林與張翼（2008：1-19），依據「中國社會狀況調查」（CGSS2006）之數據，以「收入」、「職業」和「教育」為指標，把這三個指標都符合中產階層標準的人群定義為「核心中產階層」，把其中兩個指標符合的人群定義為「半核心中產階層」，把只有一個指標符合的人群定義為「邊緣中產階層」。李春玲（2011a：75-79）提出六個階層的分類，並以此為基礎界定大陸中產階層人群。這六個階層是：（一）企業家階層（雇傭20人以上的企業主）；（二）新中產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三）老中產階層（雇傭20人以下的小雇主和不雇傭他人的小業主）；（四）邊緣中產階層（普通辦公人員和非體力的商業服務業人員）；（五）工人階層（技術人員、監工人員、技術工人、半技術和非技術工人）；（六）農業勞動者。這樣的分類隱含兩種中產階層的概念界定，一種是廣義上的中產階層：大中產階層概念，包括了企業家階層、新中產階層、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一種是狹義上的中產階層，核心中產階層概念，專指新中產階層（也被稱之為現代中產階層）。這樣的中產階層分類較適合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中社會（如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狀況分析。

陸學藝主編的「當代社會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中，提出「中國中間階層研究報告」，其認為中國中產階層構成來源共四類：傳統「中產階級」（包括小業主、小商販等自營業者、個體戶）、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中產階層」中分化出來的部分幹部及知識份子、改革開放以來新生的私營企業主及鄉鎮企業家、引進外資者及高薪技術人才。衡量中產階層指標應包括職業的勞動方式（腦力勞動為主）及權力（授權管轄下屬）、收入及財富水平（個人人均年收入在 25,000-35,000 元人民幣，家庭年均收入 50,000-70,000 元人民幣）、就業能力（擁有中等以上國民教育學歷水平、各種專業技術培訓技能）、消費方式（除溫飽外，還能滿足文化、精神需要）及道德意識等（陸學藝，2002：255-257、253-254）。「報告」將中國社會分為十個階層，並指出中國的中產階層大約佔 15%-18%（約兩億至兩億四千萬人）（游華奎、李純純、羅苟新，2010：24）。2010 年同樣由陸學藝負責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研究成果認為中國中產階層已達就業人口的 23%（陸學藝，2010）。

雖然各家學者對中產階層的定義有出入，分類方式也不盡相同，但仍能找出類似及可比較之處。眾家學者所定義中產階層之指標、構成及規模可概略整理為表 2-1。學界推估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範圍落在 1 億至 4 億人之間，其中 2 億至 2 億 5,000 萬人的數字較為客觀，為學界所認同。結構組成方面，都納入了與黨及國家機構相關的幹部及知識份子、市場經濟下新興的專業技術從業人員，以及改革開放後大量的個體、私營企業主。與黨、國家機構及國有企業相關的人員是否屬於中產階層的一環尚有討論空間，由於這群人在計畫經濟體制中占優勢地位，改革開放後可能透過「菁英循環」獲取資源及維持地位，

而既得利益者對於現存體制通常是抱持支持的態度，在研究中國民主化議題時不可忽略這群人政治上的態度是保守的（陸學藝，2002：255；周曉虹，2005：7）。針對此，以下將探討與中國中產階層興起相關的「現代化理論」與「公民社會」觀點。

表 2-1 中國大陸學者對中產階層的分類與規模估計

分類標準	學者	構成	規模
職業	周曉虹 (2005)	私營企業家和鄉鎮企業家、自營業者和個體戶、黨政幹部和知識份子、國營企業領導人、外資企業白領階級、企業和社會組織管理者、高階專業技術人員	不超過20% 兩億五千萬人
	李強 (2005)	幹部及知識份子、高新技術人員、國企職工、個體、私營經營者	約一億人
階級分析	李春玲 (2011a)	廣義：企業家階級、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及邊緣中產階級 狹義：新中產階級	廣義：30%，約四億人 狹義：8%~9%，一億至一億兩千萬人
收入	蕭文濤 (2001)	人均年收入在1-10萬元、戶均金融資產在3-10萬元的人口和家庭	20%至25%
	社科院 (2011)	城市中等收入階層	2.3億人（城市）
綜合	李春玲 (2005)	以職業、收入、消費與主觀認同作為指標	4.1%
	王建平 (2007)	以職業、教育、收入作為綜合指標	11.8%（城市）
	陸學藝 (2002)	指標：勞動方式及權力、收入及財富水平、就業能力、消費方式及道德意識 組成：傳統「中產階級」、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中產階層」分化、新生的私營企業主及鄉鎮企業家、引進外資者及高薪技術人才	15%~18% 兩億至兩億四千萬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第三節 中產階層興起的效應

#### 一、現代化理論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財富與民主之間的相關，在於經濟發展造就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這些來源獨立於國家之外，而且產生功能性需求分散了決策權。更直接的是，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結構變遷，從而帶動民主的價值觀（圖 2-2）。首先，社會內部的經濟富裕與教育程度，決定其「公民的價值觀與態度」，如人際間的相互信任感、生活滿足感與憑能力競爭的習慣，這些習性又與民主制度的生活方式相關。第二，經濟發展促成中產階層的擴大，中產階層也越來越相信他們有能力透過選舉提高他們的利益。在第三波民主化運動，最積極的支持者是來自都市中產階層。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除提高人們的期望，加重了不平等，而且在社會組織當中產生了緊張與壓力，這又刺激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要求（Huntington, 1991: 59-72）。

學界對於中產階層在政治社會變遷所扮演角色看法不一，有的認為是當代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Lash & Urry, 1987）；亦有認為是傳統秩序的堡壘（Goldthorpe, 1982: 162-184）。有認為中產階層是穩定漸進的工業化力量（Kerr, 1991）；也有的表明中產階層是民主化的重要動力（Lipset, 1960; Huntington, 1968），如格拉斯曼（Glassman, 1995）從歷史比較視角，認為中產階層為民主政治提供結構和制度的基礎。在大多數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主宰城市的政治。因此，視中產階層為革命因子，與視中產階層為現代政體穩定的基石，是互相矛盾的。不過，中產階層對穩定的關係，頗近似富裕對穩定的關係。一個大的中產階層，有如普遍的富裕，是政治上

節制的力量。不過，中產階層的建立，和經濟成長一樣，常是高度不穩定的因素，這取決於都市中產階層—知識份子、專業人員與現存秩序的疏離程度，以及中產階層和不同階層（如農民階層）的結合（Huntington, 1968: 277-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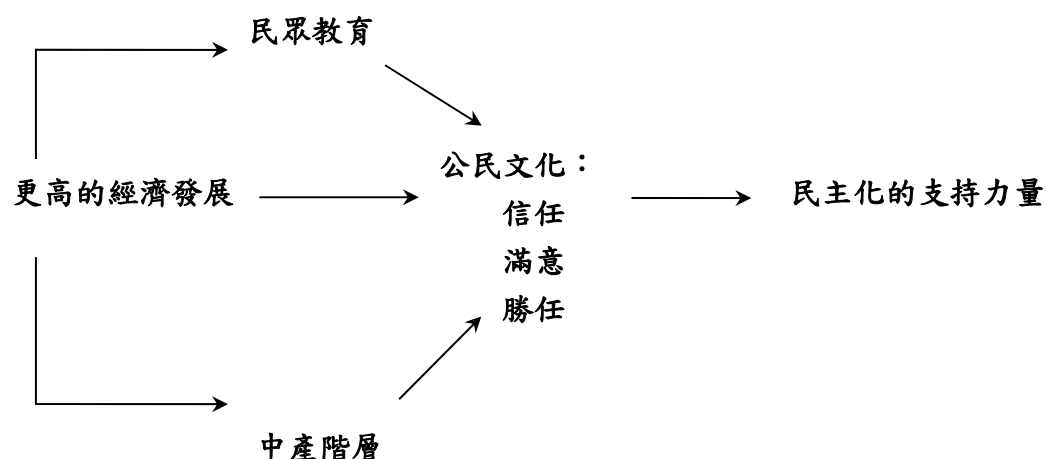


圖 2-2 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

資料來源：(Huntington, 1991: 69)

若將上述的觀點放在中國大陸，大陸中產階層的興起可能產生何種社會政治影響？他們的出現是有利於維持社會穩定？還是有可能推進社會變革？一派說法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財富與權力重組，造就出一批所謂的「新中產階層」，其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效應，就是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出現，而將此邏輯套用在對中國的研究上也成為西方學界關注的焦點（White, 1993）。就此而言，中產階層的興起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社會結構的轉變，而中產階層在有錢有閒之後，將會集會結社捍衛自己的利益，甚至進行政治參與，此即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出現的動力。

但此種觀點遭受不少研究者的批評，批評者強調，中國新中產階級是在缺乏社會多元化的狀況下出現的，其中黨國扮演重要的政治社會影響力，而很明顯地，中國以黨國為核心的改革所產生的新中產階級，是由前國家社會主義體系中產生，其為經濟轉型的領導者，不只維持與黨國體系的聯繫，並在此種聯繫關係上開展成功的企業活動，故許多經濟活動皆鑲嵌在黨政軍體系之中。故在政治上，新中產階級與黨國體制關係密切，極少有結構性的對抗，隨著社會與政治的開放，兩者將會形成更緊密的利益共同體（Goodman, 1999：241-261）。

相對於這兩種對立的看法，李路路與李升（2007：15-37）基於「再分配—市場」轉型的二元分析框架，認為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經歷了「內源」與「外生」兩條道路（如表 2-2）。「內源」主要是指更多延續再分配體制特徵的中產階層，「外生」則是由於市場興起，在更加市場化的體制中產生的中產階層，這兩種路徑導致大陸中產階層內部的不同政治經濟與社會效應。在代際延續性方面，其指的是階層地位的獲得與父代的職業、自身的文化程度、性別以及黨員身份有著密切的相關關係，此部分「內源型」的父代仍是中產階層的比率高於「外生型」，換言之，「內源型」比「外生型」具有較強的延續性特徵。在政治意識方面，「內源型」共產黨員的比例較高，政治態度較為保守，而「外生型」的政治態度則較為激進，且具有更強的社會參與期望。在經濟層面部分，「內源型」居於高收入層的比率比較高，「外生型」在收入分層上的分佈相對較為平均，在消費意識上，「內源型」較為傳統，而「外生型」則較為前衛。

表 2-2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類型與政經效應

類型	代際延續性	政治意識	消費意識
內源型	強	保守	傳統
外生型	弱	激進	前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路路與李升（2007：15-37）

目前看來，在大陸學界關於中產階層的討論中，認為中產階層的發展能夠成為「社會穩定器」的說法，或者認為大陸中產階層「消費前衛」和「政治後衛」的觀點，總體上說仍然是學術界的主流，這當然和社會主義轉型背景有關。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有兩個鮮明的特徵：一是執政黨的政治地位和原有的體制，儘管有所轉變，但沒有發生根本動搖。它使得原先體制內的精英階層，及其後代能夠順利地複製其精英地位；二是朝向市場的轉型，使得原先體制外的精英也能夠通過經濟活動，或教育等途徑富裕起來，經濟的雙軌制事實上使得階層再生產能夠沿著同樣的雙重軌跡前進（周曉虹，2010：67）。因此黨國體制與經濟的雙軌制對應大陸的中產階層發展。

## 二、公民社會

一般而言，「公民社會」、「市場」與「民主」間猶如概念上的孿生兄弟般親密（White, 1993：63-87）；「公民社會」所代表的除了結社自由與民主制度間原本就存在著內在邏輯外，社團在公民社會化與政治教育、抗爭與制衡權、利益表達、公共審議與領域以及直接治理等各方面，不論是制度建構或是政治參與，都與民主脫離不了關



係 (Fung, 2003: 515-539)。因此，論者感興趣的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所帶來中產階層的興起與社會自主空間的擴大，是否意味著「公民社會」將會出現？

「公民社會」概念於近一、二十年間的復興，幾乎引起一股全球性的風潮，尤其是東歐與前蘇聯等國家擺脫集權式統治，各類社會團體存在與運作均獨立於國家力量之外，以社會空間作為其生存的場域，均使人們對「公民社會」抱持極高的興趣。與此類似的則是「第三部門」的觀點，其強調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是任何一完整社會中三足鼎立的獨立領域，每一領域都有其行動的邏輯：國家是層級節制的「權力邏輯」，市場是「利潤極大化邏輯」，而公民社會則是「自願主義邏輯」。一般而言，國家的功能是透過社會委託關於法律的制訂與執行權力，以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需求，並協調社會各階層與群體的利益；市場的功能是透過產權與契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滿足私人的需求；而公民社會的功能則是透過自願自主的原則，積極參與公共與經濟社會等事務，實施自治管理。

一般而言，對於「公民社會」，雖然學者的定義不盡相同，而各國發展的方向也不一致，但其主要是指社會部門擁有相對於國家控制的自主性力量，主要特點就是社會中具有大量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民間組織，且此些組織間具有綿密且不受干擾的互動網絡，進而能影響政策 (Taylor, 2002; 鄧正來, 2002)。公民社會組織的產值、規模、影響力以及對建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的貢獻，使其位於國家與市場之間之「中間道路」的戰略重要性呈現無遺 (Salamon, 1994: 109-122)。

對於觀察後社會主義國家（post socialist states）轉型的研究者來說，東歐與蘇聯等國家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重新浮現（reemergence）一直是引人關注的議題。此問題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市場化的改革造成黨國體制的退化，政府對人民的控制與社會滲透的能力降低，社會獲得相對自主的空間；其次，社會空間的萌芽讓受宰制的社會行動者有機會進行聯繫，這也造成社會組織與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第三，社團的出現讓人民得以透過集體行動影響國家政策，甚至與先進民主國家的 NGO 進行聯繫，針對特定議題向政府施壓，迫使國家回應社會行動者的訴求，達成政權轉型的目的，這也被視為是共產國家民主化的前奏（Petrova and Tarrow, 2007: 80-83）。

中國大陸透過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改革，不僅展現出傲人的經濟成就，也帶動一連串的經濟與社會變遷，此些巨大的變化亦產生政治效應，特別是近年來兩種「由下而上」社會力量的崛起，一是社會組織，另一則是社會抗爭事件，此種組織化力量也是我們觀察中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發展以及「國家－社會」關係變化的重要視角。因此，本研究將會集中在討論中國大陸社會組織與社會抗爭的出現。

在社會組織方面，在數目方面，不論是官方所公布的 44 萬個，亦或是學者所估計從 75 萬到 500 萬個之間，我們都可發現社會組織的數量穩定增加；而在組織行動方面，我們亦可發現，不少在官方掌握之外的草根組織組織不僅極為活躍，也具輿論影響力，並對政策產出發生影響。重要的是，此些組織的成員多是中產階層（王占璽、王信賢，2011：115-175）。而在社會抗爭方面，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

社會運動的頻率與規模均不斷擴增，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從 1993 年至 2003 年這十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由 1994 年的 1 萬件增加到 2003 年的 6 萬件，成長 6 倍，年均成長 17%，此外，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數年均成長 12%，由 73 萬多人增加到 307 萬多人（吳忠民，2005：82-88）。2006 年一月，中共國務院批轉了「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公安部《關於 2005 年全國（內地）城鎮、鄉村群體遊行、集會情況匯總報告》指出，2005 年未經批准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活動 9 萬 6,000 多件，超過 820 萬人次參加，平均一天發生高達 263 件集體抗爭事件。頗難人尋味的是，近年來未見中共當局公布相關數字。因此，關於中國大陸社會力量與中產階層的關係，本研究將探討社會組織的崛起與社會抗爭的大量湧現並輔以網際網路發展的政治社會效應進行說明，而此部分將於第四章深入論述。

### 三、消費社會與中產階層

另一個近來引起關注的面向是中產階層與消費行為之間的關係。社會學者早已提出消費呈現的是一種個人的品味，有時候甚至是為了炫耀而消費（Veblen, 1921），當集體社會的特質被市場經濟的思維所滲透，個人就會透過消費來呈現個人所追尋的價值。戴慧思（Deborah Davis）等人對中國 90 年代的消費文化所做的研究發現，當代中國消費文化顯現出個體化傾向，社會生活領域中不斷增長的個人自由和空間，使消費行為個體化（Davis, 2005），這也讓消費成為一種反映階級價值與特性的社會行為。中產階層的消費除了影響到國際市場物價的波動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消費金額大小所顯露出來的消費分層，讓個人社會地位因消費行為被赤裸裸的攤在社會大眾的面前。

一般來說，中產階層屬於比較有消費與休閒能力的一群人，他們的消費行為背後也充滿了許多社會學意義的內涵。從物到符號，現代消費的延伸為中產階層提供廣大的消費舞台。根據周曉虹（2005）的歸納，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特徵介於激情與理性之間。首先，中產階層的享受性消費、發展性消費明顯增加，也就是中產階層的家庭的消費結構正從傳統的衣食為主的單一消費結構不斷趨於多元化。其次，雖然消費結構逐漸轉變，但是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受到很大的理性限制，這與西方許多國家中產階層過度消費的情況大不相同。雖然中產階層的收入已經完全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並且有更多的剩餘資金可用於滿足發展需求的其他消費項目投資，但是因為受到時間與精力的限制，中國的中產階層在休閒行為上依然不夠普遍，中產階層在消費上依然是量入為出，不會超過自身的能力。

另一方面，中產階層的消費已經慢慢顯露出個性化與階層化的一面，中國近幾年成為世界知名品牌的主要市場，顯線品牌消費慢慢植入一般大眾的心。所謂的符號消費是指在消費的過程中，消費者除消費產品本身以外，還消費這些產品所象徵和代表的意義、心情、美感、情調等等，即對這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和內涵的消費。通過對品牌的選擇、認知和認同，消費者已經開始了符號消費，也就是說品牌消費是符號消費的起點，當消費變成一種符號，那消費者也自然被貼上標籤。此外，中產階層的消費空間也逐漸形成，不同的收入水平、社會地位與消費觀念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消費中心，透過中產階級的消費場所與消費環境，也會顯現出中國內部社會階層化的凝結程度，當同一個場所的消費者同質性越高，代表著社會的階層分化已經固定，此時社會不平感與剝削感就更容易在日場生活中浮現。

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背後帶來的快速成長的中產階層，因此這群人的消費能力及態度勢必影響中國經濟往後的發展，而這群人的消費模式也將影響中國整體社會對於不平等議題的認知，消費將人與空間進行了切割，讓不平等滲透到人的日常生活，這我們在第四章會有更詳盡的描述。



### 第三章 中產階層對中共思想理論的衝擊與政治影響

「中產階層」是觀察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對社會分配機制、社會分層結構，以及社會資源分布影響的重要切入點。此一階層的出現，除了顯示改革開放已經導致新社會群體的產生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成為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標誌。但另一方面，在現代化過程中，中產階層的建立和經濟成長一樣，常是高度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城市中產階層與知識份子對現存秩序的疏離感，以及對政治態度與價值的主導性，影響人們對傳統權威的忠誠（Huntington, 1968: 369-374）。

近年來，學界關注的是，大陸中產階層的興起可能產生何種社會政治影響？他們的出現是有利於維持社會穩定？還是有可能推進社會變革？依據前章論述的邏輯，如果中產階層持有某種程度的政治保守主義態度，這一群體就可能成為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產階層採取某種程度的政治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立場，這一群體就有可能成為推進政治變革的力量（李春玲，2011b：129）。因此包括中產階層的分化、政體包容性擴大、爭取政治參與空間，以及因而產生的政治機會結構，成為觀察中產階層政治影響的主要變項。

#### 第一節 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意識

大陸中產階層的發展和社會主義轉型背景有關，一部分是基於執政黨的政治地位和原有的體制，儘管有所轉變，但沒有發生根本動搖。它使得原先體制內的精英階層，及其後代能夠順利地複製其精英地位；另一部份則是因市場的轉型，使得原先體制外的精英也能夠通過經濟活動，或教育等途徑富裕起來（周曉虹，2010：67）。經濟的雙軌制導致大陸中產階層內部的不同階層性格，在政治領域可能演化成「穩定」或「變革」的力量。

## 一、中產階層的認同與意識

對於中產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相較於李普賽或杭廷頓的觀點，將中產階層視為民主的推動力量。主流的觀點仍是認為中產階層政治理念較為保守（Li: 2003），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學者認為，大陸的中產階層非常保守，他們比較反對非制度化的集體政治行動。而經濟利益是中產階層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這一階層熱衷於保護他們狹隘的經濟利益，並不會挑戰政黨系統（Yang, 2007: 60）。這也意味中產階層對黨和國家的依附性，在大陸追求經濟發展的狀況下，中產階層與國家之間沒有任何結構性的衝突（Goodman, 1999: 261）。許多大陸的中產階層認識到，追求自主往往意味著被排斥到體制外，因而他們追求加入政治系統以取得較多的利益（Dickson, 2003: 19）。

此外，大陸學者如李強（2001：19）認為中產階層的擴大，有利於緩和社會高層與低層的矛盾與衝突，成為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加上中產階層在社會上代表溫和、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佔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與衝突觀念就很難有市場，成為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周曉虹（2005）也持類似的看法，認為中產階層的政治傾向是「消費前衛、政治後衛」。大陸中產階層的主要構成部分—私營企業主、企業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政府官員和事業單位的專業人員，都與國家保持緊密聯繫，且是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他們對現存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並沒有強烈的變革欲望，因此和國家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不大。

相對的，亦有學者認為總體上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並不保守，且新中產階層比老中產階層更具改造社會的風險（張翼，2008：



117-131)。比如對北京業主維權運動的中產階層進行考察後發現，維權骨幹和積極分子有效地領導了集體行動，擊潰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分利集團，說明中產階層在物業糾紛的行動中，已經表現出很強的權利意識和行動能力（張磊，2005：1-39；陳映芳，2006：1-20）。

不過，張翼（2008：117）認為，無論是社會穩定器或民主推動者，必須把「中產階層」自己的社會態度和階層意識置於其中來討論。李春玲（2011a：84），也提出，包括四個群體的所有中產階層成員中，僅有18%達到了高收入標準。基於這一比例可以估計出，大約城市人口的11%和全國人口的6%，同時符合社會學家的中產階層標準，和社會公眾的中產階層（高收入者）標準。這兩個中產階層概念的差異，導致了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社會學家所聲稱的中產階層，其多數成員否認他們是中產階層，並且抱怨為什麼他們沒能達到中產階層的生活水準，他們認為自身應該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與此同時，這些抱怨和不滿又成為中產階層追求經濟利益和提高生活水準的動力。

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的說法，新社會階層對現實生活與現存秩序相對滿意，也擔心重大變革衝擊其利益。這決定了他們對社會主流價值與現存秩序著較強的認同感，成為社會緩衝與穩定的基礎。但另一方面，新的社會階層卻也時刻被危機感包圍，特別是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隨時擔心跌入下層的可能，因此他們要求政府進一步提供公共服務、要求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並期待政府的改革繼續擴大他們的收益（葉曉楠，2007）。

李培林與張翼（2008：16-17），則認為人們越是將自己認同在「社會中層」或接近「社會中層」的那些人群，他們就越認為當前國

家的各項制度是公平的；人們越是將自己認同在「社會中層」或鄰近「社會中層」的位置，就越不會將致富的社會原因歸結為「非法致富」或「不公平競爭的致富」，但在對政府的態度上，認同中層也表現出對政府的不當行政會持反對態度。基本可以說，社會成員的認同階層越高，總體上形成的社會公平感就越強，其對社會就越具有積極性的認識。因而，自我認同的「中層」是一個具有社會穩定意義的變數，他們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偏好。

在前述假設下，如果中產階層在其生成過程中，與其他階層相比，其對政府的信任心理較低，對社會公平程度的評價較消極，對政府各項工作不是很滿意，則它的社會不滿會更強烈。在心理上也會滋生對國家制度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認同危機，生成改造既有社會秩序的政治風險。如果中產階層在其生成過程中，與其他階層階層相比，其對政府的信任心理較強，對社會公平程度的評價較高，對主導社會發展的政府的各項工作比較滿意，則它會成為既定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在社會變遷中其政治態度也會比較穩定，亦會積極消解其他階層或階層帶來的社會不安（張翼，2008：119）。

## 二、中產階層的經歷與特徵

李路路與李升（2007：15-37），從社會結構→階層經歷→階層認同，探討中產階層性格特徵。由於大陸中產階層是由來源不同的群體組成，存在著結構上的分化，這種分化通過中產階層的性格特徵表現出來。「內源中產階層」和「外生中產階層」，在政治意識層面的特徵是不一樣的。在再分配體制下產生的「內源中產階層」具有較強的代際延續性，而「內源中產階層」中黨員的比率大大強過「外生中產階

層」，這就不難理解內源中產階層在政治意識和消費意識方面相對保守，這使得他們至少在現階段很難成為激進社會運動的領銜者。而產生於市場條件下的「外生中產階層」，由於其產生與形成更具市場經濟體制的特徵，除了消費意識較為前衛，在政治意識上比內源中產階層具有更強的社會參與期望。

前述李春玲（2011a：75-80）所界定中產階層的四個群體：企業主階層、新中產階層、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企業主階層（即私營企業主）是積極的經濟行動者，但同時又是政治上的依附者。他們在整個中產階層當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卻在收入和消費領域引領著中產階層的方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是中產階層的形象代言人。企業主通常與政府和官員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他們通過某些方式可以部分影響政府部門的經濟政策制定，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經濟政策。但他們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受到很大的局限。總體而言，企業主階層傾向於表達對政府的政治效忠以換取政府給予的經濟利益。

新中產階層與政府具有緊密的聯繫，大多數新中產階層成員受雇於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和政府管理的事業單位，他們成為新中產階層的主要構成部分。政府提供給他們就業保障、穩定增長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因而，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極大程度上依賴於一個強有力的穩定的政府。同時，他們有較多的管道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維護他們的利益。另一部分新中產階層成員受雇於私營和外資企業，他們的經濟收入常常比公有部門的新中產階層高得多，在消費市場中是一個有實力的消費群體，他們也是中產階層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象代言人。但另一方面，他們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較弱，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現出政治冷漠，與公有部門的新中產階層成員相比，他們影響政策制定的管道和手段較少。

與中產階層的其他群體相比，老中產階層(即個體工商戶)的社會地位較低，在某些時候還遭受某種程度的歧視。老中產階層的經濟收入大多處於中等或中等偏上水準，但其經濟地位並不穩定，缺乏社會福利和經濟保障。在政府政策制定方面，老中產階層常常受到忽視，而他們也較少有機會和途徑表達他們的意見。政府的某些政策，如市場整頓、舊城改造部分影響到老中產階層的利益。因而他們對相關政策的實施部門（如工商管理機構、稅務機構、衛生檢查機構等）有許多不滿。老中產階層在整個中產階層當中，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但他們很難組織起來採取某種形式的集體行動。

邊緣中產階層的核心部分，是 1970 年代後期和 1980 年代出身、受過中高等教育、從事低層白領工作的年輕人，即所謂的「小白領」。他們所具有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具有集體行動和媒體（輿論）動員能力。他們是伴隨網路成長的一代，在網路上花費時間較多，喜歡通過網際網路及其他溝通方式交流情感、觀點和資訊，並能夠很快地製造文化時尚，實現社會動員並可能採取群體行動。他們很喜歡在網路和媒體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也常常能成功地引起公眾輿論對此的關注。「小白領」們面臨著嚴酷的就業市場競爭，能提供穩定工作和福利保障的國有單位的空缺越來越少，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低工資待遇，缺乏保障的工作。他們急切夢想著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然而較低的收入和高昂的房價，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感覺到這個夢想短期內難以實現，從而導致了某種中產階層焦慮。

整合上述，中產階層群體都表現出較高的個人生活滿意度，其中新中產階層的滿意度最高。在社會生活滿意度方面，企業家階層和新

中產階層的滿意度最高，而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的滿意度較低，其滿意程度與工人階層相似。這表明中產階層上層、企業家階層和新中產階層，更希望維持現有社會秩序，更可能反對社會變動，即具有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而中產階層下層、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的保守主義傾向較弱。在對待國家和權威的態度方面，中產階層內部具有不同傾向，企業家階層和老中產階層表現出更強烈的政治保守主義取向，支持現存政府並認可威權政體。新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較弱，雖然支持現存政府，但期望更多的民主參與。總體而言，中產階層在對待國家態度上，都表現出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他們（與工人階層一樣）高度信任中央政府，擁有較多民主意識的新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也同樣高度支持中央政府，意味著即使他們持有部分自由主義價值理念，他們所希望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只是改良性的和漸進式的，而非動搖現存政體（李春玲，2011b：140-142）。

不過，張翼（2008：129）卻認為與其他各階層相比，中產階層的社會批判意識漸趨顯化，其政治態度也並不保守。不管是老中產階層，還是新中產階層，都具有相對較大的社會改造風險。他們對當地政府工作滿意程度的評價較低，對當地政府也表現了較差的信任程度，感受到的社會公平感也不高，他們對未來社會發生衝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強烈。按照情境預設假設，如果其普遍認為未來社會衝突會激化，那麼在真的發生社會衝突的時候，他們就會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結果，其態度就會很容易演化為「參與」或「聽之任之」。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大陸中產階層會是社會穩定器。

## 第二節 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

當前中產階層在政治參與需求已經萌芽，官方認為，他們對現實生活與現存秩序相對滿意，也擔心重大變革衝擊其利益。這決定了他們對社會主流價值與現存秩序有著較強的認同感，成為社會緩衝與穩定的基礎。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時刻被危機感包圍，特別是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隨時擔心跌入下層的可能，因此要求政府進一步提供公共服務、要求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並期待政府的改革繼續擴大他們的收益。

據大陸學者研究，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在政治參與意識與能力都逐年增高，相對的對於國內政治參與渠道滿意度也較低。由於他們反映和維護自身利益，要求公平對待、公平競爭、維護合法權益的願望日益強烈，他們的利益訴求，已不再單純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是希望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實現自身政治價值（葉曉楠，2007）。不過，基於前述經濟雙軌造成中產階層的不同經歷，也影響中產階層在意識形態與政治參與的路徑。一部份成為統戰系統加以整合的對象。無論是吸收入黨或藉由統戰系統，投入政協與人大成為參政議政場所，顯示中共決意將其納入現有政治體制框架中，但這些整合的手段其實並未脫離列寧式黨國體制的核心思維，無論是政治中的權力分配，或是經濟的發展方向，黨國仍扮演支配與主導的角色。另一部份則透過自主參與，其手段與目標可能與黨國背道而馳，成為現行體制的挑戰力量。

## 一、「普世價值」與「正本清源」

從京奧期間「普世價值」之爭到「茉莉花事件」，中共認為意識形態領域存在一些與主旋律爭奪陣地的雜音噪音。因此從提出「六個為什麼」到劃清「四個重大界線」，領導核心在思想文化陣地主張「正本清源」，要求黨員遠離西方民主思潮，繼續築牢思想防線。

就如李普賽等學者的評估，教育的普及與人們受教育水準的提高，一方面會為現代中產階層的成長提供社會溫床，另一方面也會為中產階層之階層意識的萌發，提供知識基礎。自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陣營瓦解與西方思潮的敵意，對中共的威脅除了「和平演變」外，還包括內部在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懷疑(ideological self-discrediting) (Plattner, 1996: 36-48)。因此在一個快速轉型，並且使人民在未來的制度變遷上面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如果意識形態的改革能夠調解對轉型利弊的主觀評價，可能有助於穩定社會預期，喚起人民對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信仰。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新重視，以及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強調，說明只有在作為一種構建社會現實認識框架的意義上，意識形態才能發揮效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意識形態並不是一種僵化和固定不變的世界觀，而是一種解釋社會現實的動態體系。更具體地說，意識形態理論是一種政治行動者聲稱擁有唯一權威的統一的意義體系，也是一種具有合法化功能的認知結構。不過，「十七大」之後，關於改革的話語權的爭奪卻圍繞「普世價值」展開，自「零八憲章」以來，普世價值的討論與紀念改革開放涉及中國下一步改革路徑，並衍伸至誰能主導

改革的問題。這波思想解放與話語權爭奪的發展，值得持續關注。主要原因，在於來自中產階層與知識份子的「普世價值」，否定了中共認為大陸只需要由共產黨界定的中國式政治制度之概念。這樣的社會力量是否形成？在黨內或社會是否出現結盟對象？可能是國家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今（2011）年 10 月，中共召開十七屆六中全會，全會以文化建設為主軸，通過《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0 月初在廣東佛山發生「小悅悅」悲劇，引發海內外對大陸轉型過程中道德與價值真空的反思。而近來在大陸興起的「紅歌」現象，起因來自社會失衡與濫權貪腐的不滿，地方領導人也藉著「紅歌」鞏固社會的思想障地，以避免「茉莉花」或「阿拉伯之春」降臨。這也可以體現出胡錦濤在「七一講話」中提出「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面對西方思潮的挑戰，中共透過文化體制改革，確保媒體、出版、電影、網路與黨的目標維持一定程度的「均質性」(homogenization)，藉以激勵民族意識，喚起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

面對鄧小平模式帶來的紅利逐漸消失，「分配正義」早已超越經濟發展，成為當前中共執政的首要挑戰，這也是胡錦濤上台後，以「科學發展觀」取代「三個代表」的主因。學者認為，儘管中產階層對原有主導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和權力結構表現出了疑問。但中產階層，尤其是新中產階層的出現，對黨國而言，其任務就只能完善社會整合機制。如何以國家的主流意識整合中產階層的階層意識，是迫切的議題（張翼 2008：130）。只是當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在防範西方思潮



「走進來」，自然也就難以跳脫黨國干預的問題。因此，當公報中提出「要堅持正確創作方向....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工作.....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不禁讓民眾擔心，執政者自訂的標準與網路監管，可能限制民意「藉網出海」與言論自由。

不過，回顧「零八憲章」全文發布在網路上，呼籲所有責任感的公民簽名支持。網民大顯神通跨越國家的阻擋，簽名效應不斷擴散，從2008年12月10日到17日，僅僅7天，簽名人數已經超過5,000人，這些簽名者遍及各地，跨越各個行業，有學生、記者、律師、普通職員、維權人士等等，超越了六四以來民間一直重複的小圈子式的政治動員。這種通過網路進行傳播與動員的民間政治活動，對未來的公民參與將產生重要的啟蒙意義。<sup>2</sup>無論有學者認為，「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於完全沒有考慮在現有制度框架下，...沒有考慮執政者是否能夠接受這樣一份建議。」或者當前局勢正值「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彼消我長的階段，而立足在華盛頓共識的《零八憲章》是否還能有影響力，值得懷疑（張潔平，2008）。但事實上，憲章發起者並不會不知這樣的現實，但是卻選擇這樣的時間提出來，無非是希望在未來的改革路線規劃，透過網路的串連獲得話語權。

---

<sup>2</sup> 2008，〈303人發起簽署零八憲章〉，多維新聞網，<http://politics.dwnnews.com/news/2008-12-09/4585304.html>，檢索日期於100年11月10日。

## 二、「私營企業主」與「自薦參選人」

在當前中國大陸社會，企業主階層被認為是中產階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因為企業主階層是一個新產生的階層，它和老中產階層（個體工商戶）的出現，導致階層結構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企業主階層的出現，被認為是中產階層產生的一個象徵。在當前大陸的制度環境中，企業主階層並非是一個最具有優勢地位，並掌握最多資源的階層。與企業主階層相比，黨政高級官員和大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經理人員具有更優勢的地位和掌握更多的資源。從這一角度來說，企業主階層並非是居於中產階層之上的一個上層階層，它應該是屬於中產階層的一個部分。在這四個群體之上存在著一個上層階層（社會精英群體），它主要由黨政高級官員、大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經理人員、大企業主和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高級知識份子等組成（李春玲，2011b：138）。不過，依據「第八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綜合報告」結果（見表 3-1），可以看出大陸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人數在全部從業人員中所占比重值得關注，20 年間，這一比重已經從最初不到 0.04% 上升到 2008 年的 1.95%。<sup>3</sup>

表 3-1 2002-2008 年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發展狀況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6
私企戶數（萬戶）	243.5	300.6	365.1	430.1	498.1	551.3	623.9
從業人數（萬人）	3409	4299	5017	5824	6586	7253	7697
總資本額（億元）	24576.2	35304.9	47936	61331.1	76028.5	93873	107504

資料來源：豆丁網（2009/3/26）、張厚義（2008）。

<sup>3</sup> 2009，「2008 第八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綜合報告」，豆丁網：<http://www.docin.com/p-83232653.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0 月 11 日。

中國大陸國體定為「工人階層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官方文書對於中產階層仍是以「中等收入」、「中間階層」或「新社會階層」稱之，而未給予明確的定位（周曉虹，2005：23-24）。不過面對新生的社會代理人，中共是要將其吸納並凝聚在黨的周圍呢？抑或按意識形態繼續將他們視為「階層敵人」？從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經驗，這些國家中產階層人數的擴張及其向政治反對派的轉化，使其有了動員足夠大的社會力量去反對原有制度配置的可能。為什麼在民主化壓力下，執政黨歷經改革，一再妥協，但結局卻極其慘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產階層的中堅代表—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階層對政治反對派的支援（張翼，2008：118-119）。

中共為了促使共產黨自「革命黨」朝向更具代表性與反應民意的「執政黨」轉變，除了在組織上提高黨的包容性，甄補「私營企業主」入黨外，還透過重整有限的利益團體，發揮國家與社會間的溝通渠道，以統合利益並抑制這些力量對黨所可能造成的威脅。比如在江澤民時期，將私營企業主由過去的「階層敵人」，轉而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並且列入了2004年憲法修正案內容，到了胡錦濤時期，對非公有制經濟採取「團結、鼓勵、保護、表彰」的方針。代表中共決意承認現狀，將資產階層納入黨國體制的一部份，甚至給予代言人的角色，不再將之視為潛在的對抗者。我們可以從私營企業主黨員比例逐年提高（見表 3-2），甚至給予代言人的角色。意味中共吸納那些擁有資源，並可能對黨造成威脅者入黨，不但可以增加黨對新技術、經驗的掌握，換取政治支持，同時藉由統合改革所衍生的利益關係，達到維繫黨的影響力的目的（張執中，2008：31-35）。

表 3-2 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

年度	中共黨員 比例(%)	民主黨 派比例 (%)	人大代表比例		政協委員比例		黨政職務比例	
			各級 合計	地市 級 以上	各級 合計	地市 級 以上	各級 合計	縣級 及 以上
1993	13.3	6.6	-	-	-	-	-	-
1997	18.1	4.7	10.3	2.5	22.0	8.7	2.3	0.8
2000	19.8	6.7	15.8	6.0	25.8	10.9	3.3	2.6
2002	29.9	5.7	17.4	5.7	25.1	13.4	2.5	1.8
2004	31.7	5.7	17.9	6.8	10.9	2.4	2.4	1.6
2006	32.5	5.0	19.0	7.4	26.2	11.2	2.6	1.3
2008	33.4	6.9	21.6	8.6	29.7	11.5	2.0	1.3

資料來源：陳光金（2011：73）、豆丁網（2009/3/26）。

從多年的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情況看，參加政治黨派、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及擔任各級黨政職務，是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的最主要形式。從歷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結果看，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最重要的一種政治參與行為(見表 3-2)。1993 年到 2008 年，黨員私營企業主比重呈上升趨勢，2008 年調查的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業主所占比重達 33.4%，比 1993 年提高 20%，增幅達到 151%。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黨員業主中，並非所有人都是在成為私營企業主後，要求入黨並被中國共產黨接收為黨員的。實際上，有不少人在開辦私營企業之前曾是政府官員、國有和集體企業負責人等，他們大多數在開辦私營企業之前已是中共黨員。據估計，入黨在先、創辦企業在後的黨員私營企業主，在全部黨員私營企業主中所占比重超過 1/3。即使如此，2/3 的黨員業主在創辦私營企業之後入黨，仍然是他們積極要求參政的一個重要表徵。至於參加民主黨派的私營企業主比例，從調查結果看，15 年中並未有明顯變化，這表明與加入中國共產黨相比，加入民主黨派不是私營企業主的主要選擇（陳光金，2011：73）。

慈蘭尼 (Szelenyi, 1978: 63-68) 曾注意到，社會主義的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而權力和政治忠誠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無論是吸收入黨或藉由中共的統戰系統，使黨、政協與人大成為私營企業主或中產階層參政議政的主要場所，將其納入現有政治體制框架中。中產階層隨著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漸趨提升的社會地位，其接受政治安排以表達利益，並提供他們更方便的貸款及公務管道，反過來又強化經濟實力，從而形成三者之間的互動格局。大陸學者認為，中共對新社會階層的政治安排，突出的是其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名聲，這與組織政治安排時的價值取向相一致，也能印證政治安排的「合法性」。但是在政治安排後的利益表達過程中，社會名聲逐步取代經濟實力成為進一步政治安排之「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這一層用意，導致了新社會階層必須表達公眾利益，把維護「社會名聲」置於首位。在這種動員式的參與模式下，與其說他們在維護社會經濟發展的公眾利益，不如說在維護自己政治安排的合法性，而這也成為他們自身利益的組成部分，即一種形式的利益表達掩蓋著另一種形式的利益表達（陶慶，2004：103-104）。

相對於「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待遇，隨著 1987 年農村基層民主的啟動，「海選」模式的導入引發了基層政權選舉的勃勃生機。選民積極地投入選舉，透過法定「另選他人」的途徑，產生「民薦候選人」、「自薦競選者」，促進了選舉的競爭程度。如 2003 年深圳市福田區選舉中，深圳高級技工學校校長王亮通過選民「另選他人」的方式，獲高票擊敗兩名正式候選人而成功當選。類似競選現象已波及到縣級以上單位的人大選舉中，如北京郵電大學的許志永、北京昌平的業主聶

海亮、湖北省枝江市的呂邦列、四川瀘州的曾建余、仁壽的農民張德安，重慶奉節的姚少凡等<sup>4</sup>。

據媒體與大陸學者觀察，受到 2003 年換屆選舉的激勵，2006 年中下旬進行縣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在總數超過 200 萬的全國縣鄉級人大代表中，出來自薦或經由他人推薦者預估有 500 人，佔總數的 0.025%（紀碩鳴，2006：10-11）。只是獨立參選人的投入，也造成地方上的選舉矛盾。雖然已經比 2003 年換屆選舉有更高的參與率，但是當選率仍因地方政府態度而有不同，有地方政府動用各種政府資源，如公安部門，控制選委會、選舉程序與選區劃分，壓制獨立候選人的參選，如深圳的江山、鄒濤等人。<sup>5</sup>從若干具有指標性質的城市、省分觀察，非共產黨提名的獨立候選人，依舊無法取得進一步的突破。法律層面所賦予獨立候選人當選的可能性，被地方政府不當執行選舉法規所稀釋<sup>6</sup>。但也有如北京因獨立候選人散布在學校裏，選區與選民較為集中而贏了一些席位（江迅，2006）；或者如浙江溫嶺，因政府態度較為寬鬆而讓獨立候選人獲得七席（彭志平，2007）。獨立候選人在各地都有出現，這些都表明基層民主的發展正在產生一個新的趨勢，即中產階層用直接參與的方式介入基層政治生活中，並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和維護基本利益。

---

<sup>4</sup> 此外，如 2003 年湖北潛江市人大選舉，姚立法等包含市、鎮人大代表，教師、村委會主任、村支部副書記和工人共 32 人，由 10 名選民聯名方式成為初步候選人。但是在隨後的「醞釀」過程中，大部分被協商掉，只有兩人出現在正式候選人名單中。在 11 月 28 日的投票中，有兩位自薦候選人在「另選他人」的投票中和正式候選人一起，都因為不夠半數而沒有當選。按《選舉法》規定，這兩名候選人應該在隨後進行的「另行選舉」中作為正式候選人參選，但鎮選區指導組以選民沒有「選舉意願」而「自願放棄」另行選舉為由，沒有進行另行選舉，造成這兩個選區代表的空缺。見何永紅（2006）。

<sup>5</sup> 2006，〈地方操控選舉嚴重 威脅中央實現和諧社會抱負〉，星島環球網：[http://www.singtaonet.com:82/china/200612/t20061231\\_433986.html](http://www.singtaonet.com:82/china/200612/t20061231_433986.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8 月 20 日。

<sup>6</sup> 如湖北潛江市的姚立法在選舉前的兩天被公安部門傳詢、河北邯鄲市田奇莊被劃歸別的選區而不許就地參選、湖北枝江市呂邦列競選資料被查抄。

到 2012 年底，大陸全國縣鄉兩級人大將進行換屆選舉。參加的選民達 9 億多人，將選舉產生縣鄉兩級人大代表 200 多萬人。自大陸作家李承鵬 5 月 25 日通過微博率先公開確認參選基層人民代表後，刮起一股「公民自薦參選人大代表風」，包括天涯社區商務運營總監梁樹新、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夏商（夏文煜）、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英文《中國日報》總編輯助理五嶽散人（姚博）、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負責人熊偉、杭州普通市民徐彥、梁永春、福州市民雁南飛（林斌），江蘇常州市、浙江長興縣、湖北武漢等地都有博主、至 5 月底至少有近百人表明，依法獨立自薦參選所在地基層人大代表。<sup>7</sup>中央對此仍習以「獨立候選人」沒有法律依據來回應，但相較於前兩屆姚立法等自薦參選者，當前大陸互聯網與手機的能量除了表現在傳播公眾議題、揭露事件真相外。更重要的在於，網路在公共議題上已經可以主動發揮影響力。因此草根民意「藉網出海」體現在本屆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上，成為執政者全力防堵的外部力量。這也讓中產階層藉由網路自主參選的組織化，成為民主發展的推力。

### 三、「依法治國」與「以法抗爭」

正如前述學者的觀點，中產階層的社會批判意識漸趨顯化，其政治態度也並不保守。基於支持漸進的改革心態，依據中央宣示的改革路徑，再加以「發揚」的政治風險相對較小。比如中共提出「依法治國」的主要目標，在於建構一套適合社會經濟重建的實體法律架構，突出的是尋求國家權力法制化。但是社會存在許多違憲與侵權事件

---

<sup>7</sup> 2011，〈中國人大宣布封殺獨立候選人〉，多維新聞網：<http://china.dwnews.com/big5/news/2011-06-08/57787254.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8 日。

的壓力，如過去備受爭議的《選舉法》「四分之一」條款；2003年孫志剛人身自由權案，以及限制公民從事公務員權利的「乙肝歧視案」等，使現行法律與制度功能顯得「過時」(obsolete)而面臨修改的壓力。另一方面，「依法治國」的目標與法律實體的存在，為中產階層提供可資利用的公共財，並且提出與官方對立的觀點，形成國家與社會的認知差距，也迫使執政者必須正視。

舉例而言，「孫志剛案」發生後，透過三位博士上書人大的舉動，到《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返辦法》的廢除，激勵了更多人「以法抗爭」。如沒有法源依據的「城管」制度問題，成為學界與維權人士上書人大要求審查的對象。再者，隨著市場經濟下的利益多元化，加上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10年《保密法》的相關法規的施行與修訂後。上海律師嚴義明正式向安徽和河南省環保局申請公開本地重點排污企業，以及部分城市的環境指標等資訊。<sup>8</sup>法律學者郝勁松也向陝西省林業廳提交資訊公開申請，要求公開華南虎照片鑒定報告內容。<sup>9</sup>而隨著政府提出信息公開，上海學者蔣洪進行地方政府透明度調查、<sup>10</sup>深圳居民吳君亮為代表的志願者，不斷向政府部門提

---

<sup>8</sup> 2008，〈信息公開條例實施調查：7成受訪者擔心操作出現形式化〉，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5/12/content\\_8149460.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5/12/content_8149460.htm)。檢索日期於2011年11月8日。

<sup>9</sup> 2008，〈華南虎照鑒定遭遇『難產』 學者狀告陝林業廳『催生』〉，新華澳報：<http://www.waou.com.mo/detail.asp?id=28194>，檢索日期於2011年11月8日。

<sup>10</sup> 2011，〈部分部委三公經費遭質疑 口徑不統一監督無意義〉，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5289968.html>，檢索日期於2011年11月8日。



出預算公開申請，<sup>11</sup>配合媒體與網路的關注，政府部門的公開程度攤在陽光下被「品頭論足」後，態度上也開始有了轉變。比如廣州財政局在 2009 年收到申請要求後，將該市 114 個部門財政預算在網上公開。因此，外界也樂見社會利益多元與公民基於維權意識尋求法律之救濟，為未來政府體制調整與法治建設提供助力與範本。

### 第三節 大陸中產階層的政治機會結構

如果將大陸中產階層的成長置於比較視野下，可以發現大陸中產階層在政治和消費兩大領域完全相反的兩重性，其實是由其形成時代所經歷的全球化浪潮和社會轉型實踐所決定。在國家和市場的互動中形成了一種典型的二元體制：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國家權力機構的代理人，他們積極地推進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是充分的市場和資本所有者，他們反過來使國家和國家代理人具備了更大的調控市場和汲取資源的能力。結果，在國家和市場中，即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同時孕育了現在規模龐大的中產階層。在這個意義上說，大陸中產階層在政治上的後衛姿態，既導源於國家沒有放棄政治上的控制，現有的政治格局為中產階層留出的行動空間極為有限；也導源於國家通過市場經濟的推進，同時保證了體制內外的中產階層的經濟利益，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中產階層通過政治行動進行利益訴求的動機（周曉虹，2010：66-67）。

---

<sup>11</sup>2010，〈財政預算公開真有那麼難嗎？〉，南方週末網：<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37>，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8 日。

因此，對於中產階層的政治影響，最重要的差異不是存在於中產階層與工人階層之間，而是存在於中產階層內部的不同群體之間。持有不同態度取向的中產階層群體，發揮著不同社會功能，對於大陸社會未來走向產生不同的影響。新中產階層作為擁有最多文化資本和最廣泛社會影響力的群體，持有矛盾性的社會政治態度，是政治保守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結合體。與其他階層相比，新中產階層成員有最強的民主意識，說明他們可能會成為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們對個人生活現狀，和社會生活現狀表現出極高的滿意度，因為他們是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持有如此態度的新中產階層肯定不希望發生劇烈的社會政治變動，雖然他們有可能期望更多的民主參與機會，但他們更可能傾向於選擇漸進式的、不影響社會穩定的民主發展道路。擁有較多經濟資本的企業家階層，和老中產階層所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顯示了更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他們的民主意識較弱而權威意識較強，更可能支持威權政體，並且社會公平理念較為淡薄。

以私營企業主為例，大陸私營企業主對其相對經濟、社會、政治地位的自我評價，呈現兩個基本趨勢。一是他們的這種評價有隨時間推移而降低的趨勢，尤其是他們對其相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評價，下降得更多一些。這反映了一種情勢：私營企業主掌控的經濟資源越多，他們對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擔心越大；或者大中型私營企業主對其已經獲得的社會、政治影響力還不滿意，還期待著獲取更大的社會、政治影響力。二是他們的這種評價之間的一致性在增強，不一致程度在降低。三是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的程度和範圍不斷提升和擴大的趨勢，在意識和行動兩個層面都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積極

性。這種政治化的傾向，一方面是這個階層的利益與公共權力的關係比較密切的產物（陳光金，2011：74）。

不過，就如 Huntington (1991: 31-108) 在威權政體轉型中，提出合法性衰退與政績困局(performance dilemma)的觀點。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者不斷提出「改革危險期」的呼籲，必須正視社會各階層間的聯繫的斷裂，引發社會運動的可能原因。若以 Huntington 所提出 1,000 美金的門檻，對中國大陸而言，可能是一個更大政治機會問題。Tarrow 提出原來被政體排除在外的社會群體，一方面由於對政體的影響力增大；另一方面因威權政體改變執政方式，在政治上有所放鬆，這些改變也為社會運動創造機會（Gamson and Meyer, 1996: 275-290）。其他如舊的政治平衡遭到破壞、政治菁英的分裂、社會團體的同盟等。讓中國大陸的都市社會中，存在促成參與的反對派社群及其動員網路，最終可能構成一個誘發集體行動並促成個體參與的空間佈局（劉能，2004: 54-70）。就如獨立參選人劉萍所說：「任何挫折都阻擋不了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應有的權利」。<sup>12</sup>這些都表明當前大陸公民用直接參與介入基層政治生活，並藉此方式表達和維護基本利益。這正應驗了發展風險論，在原制度配置下，人們本可以忍受某些制度局限，但在改革改進了制度配置，將機會帶給社會成員時，那些有欲求但在現實中得不到滿足的階層不滿，就有了表達的管道，其對社會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懷疑就會在發展所提供的空間生出胚芽。

---

<sup>12</sup> 2011，〈中國獨立參選人敢問路在何方？〉，美國之音中文網：<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0921-china-activists-challenge-power-with-election-push-130297893/787997.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8 日。

相對上層中產階層的保守，作為中產階層下層的邊緣中產階層，則可能成為最具有自由主義取向的中產階層群體。他們的社會公正理念最強，對下層民眾的疾苦最為同情，民主意識較強。在網路上對政府和社會現實發表最激烈批評意見的人，大多數是邊緣中產階層成員。邊緣中產階層的主體部分是 80 後青年，他們文化水準較高，熟練掌握網路交流工具，關心社會問題並熱衷發表意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但他們也是承受市場競爭壓力最大的中產階層群體，就業壓力和房價壓力嚴重阻礙他們中產階層夢想的實現。生活夢想與現實差距導致的焦慮心態，可能激發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並且也有可能成為激進政治自由主義的溫床。如果中產階層當中有哪一個群體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潛在製造者，那就是邊緣中產階層（張翼，2008：117）。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內部存在著多種價值取向，既有保守主義的成分也有自由主義的成分。但未來走向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如果擁有較多激進自由主義思想的年輕人，加入中產階層隊伍，或者邊緣中產階層成員焦慮心態進一步蔓延，或者中產階層上層（企業家階層和新中產階層）與中產階層下層（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拉大，導致價值取向的割裂，都有增強中產階層成為潛在不穩定因素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擁有較多自由主義思想的邊緣中產階層成員，隨著年齡增長和社會經濟地位改善，並順利加入中產階層上層隊伍，他們的保守主義意識可能增強，中產階層將會繼續發揮社會穩定器的功能。

## 第四章 中產階層對大陸社會的影響

中產階層的形成、壯大與穩固，往往代表一個社會穩定以及變動力量的發展過程，中國大陸的情況也不例外。自從改革開放以「穩定壓倒一切」做為社會發展的主軸，大陸社會的穩定與變動往往與中產階層的態度脫不了關係，不論是政治改革的鬆緊或者是經濟改革的左右，中產階層所直接面臨的衝擊，將反射為此群體對社會穩定的態度。從理論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社會功能主要有底下三個面向（李路路，2008；陸學藝主編，2002；陸學藝主編，2005）：

首先，中產階層是社會的穩定力量，也是促使社會改變的力量。從階級分化的角度來看，中產階層可以做為貧富分化及社會利益衝突的緩衝器。隨著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層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一旦獲得合法地位以及社會認同，將成為社會利益結構的主體，可以緩解金字塔上下兩極分化對立的矛盾衝突。

其次，中產階層的人數的成長意味著社會結構並非凝結，而是有可能產生上下的流動。因此，中產階層的存在，意味著社會有某種程度的公正性（不論公正性質有多強），讓一般大眾利用市場改革所釋放出來的機會改善自己的階級與身份地位、聲望以及權力。

最後，中產階級所形成的文化價值，形塑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風氣與態度。在經濟生活上，中產階層示範了市場經濟中所強調的交易規則以及公平競爭等規範行為。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中產階級相對保守、溫和、穩定的社會政治傾向，對於環境和資源的社會公共安全、弱勢群體的社會處境，所訴求的是體制內制度改革，而非體制外的全然反抗，因此能夠在推進社會改善的同時，穩定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致於釀成流血衝突，破壞「和諧」。

中產階層的功能取決於該群體對於生活現狀的滿意與對未來生活的期待程度，以及階層內部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否能夠調和，假如中產階層對於社會不滿的程度提高，其穩定社會的功能就會逐漸下降，進而成為反對國家統治與發起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因此，我們在分析中產階層的興起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時，不單單看到中產階層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更恰當的作法是從中產階層內部價值觀的變化，分析多元價值觀給中國大陸社會帶來的衝擊。因為任何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取之於社會結構所形塑的意識，而意識將決定行動者在結構之中所採取的行動。因此，我們從中產階層內部的分化切入，剖析大陸中產階層多元的價值觀，從價值觀分析中產階層龐大的消費力量現況，消費力的差異造成中產階層生活在城市的負擔過大，最終引起中產階層對社會不滿，進而促發社會運動（抗爭）的可能性。最後，不同於過去的群眾運動由國家所動員，新式的社會運動是社會自發的行為，在威權體制與法規的限制下，中產階層的抗爭策略出現改變，特別是網路所提供的社會空間、機會結構與資源動員方式，都在當代中國的變遷中發揮效果。

## 第一節 中產階層的價值觀與消費

### 一、分化的價值觀

中產階層並非單一群體，階層內部有很高的差異性，特別是大陸的中產階層因為分佈的地區廣，而有不同的生活、品味、習性與階級文化。學者從職業、收入、教育、聲望、消費、性別、種族、品味、認同和社會政治態度來定義中產階層，而每一種定義所指涉的對象、中產階級、背景、及形成因素都有些不同，如此可知中產階層在的多

元與分化。李路路、李升（2007：22）就認為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構成是複雜的，是在中國急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之下「突生」出來的，並非取代是老世代而是和老世代共生，因此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不同的中產階層部分其階層化的經歷是不同的，因此也會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徵。

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研究群從社會結構的因素，將當時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分成四類（陸學藝主編，2002：255-256）：

- 1.傳統「中產階級」，包括小業主、小商販等自營業者、個體戶。
- 2.計畫體制「中產階層」中分化出來的部分幹部、知識份子。
- 3.改革開放以來新生的私營企業主與鄉鎮企業家。
- 4.由引進外資及高新技術人才而生的新型中產階層。

這四類型中產階層的共同特色，在於其職業的回報以及人力資本的價值都是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而逐漸提升，而且隨著改革時間越長人數也越來越多。只不過，當人數的增長以及收入差距的擴大，中產階層的內部也產生了一定的分化，因此在中產階層的內部又可以分成中上層、中層與中下層（陸學藝編，2002：259）。中上層包括私營企業主與專業技術人員。私營企業主在傳統上被歸類為資本家，但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投入市場經濟的私營企業主，卻是憑藉著社會網路的關鍵位置，利用政治資本與社會資本，有效的為自己累積大量的經濟資本並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例如進入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是政治協商會議發揮政治影響力，不斷複製自己的地位優勢。至於中層則包括公務員、辦事員、小業主和個體戶等，這兩類人的差異更加明顯，前者

是改革開放後引進外資與產業結構升級所出現的新群體，教育程度、勞動方式、職業聲望與權利、報酬、生活方式及價值觀都比個體戶與自雇者要來得高。至於中下層則是包括商業、服務業人員以及白領工人，也是中產階層人數最多的一群人，他們在改革之初國民收入相對較低時處於中產階層，但其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更貼近下層階級，因此在改革深化收入提高之後，這些人因為所得上升慢就落入下層階級（陸學藝編，2002：259）。

中產階層內部各層均有兩種社會結構性質截然不同的職業群體，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也透過不同的資源分配（再分配、市場、互惠）機制獲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由於所走的生命軌道（life course）完全不同，因此雖然他們在學者的定義中都屬於中產階層，但是卻因為工作單位、財產所有、教育與成長背景而孕育出不同的社會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會決定他們自己對於中產階層的認同，以及中產階層對社會的影響。雖然在傳統的階級研究中，這些人都可以被歸類為中產階層，但是內部的差異會影響到他們與社會互動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及方式。

所以我們在分析中產階層社會角色，還有對生活的滿意度，對未來的期待時，無法將他們視為一組利益一致的團結階層，而應該視為是彼此有利益衝突，價值觀多元的群體。整體來看，中產階層存在著：

- 1.傳統的價值觀：安於現狀、循規蹈矩，典型者為個體戶、小業主；
- 2.現代性的價值觀：開括、進取、注重個人價值及其社會形象，典型的是公務員、辦事員；
- 3.後現代的價值觀，強調個性體驗，不受社會規範約束，典型者為受雇於外企白領、自由職業者（陸學藝編，2002：266）。



這三種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對於現在與未來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保持體制的「求穩」，有的人追求體制變革的「求改」，而有些人強調的是改變體制的「求變」。舉例來說，有些中產階層更仰賴的是計畫經濟所遺留下來的行事邏輯，例如私營企業主，他們對於現代市場經營與科層制的組織管理模式較為陌生，因此仰賴的黨國體制之中的人際關係運作模式和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公有邏輯，關係作為一個在市場上攻城掠地的武器，並未隨著市場的深化而失去其顯著的地位（Yang, 2002）。作為市場部分改革（partial reform）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會更安於現狀，也擔心體制的改變會影響到他們現有的成就。另有一部人他們是隨著外資引入後成為專業的經理人與企業菁英（business elites），他們更適應現代化的理性管理模式，因此期待整個制度能夠朝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的方向來走，也就是期待制度的變遷能夠朝法治（rule of law）的方向來走。這群中產階層憑著他們在經濟上的實力，雖然在正式政治中尚未產生影響，但卻是一群力量逐漸增大的利益集團。由於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因此雖然對體制有諸多的不滿，但尋求的是體制內改革的道路（Dickson, 2003; 2008）。第三類人雖然在改革開放中受益，但他們更多的是對現有情況不滿，尤其是對黨國體制不透明所產生的不公、不義，以及官員的貪腐感到憤怒，他們認為體制內的改革已經不足以改變現有的情況，因此期待營造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也期待籌組一些更具社會自主性的非政府組織，達到監督國家改變政權的終極目標，然而這種目標在現有的體制之下使得他們的行動策略受限，只能政權許可的範圍內進行一些公民權利的訴求。

正因為這三股不同的價值觀，對政權產生三種不同的態度，因此中產階層能否發揮其穩定社會的功能，存有很大的未知數與爭議。

## 二、中產階層的消費壓力

職業地位的不同除了影響了中產階層內部的價值觀，也直接影響到中產階層的消費習性。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在消費領域已顯示巨大的能量，不僅是推動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主要的動力之一，也是全球跨國公司關注的消費目標。然而，這樣的結論是廠商單方面的期待與預測，或者是中產階層實際的消費行為，學者對此有很大的爭議。周曉虹（2005）研究指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在消費上走的比較前端，願意花錢添購新式的產品，是消費的「前衛」（周曉虹，2005）。但是，李培林、張翼（2004：239-240）的研究卻指出，中產階層在消費上其實相當保守，龐大的中等消費階層雖然具有消費能力，但卻沒有消費欲望，基本上不願意「超前消費」。<sup>13</sup>因此，中國大陸有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但消費力卻顯得相對疲弱。此外，李春玲（2007）過去的研究也發現，中國大陸的消費呈現「兩端特徵明顯，而中間部分趨同的現象」，高消費人群表現出與其他群體明顯不同的消費模式，而貧困人則是保持著非常低的消費水平和維持基本需求的消費模式，中產階層的消費分層現象不明顯，基層成員內部消費水平的同化程度較低，這也呼應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價值觀多元所產生的影響。

社會學者早已提出消費呈現的是一種個人的品味，有時候甚至是為了炫耀而消費（Veblen, 1921），當集體社會的特質被市場經濟的思維所滲透，個人就會透過消費來呈現個人所追尋的價值。戴慧思

---

<sup>13</sup> 所謂的超前消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超前於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消費」，也可以被理解為「引導社會消費的消費」。其二是「超過自己現有消費能力的消費。」例如，在一般手機尚未普及之前，就有人先購買享用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全新便利性，還有個人透過信貸、分期付款，預先購買自己現有的經濟能力無法負擔的物品（李培林、張翼，2004：239）。

(Deborah Davis) 等人對中國 90 年代的消費文化所做的研究發現，當代中國消費文化顯現出個體化傾向，社會生活領域中不斷增長的個人自由和空間，使消費行為個體化 (Davis, 2005)，這也讓消費成為一種反映階級價值與特性的社會行為。中產階層的消費除了影響到國際市場物價的波動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消費金額大小所顯露出來的消費分層，讓個人社會地位因消費行為被赤裸裸的攤在社會大眾的面前。中產階層的消費是否透露其與眾不同之處？

李春玲 (2011b: 212) 最新的研究進一步探討中產階層的消費水平與消費方式。作者指出相較於 2007 年的調查，當時符合中產階層客觀標準的人當中，僅有 26.4% 的人承認自己是中產階層，其他條件上符合但主觀地認為自己的生入、生活品質或生存狀態未達到中產階層的人佔多數。到了 2010 年，承認自己是中產階層的比例大幅提高，符合客觀標準的人當中，有 60% 的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這意味著中產階層作為一個身份標籤，已經獲得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所認同，也讓他們消費更符合中產階層的味道。

在總支出方面，從消費的支出上面，中產階層的家庭年支出是農民階層的 3.4 倍，是產業工人和商業服務業工人的 1.9 倍和 2.3 倍；家庭人均支出是農民階層的 4.5 倍，是產業供人和服務業工人的 2.3 倍和 2.5 倍。家庭日常支出是農民階層的 5.6 倍，是商業服務業工人的 2.6 倍和 2.4 倍 (李春玲, 2011b: 212)。雖然中產階層家庭的消費支出看似比較高，但是中產家庭只把 60% 的收入用於消費，另外的 40% 成為家庭的經濟結餘。這表示中產階層的家庭在消費上比較保守，也沒有超前消費的傾向，這顯示出中產階層有巨大的消費潛力，

未來是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而這正是中國大陸「十二五」以擴大內需為施政主軸主要的因素之一。

然而，中國階級的消費力量也出現很大的落差，當三大件已經成為所有家庭必備的電器用品之後，「有房有車」就成為中產階層下一步追求的目標。2007 年調查數據顯示，中產階層擁有私家車比率為 29%，另有 8.2% 的中產階層計畫在一年內購買汽車(李春玲, 2011a)。2007 年中汽車市場新增 879 萬輛，2008 年因為統計局統計規則改變，汽車市場只稍微成長 7% 來到 938 萬輛。2009 年中國汽車產業再度爆發，總量超越日本、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每年有 1,300 萬輛的新車進入市場，到了 2010 年這個數字再度成長 32.4% 來到 1,800 多萬輛。從這些數字來看，雖然我們缺乏較新的統計數據，但是從整體汽車市場的成長，可以預估中產階層擁有汽車的比例應該已經超過 50%。如此大的汽車成長，除了顯示出整個中國消費市場的改變之外，也顯示出中產階層的消費力已將汽車列為生活必需品之一。

另一個看待中產階層消費力量的是房屋買賣。2007 年中產家庭擁有私有住房的比例是 97.3%，其中 78.5% 擁有一套住房，17.5% 擁有兩套住房，1.4% 擁有三套以上的住房。如此高的住房擁有率並未抑制人們購屋欲望，中國房地產的漲幅在最近幾年依然相當驚人，核心地段的房價更是一般中產階層難以負擔。假如現有中產階層的房屋是來自於單位時期的分房，新一代的中產階層在薪資漲幅比不上房價成長的落差下，已經讓買房成為他們收活壓力最主要的來源。根據最新的《中國大中城市青年居住狀況》報告顯示，住房支出對於大多數租房或買房的年輕人來說，都不輕鬆，2/3 的城市青年表示壓力「非常大」或「比較大」。

## 第二節 中產階層過度集中、城市環境與物價

### 一、人口過度集中與環境惡化

根據統計，最近 30 年來中國城市的成長快速，1978 年中國僅有 193 個城市，而 2007 年年底城市的數量是 651，是 1978 年的 3.4 倍。1949 年 100 萬人口上的城市是 10 個，而到了 2008 年是 122 個。中國大陸城鎮的人口數量也快速成長（見下圖 4-1），1978 城鎮人口數量是 1.73 億，2007 年為 5.94 億，相較於農村人口約佔總人口的 53.4%，中產階級主要集中於城市（李春玲，2011a：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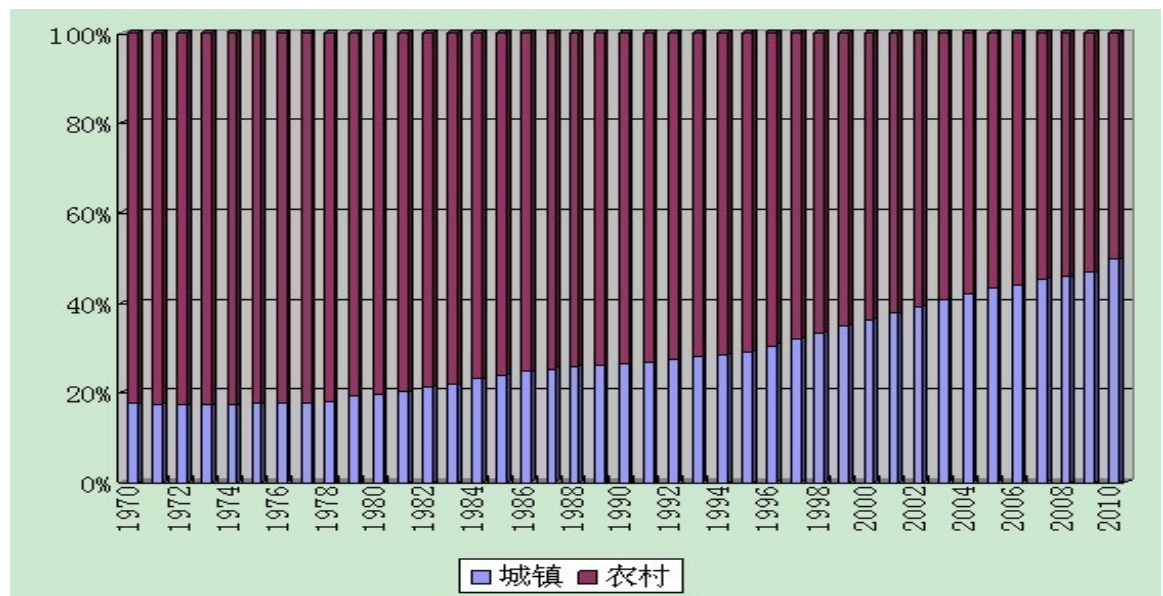


圖 4-1 1970-2010 年中國城鎮農村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馬茲輝，〈中國城市化不是超前而是滯後〉，  
<http://www.globrand.com/2011/525223.shtml>，連結：2012/6/22。

中產階層人數增加快速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裡，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讓城市的負擔過大，公共設施、治安、衛生、醫療、教育、房屋

等都因為不足以及品質參差不齊，加上市場經濟的炒作，讓許多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無法獲得滿足，成為中產階層最大的痛苦以及不滿的來源。前面提到中產階層的汽車消費量每年都以極高的成長率增加，這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大陸城市交通設施的嚴重不足，另一方面也會造成都市的空氣污染與交通堵塞。僅以一個實際的經驗為例，研究團隊至北京進行訪談時，每天早上 8 點鐘至 9 點鐘無法在路上叫到計程車，理由除了北京市對計程車的嚴格管控造成需求大於供給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時刻，出租車都堵在路上，載客的流轉率相當低，在訪談時也常聽到受訪者對於北京大眾運輸的抱怨，像是地鐵過度擁擠、轉乘不易等等。

汽車的過度膨脹的結果必然造成空氣污染更加嚴重。2011 年 10 月底美國駐北京使館針對北京的空氣發佈了「有毒」的警告，這不僅在公眾之間掀起一番議論，也引起北京環保局與美國使館之間的緊張。不論檢測的真相為何，北京的空氣污染從北京奧運舉辦之前就是一個引人關注的話題。空氣、環境惡化與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加背後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過去 30 年來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而罔顧環境變遷此潛在的惡果。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中產階層人數的快速增長是以環境快速惡化為代價。前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發達生產力的目標與世界工廠的發展策略，使得中國在各種資源消耗上名列世界之首：「煤炭、石油、鋼等能源消耗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原材料進口世界第一；中國是工業木材紙漿紙產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場，石油進口全世界第二，單位 GDP 能耗是發達國家的 8 到 10 倍，污染是發達國家的 30 倍，勞動生產率是發達國家的 1/30。化學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

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10 年以後第一。...江河水系 70% 受到污染，40% 的嚴重污染，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不足 20%，工業危險廢物化學物質處理率不足 30%。三億多農民喝不到乾淨的水，四億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乾淨的空氣，其中 1/3 的城市空氣是嚴重污染。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 20 個城市，中國占了 16 個，一多半的城市空氣不達標，...1/3 的國土被酸雨覆蓋。」如此龐大的資源消耗，讓中國大陸的環境與物價雙雙飛漲。除了消費物價引發的民怨，中產階層開始關心到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各式各樣的環境保護組織（ENGO）競相成立，有的關心空氣，有的關心水質，有的關心動植物的保護，這是中產階層展現自主性的動力（Yang, 2005）。在下一節我們會詳細分析。

## 二、人口過度集中與消費物價

教育與醫療的商品化是中產階層人數增加所引發的另外一種惡果（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深化的另一面）。受到戶籍制度的影響，中國的教育市場向來呈現城市嚴重不足而農村教育又品質低落的現象。中產階層形成與擴大讓城市的醫療與教育問題比過去更嚴重，問題不在於醫院或學校無法提供適當的教育或醫療產品，而是當中產階層的消費力隨著收入提升，人們更願意花錢去爭搶有限的使用機會，互相攀比與競爭的結果，就是讓教育與醫療成為一個有帶有位階的商品。好的教育可以拿到市場上供民眾競標，好的醫療可以超高的醫療費用限制其他階層的人使用。教育與醫療就在這股消費風潮中，成為市場上被炒作的商品。以教育為例，凡是戶籍不在城市的人，就沒有在當地就學權利，早期受教權被剝奪的現象可能只出現在農民工，所以非法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因應而生。

現在不僅僅是沒有戶口的農民工，即便是已經落戶的城市中產階層，依然要為子女的教育付出大筆的費用。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 2009 在黑龍江所做的調查，有七成的家長覺得教育費用難以承受。這些費用主要包括補課費、擇校費、住宿費、生活費等。子女平均每人每月消費金額在 600 元以內的占 37.4%、600 元至 800 元的占 23.8%、800 元至 1,000 元的占 18.9%、1,000 元以上的占 19.8%。家庭子女平均每月消費的金額占整個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占 1/4 以上。<sup>14</sup>這使得教育費用和住房一樣都成為中產階層最主要的生活壓力來源之一。

教育原本是社會流動最主要的渠道，當教育成為一個有限的商品，原本中下階層倚靠教育往上流動的希望就會逐漸消失。面對教育的商品化，政府不僅未強化對教育此公共物品的補充及提供，反而是透過不同的政策來切割各個階層的教育機會，擴大不平等。研究團隊曾就此議題訪問過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景軍教授，景教授從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來源進一步闡述階層流動趨緩以及階級再生產的問題，他發現清華的學生在省際之間、省區內部、城鄉之間有嚴重的不平等。根據清華大學 2007-2010 年的新生入學資料發現，各省招生的計畫比例、機會指數的兩極之間相差巨大。北京的招生計畫占全國計畫比例的中位數為 16.23%，而排名第二位的湖北省占 5.14%，比例最低的西藏僅占 0.05%。機會指數方面，北京機會指數的中位數為 15.97，第二位的天津考區為 3.42，排名最後的廣東考區為 0.45。雖然由於北京的生源減少，招生計畫數從 316、296、270 到 243 人有所下降，但

---

<sup>14</sup>2009，〈黑龍江七成家長認為教育費用高昂難以承受〉，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08/content\\_12411441.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08/content_12411441.htm)，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其機會指數卻從 14.61、14.76、17.23 到 18.81 繼續升高。可以看出，北京作為首都，考生進入清華的機會優勢明顯。一方面北京經濟發達，教育經費充足、基礎教育水準較高、高等院校集中，歷年的優質高中生源得到了清華的肯定，歷史上充足的招生計畫名額一直延續。另一方面，清華受教育部和北京市的雙重領導，與北京市存在共建協定且得到一定的資金、政策支持，這促使清華在招生計畫上對北京有一定的傾斜。這種招生「偏向」本地的情況在全國許多高校有所體現，例如北京大學 2010 年校本部與醫學院 3,280 名的招生名額中，北京考生的錄取計畫是 635 人，遠多於在其他省份，而西安交通大學每年在陝西省的招生數也占招生總數的 30% 左右。

清華大學的生源結構呈現出很嚴重的城鄉差距與區域差距，這種情況主要受到高考保護主義、城市化以及入學管道多元的影響。首先，戶籍制度與高考的掛勾，讓所有的高中生都必須回到自己的戶籍地參與高考，這讓高考所帶來的地域流動顯得更加困難。其次，家庭背景、自主加分等因素也深深影響到高校的生源。清華的新生中每年有約 1/7 是保送，有 1/7 獲得自主加分，這些先天條件的不平等，讓高考做為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已經「幾乎」不可能了。以上海為例，復旦大學的生源有 70% 來自於上海。即便政府有意識到這件事，也透過一些方式來進行矯正與彌補（例如少數民族加分），但整體的效果有限，整個入學體制已經將將社會流動固化，讓無法出頭的人更無法出頭（訪談紀錄 20110831；景軍，2011）。

### 第三節 中產階層與社會組織、社會運動及網際網路

#### 一、中產階層與社會組織的成長

中產階層崛起對社會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社會組織的數量成長以及組織自主提高。1978年，當中國決定放棄毛澤東時期的計畫經濟路線改走市場化改革之路時，還是一個由共產黨掌握資源分配的單位社會。在這個具有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色彩的共黨社會裡，依附在黨國體制之下的個人缺乏發展組織的權力與資源，社會上存在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只不過是黨國權力延伸，是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

三十年改革過去，被壓抑的社會力量伴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開始衝擊原有的體制。市場轉型理論告訴我們，共產黨壟斷再分配的權力格局將因為市場機制的引進而被打破，資源按照市場化規則分配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階層會重新洗牌，共黨權力會逐漸貶值，由經濟權力取而代之（邊燕杰等，2002）緊接著現代化理論提醒我們，一群具有經濟實力的「社會中間層」將萌芽形成足以和國家能力抗衡的市民社會，最明顯的就是第三部門的出現。結合民間人力與資源的 NGO 將透過集體行動，改變國家的政策帶動民主化的發展（Gordon White, 1993）。有趣的是，這兩個理論所預告的現象在中國都沒有出現，共產黨所代表的權力資本並未貶值，而是在新的制度安排中延續優勢（Zhou, 2004）。新興中產階級的壯大也沒有產生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會，中國的 NGO 還是牢牢地掌握鑲嵌在黨國體制之下，受到國家嚴密的控制（王信賢，2006）。為何理論與實際的落差如此之大？

中國是唯一經歷市場化轉型仍然由共黨維持極權統治的後極權主義政體，但是為了發展經濟維持政權統治的合法性抒解潛在的社會威脅，國家又不得賦予市場社會自主的空間，讓社會組織扮演國家與群眾之間的溝通橋樑。如此一來，NGO 雖然獲得發展的契機，卻又必須同時面對後極權主義政體對「組織性」的恐懼。後極權國家對 NGO 發展的兩難心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開放的同時，又設下重重的制度抑制 NGO 的活動的能量。

90 年代以來，市民團體在後社會主義國家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這些 NGO 有些從社會主義時期延續下來，更多是黨國體制衰退重新取得發展空間的第三部門，如同業公會、商會、基金會、環保組織等等。而這些 NGO 卻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由於民眾缺乏參與熱情，大多數必須仰賴國家資源挹注才得以生存，也讓觀察者認為這些組織缺乏自主性稱不上真正的 NGO。但 Petrova 與 Tarrow (2007:80-83) 認為此種「參與行動主義」(participatory activism) 只是其中一個視角，若將觀察的焦點轉移到社會組織間關係的「互動行動主義」(transactional activism) 層面即可發現，許多地方 NGO 透過橫向的聯繫，將整個集體行動的影響力逐步擴展至全國與國際的位階，透過組織的力量扭轉政府的決策。以東歐國家的經驗而言，組織性力量遠比參與人數來得重要，統治者面對具組織性菁英的壓力遠比一般群眾來得大，而這也是 NGO 對於後社會主義國家市民社會發展如此重要的原因 (Petrova and Tarrow, 2007: 80-83)。

就此觀察中國，在 1949 年建政後所實施列寧式黨國體制與計畫經濟的體制制約下，中國大陸存在明顯的「強國家、弱社會」特徵，國家掌握了社會中絕大部分資源的控制和配置權，對於社會活動也採

取全面的滲透與監控。在此情況下，社會組織幾乎沒有任何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與環境，而中共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把社會組織當作異己力量，對其採取了高度戒備的立場。官方唯一認可的「社會團體」是在中共「群眾路線」的方針下存在的「人民團體」，這些團體在官方的特許下成立，享有政府編制，幹部與工作人員均具有行政級別，經費也由政府劃撥，直至 1965 年，相關團體尚不滿 100 個，同時期的地方性組織也僅有 6,000 餘個。然而，始自 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大陸產生了巨大的制度變遷，不僅重新塑造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為各類社會組織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空間。根據中國國家民間團體管理局所公布最新數據，中國合法的社會團體有 238,747 個，基金會 1,843，社會組織 431,069 個，民辦非企業 190,479 個，全中國合法登記的社會組織已超過 85 萬個。而根據清華大學 NGO 研究中心主任王名則認為，此數字保守估計為 300 萬之譜。除此之外，民政部亦公布，2007 年全中國各類社會組織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 456.9 萬人，比 2006 年增長 7.4%，形成固定資產總值 682 億元，比上年增長 61.2%；收入合計 1343.6 億元，比上年增長 111.3%；各類費用支出 900.2 億元，比上年增長 99.9%；社會組織增加值為 307.6 億元，比上年增長 173.9%，占服務業的比重為 0.32%。且重要的是在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奧運會中，社會組織和志願服務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了廣泛關注。<sup>15</sup>2008 年川震之後的志願者行動以及草根組織的動員，甚至讓許多人樂觀地將此譽為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

---

<sup>15</sup> 2008，〈民政部召開全國社會組織管理暨執法監察工作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zdt/2008-10/13/content\\_1119500.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zdt/2008-10/13/content_1119500.htm)，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

然而，這麼多的社會組織到底可能給中國政治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中產階層做為社會組織的載體，在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成為社會力量的主體。也是國家吸納、籠絡與打壓的對象。從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看來，社會抗議往往是自由化與民主轉型的前奏。以台灣為例，80年代中後期開始，社會抗議運動幾乎是「遍地烽火」，包括消費者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原住民運動、弱勢團體運動、教師運動以及宗教運動等等，不一而足，使得台灣除了軍警與公務人員外，幾乎再也找不出一個保守而安靜的社會類屬。即使在戒嚴體制下，不少有環境意識的個人早就進行組織活動，發展出綿密的人際網絡，各種草根性、非正式的環保團體也經常互相串連，也因此出現了跨區域與跨階級的環保運動，也為日後台灣社會力(social forces)的湧現與結盟奠定堅實的基礎(李丁讚、林文源，2000：133-206)。

目前中國大陸社會抗爭也層出不窮(王信賢，2006b：85-114)，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社會運動的頻率與規模均不斷擴增，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從1993年至2003年這十年間，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由1994年的1萬件增加到2003年的6萬件，成長6倍，年均成長17%，此外，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數年均成長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而2006年，此數字已超過九萬六千件，超過八百二十萬人次參加，平均一天發生高達263件集體抗爭事件(吳忠民，2005；謝岳，2008)。

從目前所發生的社會抗爭事件看來，不論是議題或規模都極為驚人，就前者而言，包括工人抗爭、農民工維權、農民運動、校園抗議、

城市「業主」維權運動、退伍軍人抗爭以及近來國際社會頗為關注的「西藏事件」所代表的種族抗爭等，甚至是一般的突發事件皆能引起集體抗議與衝突；就後者而言，近年來見諸報端，超過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屢見不鮮，包括重慶萬州的「挑夫事件」、安徽蚌埠萬名退休工人「集體散步」、河南鄭州市中牟縣「漢回衝突」、四川雅安市漢源縣因大壩截流施工所引爆的衝突、廣東番禺區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事件」以及廣西「博白事件」，以及「西藏抗暴」、貴州「瓮安事件」等。而我們必須關注的是在這些抗爭中，社會組織有無扮演角色？

目前看來，各類社會運動，有部分雖初露「組織性」，根據大陸學者于建嶸（2003）以中國中部省份為調查對象得出結論，認為當代中國農民的社會抗爭從 1998 年以來已進入了「有組織抗爭」階段，有些甚至還宣佈成立各種包括「農民民主政府」、「農民土地委員會」、「農民自救委員會」、「農民聯合政府」、「農民自救自治政府」、「農村農民土地改革委員會」與「農民革命政府」，或「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減負維權會」等名稱之組織。此就諸多大陸學者角度而言，此種觀察似乎有誇大之嫌（謝岳，2008；馮仕政，2008，231-268）。即便是有，距離真正意義的「組織性反對」還有一段很長的差距，一旦出現明顯的「組織性」以及明確的反政府傾向，即遭受來自國家的鎮壓力量，80 年代末的學生運動以及「法輪功」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些農民的「自力救濟」也與「社會組織」的意義迥異。

若從社會組織的角度出發，大部分合法登記的組織都在政府的控制範圍內，他們做的工作、地點、範圍都是在政府的允許下才能作，

其他上百萬個草根組織雖生存於體制之外，並不意味著其能擺脫政府的影響，事實上正好相反，針對社會問題，包括環保、愛滋病、扶貧、婦女權益等目標而出現的草根組織，往往牽動政府的敏感神經，而受到監控，其在進行活動時也無法避免與政府這一社會最高公共權威打交道，或受到政府的影響；在民眾的意識中，社會的自發組織、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往往要通過政府的倡導才能實現，而草根組織對政府的態度也是「理性」的，其願意甚至渴望與政府合作，利用政府資源。即使如此，當社會組織的數量與參與的人數已經龐大到足以撼動整個體制的改變時，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也逐漸出現改變，例如備受爭議的雙重管理體制，在近期已經有朝直接登記制改變的聲音。

2011 年底，廣東對社會組織規範管理推出新規定，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不再需要掛靠主管單位元。依據《關於廣東省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規定，從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無須前置審批。同時，行業協會將率先引入競爭機制，以後將允許一業多會，允許跨地域組建等。本次改革的重點在於行業協會、群眾生活、公益慈善類、社會服務類、異地商會、城鄉基層社會組織、涉外社會組織、樞紐型社會組織等社會組織，核心是降低登記門檻，簡化登記程序<sup>16</sup>。

---

<sup>16</sup> 2011，〈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應全面推廣〉，中國網，2011/11/25，[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9\\_28469.html](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9_28469.html)。

同年，長沙和北京也推動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如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長沙市社會組織登記和監督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工商經濟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福利類和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等四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北京市也推行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和社會服務類的社會組織無需再找主管單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門登記註冊、政府部門業務指導<sup>17</sup>。相較於長沙與北京降低四類社會組織登記門檻，廣東的放寬幅度顯然更大。

在黨國體制下，社會組織可能成為集體行動的載體，也可能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由於具有挑戰與資源的「雙重屬性」，黨國自然必須各類社會組織的特性，採取多元的分類控制策略（康曉光、韓恆，2005：73-89）。對協會、商會和社會服務等，其潛在挑戰能力較弱，但卻能提供重要公共物品，黨國傾向鼓勵和支持；相對宗教和政治組織則依然嚴格控管。此外，觀察大陸在不同類型的試點經驗，中央從試點的經驗中改革制度，但地方與基層卻因為少了制度依託，讓改革進展受體制所限制（張執中，2008：80）。對廣東而言，深化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改革，還必須同行政體制改革、事業單位改革，綜合配套一起總體推進。就如媒體報導「僅僅單兵突進走不了多遠」<sup>18</sup>。

再者，從法源上去觀察社會組織的發展根本比不上直接觀察國家政權（政府官員）對民間組織的態度，在欠缺自由的環境中，國家還

---

<sup>17</sup> 2011，〈各地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 『寬審批』後要『嚴監管』〉，中新網：<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12-10/3522600.s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

<sup>18</sup> 2012，〈「若單兵突進，會碰到很多困難」〉，深圳新聞網：[http://big5.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12-05/25/content\\_6776149.htm](http://big5.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12-05/25/content_6776149.htm)，檢索日期於 2012 年 5 月 25 日。



是會透過各種武器（例如查稅、直接帶走負責人）壓抑民間組織的聲音，所以短期來看中國社會組織只是數量上的增長，能否發揮實際的影響力還是取決於國家政府的態度。

## 二、中產階層成為社會運動（抗爭）的主體、抗爭策略的轉變與網路空間

個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反映對現實狀況的感受。高滿意度意味著希望維持現狀，而低滿意度意味著希望社會變革。中產階層是西方市民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非政府組織中產階層的角色與定位決定在國家是否有能力提供這群社會主力在體制內努力向上爬升的理由，透過制度吸納（incorporate）中產階層的訴求，消解可能產生的反對力量，並由中產階層往外擴散，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核心。然而，中產階層是否真能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現代化的另一面就在中產階層對於體制的破壞力。經濟發展讓中產階層人數增多，有更多人處於相同的社會結構之中，因此當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滿足感慢慢消失，或者是由經濟引發的政治改革訴求，如此多的中產階層將給政權帶來龐大的壓力。從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經驗來看，改革初期因為短缺經濟，勇於投入市場測試政策水溫的先驅可以在前期獲益，但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掌握政策走向、具有背景、人際網路比較廣闊的追隨者，則是會後來居上成為市場改革的真正贏家，經驗資料已經證明中國改革路徑大致也是如此（邊燕杰編，2002）

當貧富差距擴大以及政策不透明造成的貪污腐敗不斷擴大，擁有經濟基礎與知識權力的中產階層，一方面是穩定社會的主要力量，另

一方面也是挑戰政治、質疑統治正當性的主要發動者，從 90 年代末期的蘇東波到 2011 年的茉莉花革命，知識份子以及掌握新抗議工具的專業工作者，都造成社會動盪與改變。然而，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一直不是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其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中產階層對於體制與權力的「依附」。李路路教授認為「依附」是指：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中產階層作為一相對獨立的階層或群體存在，但是，它們沒有相對獨立的作用和行為，而是依附於某一個社會階層或利益集團，特別是某種威權主義的政體。所以，大陸的中產階層從主客觀意義上雖然存在，但是他們並非具有自主意識的行為主體，而是依附在國家政權底下，大部分的行為都是在回應國家對社會的統治與控制，而不是主動改變國家的治理行為（李路路，2008a）。

即使如此，政權對中產階級的形成及壯大一直都充滿著警惕。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來源可以分成體制內與體制外，特別是城市的菁英，一是透過擁有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本的上一輩進行「階層再生產」，另一方面則是有部分的人士來自於市場經濟深化過程中所達成的代際轉換，中產階級的來源不同，就會產生相對獨立的利益（鄭輝、李路路，2009）。中國大陸與其他社會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其中產階級的形成是從「社會主義體制」出發，因此欠缺組織化的基礎，沒有宣傳沒有組織，所以大部分的抗爭終流於騷亂（riots）而無法變成社會運動，欠缺領袖與策略，只能在混亂中發出怒吼而無法形成具體的訴求（訪談紀錄 20110901）。

但是從社會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中產階級所主導的社會運動已經逐漸成形。他們會在偶發事件中凝聚共識，透過一次又一次

的極端事件，抗爭行為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模式與樣態（訪談紀錄 20110831）。2007 年廈門市居民為了反對 PX 項目，由民眾自發號召上萬人以「散步」的方式，反抗一個政府通過的合法項目。周志家（2011）對於 PX 事件的細緻分析就指出，教育程度越高、個人收入越高，民眾參與環境運動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群體壓力是民眾參與抗爭主要動機。2008 年，上海市民也以同樣的散步模式，柔性反抗政府即將進行的上海磁懸浮計畫。從這些事件的研究可以發現，中產階層參與社會抗爭的比例高於其他階層。今年（2011 年）8 月 14 日大連的居民再以同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於大連福佳大化 PX 項目不滿，最終改變政府的決策。這樣的現象成為當今中國內部國家與社會關係反覆角力的場合，並且從中顯露出社會改革的契機。

由此可見，收入、教育程度相近的一群人將會彼此交互感染，強化彼此受損的意識，進而採取共同行動，在中產階層人數越多的地方這種現象越明顯，而且抗爭的策略正逐漸出現轉變。馮仕政（2007）根據中國 2003 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指出，面對環境危害，只有 38.29% 的會進行抗爭，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選擇沈默，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環境利益流失。除了大多數人的沈默，國家政權有計畫的吸納、轉化、分化中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將社會力量為他所用（例如汶川地震的救災），另一方面是透過一次次事件把國家的權力扎根（grounded）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之中。例如，透過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完全將農村開發，當產權被改造，國家就更深入到社會之中。因此，國家權力與中產階級的社會空間類似零和的拉扯，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之下會延續下去（訪談紀錄 20110831）。

中產階層進行社會運動或者是沈默不語的情況在近幾年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即使中國抗爭事件還是一樣頻繁，但是過去由社會底階所發起的上訪，或者是民眾突發群體性抗爭模式，在都市的中產階層身上看到了另外一種社會抗爭面貌。中產階層因為知識水準與經濟基礎較高，他們對於制度所存在的漏洞，以及法律應該提供給人民的保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們懂得利用新技術（像是網際網路）傳遞信息，凝聚行動力（黃榮貴、桂勇，2009），也知道如何在法律的規範中維護己身的權益（沈原，2006b：1-25）。所以中產階層能夠更有系統、有計畫、有策略的採取「都市運動」，在制度的限制底下有效展現其行動力，影響國家在政策上的不公與壓迫（陳映芳，2006）。從施芸卿（2007）對於北京市居民拆遷的集體訴訟所做的研究讓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都市的中產階層抗爭的策略，是利用法律保障的範圍下創造出社會運動的機會空間。正因為生活在北京市的中產階層貼近權力，所以民眾擁有「權力經驗」與「權力概念」，加上北京市歷來是社會運動的核心所在，民眾很清楚在面對地方政府的壓制的情形下，要如何利用中央的力量與政策，尋找市民社會突破的缺口。

另一項引人注意的變化就是連過去比較少引人關注的城市選舉，也成為中產階層爭取自身權益/利的一種渠道。管兵（2010）對 B 市 19 個小區的研究就發現，中產階層已經超越過去那種依賴個別的領袖和代表，仰賴個人關係，採用集體行動開會或遊行示威的等「非制度化」的抗爭方式，而是把選舉作為一種維權的武器，藉由參與居委會的，由體制內爭取自己應該受到法律保障的權益。雖然這樣的維權運動依然有勝有敗，甚至基層政府會透過居委會打壓業主委員會參選，但中產階層的權利意識抬頭，已經讓他們的策略更加多元。

這股由城市中產階層所發動的抗爭策略，其擴散效應不僅僅是在中產階級本身，也會進一步改變工人與農民的抗爭策略。吳同與文軍（2010）對於上海工人的抗爭研究指出，當工人權益受損，工人會自我組織起來，並且使用遵守紀律且守法的策略對進行抗爭，讓國家與政府找不到壓制的理由與藉口。于建嶸觀察進幾年來的社會抗爭之後將這些爭取權利的事件歸為農民的以法抗爭、工人的以理抗爭、農民工的依法維權（于建嶸，2010：51-152）。

在嚴格意義上，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非常不成熟，不僅遭到嚴格管控與禁止，公民政治的基本權利也還夠不完整。例如，集會遊行就是一個會引起中央政權緊張而地方政權打壓的政治權利。中產階層的興起讓整個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更加緊張，雖然從過去的研究來看，中產階層是依附在國家政權之上突生出來的群體，但是隨著人民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與自主意識的提高，國家的權力正不斷弱化，從 90 年代開始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之後即是走向這股趨勢。國家面對中產階層的興起，所採取的是兩面手法，一方面盡可能在無關政權穩定的事務放手，賦予個人與組織的自主性，例如行業蓬勃發展的社會組織與行業協會（王信賢，2006；張沁潔、王建平；2010），另一方面則是透過管制的手讓國家深入基層社會，由政府引導人民的自治（桂勇，2007；王漢生、吳瑩，2011）。

在國家與中產階層互動的過程中，則是有另一個空間在虛擬世界崛起，那就是網路。網路因為傳遞快速、溝通即時、加上價格低廉，已經成為全世界快速崛起的新媒介，並且變成新社會運動一項最主要的武器，這種現象在中國也是如此。自從 1990 年代網際網路在中國

開始發展以來，就成為中產階層發聲最主要的管道之一，而國家也每隔一段時間管制網路的言論空間，並限制人民使用網路的習慣，例如早期推出的網路「實名制」，將上網者的身份和其真實姓名、身份證號等相對應聯繫及統一，就是網路網路管制的代表政策之一。過去在大陸上網還不是那麼方便的時候，只要到「網咖」（網吧）簡單登記就可以使用網路，現在進出網吧都必須先使用晶片身份證在櫃臺刷卡登記之後，才能獲得指定電腦的使用權，也就是說每一台電腦、哪一個時段誰使用過，都會被清清楚楚的紀錄下來，而沒有身份證的外國人不允許在網吧使用網路，類似的管制還有前幾年推出的綠壩軟體，以及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微博實名制。

國家對於網路的管制意味網路已經是國家最難以掌控的社會空間之一。例如，國家限制人民登入某些外國網站（臺灣的媒體、報紙），但是人民會自己想辦法規避國家的監控找到突破的方法。國家對於新聞媒體的限制讓訊息無法透明，人民會自己上網傳佈訊息。因此當輿論噤聲時，人民會自己公佈各類訊息形成輿論的壓力。以7月份發生的動車事件，當鐵路局試圖掩埋真相時，網民透過各種網路訊息，將所謂的真相公布在網路上，迅速串連出龐大的質疑聲浪，帶給執政者莫大的壓力重啟調查。中產階層與網路之間的互動，在於人民收入增長讓網路的取用像空氣一樣，鑲嵌成為個人與群體生活的一部份。網路帶來了一種過去所難以想像的動員方式，將各個階層做為抗爭行動的統一、有機的整體。網路跨越階層、情感、地域、傳統的機會結構與資源動員方式帶來新的抗爭模式。黃榮貴與桂勇（2007）對網路論壇的分析發現，業主在集體利益受到損害時，「能夠」利用網路網路做為動員手段發起集體抗爭行為。

在整體的制度環境與社會結構的限制下，中產階層只能透過手頭所掌握的合法武器進行社會運動/抗爭，例如法律、選舉。網路、沈默的散步。這些新興的策略背後是經過個人理性的計算，在風險最小的情況底下，爭取中產階層的整體利益，這正呼應了中產階層的保守性格。然而，中產階層並非完完全全的保守，在私下訪問的過程中，常常發現到中產階層常表示出生活上「過得去」，但是對於權利/力受到限制的權力結構不滿，不僅渴望「有效」監督政權，也拋出對「有效」參與政治的訴求，而這正是現代化理論預言的先聲。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預期保守與激進的力量在中產階層內部的衝突會更加嚴重。他們對於體制結構的挑戰不會消失，因為新興階級的崛起與體制嚴重不容，而他們也會成為挑戰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這我們在結論會進一步闡釋。





## 第五章 中產階層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

### 第一節 中產階層消費能力的發展與對經濟之影響

在現代經濟社會學的視野中，中產階層乃立足於勞動者與資本家兩者中產的群體，是生產形態演變後的結果，由於生產行為導致分工強化，整個生產過程中需要有人進行統籌與管理。中產階層作為整體經濟環境的重要構成，其表現與整體經濟產出息息相關，此外，中產階層由於擁有一定的經濟地位與知識水準，因而也對於社會發展、政治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近代民主政治的興起，就是由於中產階層形的快速發展，形成所謂的「中產階層效應」。

從外界的觀察，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成長主要是區分為兩個階段，不同所得層級的消費者將在特定時點出現崛起與衰退的波段：第一波為 2001 年 2010 年，主要的成長是發生在中產階層較低階的部份，其定義為年所得 5 千至 4 萬元人民幣的家庭；第二波段將是在 2010 年之後的 10 年，主要成長趨勢是發生在中產階層的高階部份，主要是指家計年所得為 4 萬至 10 萬元人民幣。到了 2011 年左右，中產階層的低階部份其人數大約可達 2 億 9 千萬人，成為中國都市地區最大的族群，占都市人口比例約 44%，此一族群的成長，將於 2015 年達到巔峰，總消費能力達 4.8 兆元人民幣。到了 2025 年，該族群人數將高達 5 億 2 千萬人，超過中國預估都市人口的一半，可支配所得合計達 13.3 兆元人民幣。

就一般的觀察而言，大陸中產階層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其實互為因果，如果經濟增長乏力，中產階層人數將不會增加，反之亦然。所以若從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過程反視中產階層的形成原因，那麼外貿部

門、製造部門、流通部門、市場銷售部門等等都是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來源，而這也就成為構築大陸中產階層的主要範疇。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迅速推進，中產階層已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並有極大影響的社會群體，若將分析觀點放在經濟層面，吾人可以看到大陸中產階層出現已經對當前整體中國的生產消費運作帶來影響，例如：許多公司已將其策略加以調整，把新興的中產階層納為核心客群。

中產階層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其所發揮的消費意識與力量已經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的影響，在此簡述大陸學界對於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行為之研究，包括消費結構、消費取向及消費邏輯等。消費結構是指消費品項目或領域的分配比重；消費取向是指中產階層在消費時較為注重消費品的哪些條件；消費邏輯是指中產與非中產階層、中產階層自身在消費觀念上的差異及比較。最後整理了中產階層在消費結構、取向和邏輯中綜合的消費態度轉變及消費特徵。

在討論關於中產階層的消費前，必須先消除對中產階層的刻板印象。在社會大眾的眼中，中產階層是奢侈且炫富的一群人，但那只是大眾媒體宣傳的一種假象（或許有部分真實）。中產階層雖然生活較為寬裕，但同樣受限於現實條件，因此他們會在能力範圍內運用理性，選擇其應消費的內容及消費方式（王建平，2006：141-142）。典型理論中關於中產階層的消費論述，與現階段中國中產階層呈現的消費方式有所出入，顯示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方式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而有所變化，但同時也保有「未發達」前的思想遺緒。

## 一、消費結構

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結構最明顯的變化是生活（生存）必需品的「非必需化」，尤其在比較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兩者的消費結構差異時，更能凸顯此現象。中產階層在飲食方面消費約占總消費的六成，非中產階層則為七成；服飾、文化娛樂、購車及購房等方面，中產階層的消費比重都比非中產階層高。教育消費方面，無論是中產或非中產階層，消費比重差距不大，顯示兩者同樣重視下一代的培養。雖然這些消費項目在中產及非中產階層的消費結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兩者對於項目的排列順序已經出現變化。若非中產階層的消費結構是屬於「溫飽型」，中產階層的消費結構則漸漸轉為享受型、發展型的多元消費結構（王建平，2007：121-124；周曉虹，2005：65-67）。

## 二、消費取向

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中產階層對消費品的要求也發生變化，因此出現消費取向的改變。產品品質仍是購買商品時的第一考量，但中產階層對商品價格的關注程度，已經不如非中產階層那般注重。中產階層對商品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消費品的便利性、售後服務、品牌及時尚等，同時也會在意消費時賣方的服務態度、消費環境是否良好。傳統追求耐用、實惠的消費觀念已經轉變為追求美觀及時尚（王建平，2007：124-128）。消費觀念的轉變使得消費品的「價值」有所調整，消費邏輯也因此產生變化。

### 三、消費邏輯

消費邏輯主要有兩個討論主題：超前消費與符號消費。中國傳統消費觀念主張先累積後消費，且除維持生活的消費外，必須存錢防老及傳承給下一代。然而中國中產階層已逐漸接受現代消費觀念，主張「超前消費」，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幸福、享受生活。貸款或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費方式，是以中產階層的經濟償還能力為基礎，在此限度內使提前享受成為可能。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品味區隔」論指出，消費是中產階層為了顯示品味而有別於其他階層的策略性遊戲（1984：1-3）。顯示品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符號消費」，中產階層有提升自我與其他群體區分的需求，而符號消費便提供了這個功能（王建平，2007：74-78）。除了區分的功能外，符號消費也是中產階層追求自我認同及定位的手段。中產階層休閒時間受到工作的時間及精力壓縮，工作的龐大壓力無處宣洩，「符號消費」就成為一個經濟能力可負擔的另類「休閒方式」。

綜上所述，可描繪出中國中產階層在消費方式上大致的輪廓：發展型消費結構、注意商品額外價值的消費取向，以及超前消費及符號消費的消費邏輯。此部分討論的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的消費方式有所差異，但兩者之間仍存有模糊空間，中產與非中產階層之間消費方式的差異並非如此絕對。中產階層在社會大眾腦中奢侈、炫耀的印象，可能只有部分符合真實。中產階層並非擁有揮霍不盡的金錢、時間及精力，相對地他們受限於工作，只能在自身能負擔的範圍內享受生活。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的階級或階層差距相對較小，如今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這些偏差行為被放大檢視，導致中產階層的污名化。真正的中產階層應不包含金字塔頂端的那群人（實際上奢侈、炫耀者），雖然他們確實是中產階層努力想追求的目標。

## 第二節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消費型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 一、供給面的角度

龐大的中產階層出現導致市場運行模式的改變，而這也讓大陸經濟環境中供給層面出現變化，中國大陸為了建構穩定的中產階層社會，就必須擴大中產階層的社會來源，讓更多的人流向中產階層，也就是讓整體國民所得持續提升，而這個部份則需要設法維持其城市製造業的成長（何雨、陳雯，2010）。產業的發展推動中產階層的茁壯，而中產階層的茁壯又回過頭來為產業提供更優質的生產能力，進而使得整體工業化的發展進入了良性的趨勢。中國中產階層的崛起與發展對於經濟層面最重要的影響大概可以區分為三：

- （一）優質勞動力的提供與生產成本之間的影響，由於中產階層的所得改善，因而使得其可以針對自身人力資源進行投資，而這也就直接強化的生產技術的掌握能力與生產知識的水平，特別是大專學生的數目快速增加，這使得技術性勞動的數目快速上升（許抄軍、許曉運、魏宇，2005）。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大學（普通高校）在不到 10 年的時間，成長了 3 倍。2003 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是 212 萬人，到了 2010 年為 631 萬人，這除了反映中國大陸高校的擴張之外，也顯示中產階層父母更有能力讓小孩接受高等教育。如此多的高素質勞動力，雖然有工資上漲的不利因素，但依舊讓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市場在國際市場上更有競爭力。

(二) 技術勞動對於工作條件與勞動環境在管理層面上的影響，由於中產階層發展導致技術勞動增加的結果，而技術勞動者對於工作條件的合理化與勞動環境的要求較高，這使得中國大陸生產環境快速變遷，過往所採用的軍事化管理方式往往會導致勞動者的反彈，而這樣的改變使得整個工廠或企業的管理思惟需要調整（楊文鐘，2004）。換句話說，過去中國大陸的生產是以車間為單位欠缺競爭，勞工在組織內部依靠的是個人與上級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個人所掌握的技術（Walder 1986；李路路，2000）。當單位逐漸解體，個人獲得資源的渠道增加，整個勞動力市場也更為開放，掌握技術的智力勞工比體力勞工還要寶貴，讓管理變得更加困難。

(三) 中國勞動生產與全球生產的關係。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其產能多數是以滿足國際訂單或全球供應鏈之需求為主，特別是過去低成本競爭策略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在中產階層興起之後，生產成本開始慢慢增加，這遂導致原先生產鏈出現外移的可能（曹海濤、葉日崧，2008），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大風吹，特別是2008年大陸實施「勞動合同法」之後，整體工資、勞動保障快速變化，讓企業承擔的勞動成本更高。

由於經濟發展使得可支配所得增加，中國勞動者的技術能力與人力資本快速上升，這也使得其產業類型出現分化，過去簡單的勞動生產或低階製造業開始有能力轉型，朝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發

展。這個轉變的過程使得其產品的品質也會逐漸變好，過去的生產者只要求「有」，現在則是要「好」。以汽車產業為例，過去的生產部門僅僅透過仿冒來生產簡單產品，如今中國汽車產業已有能力併購世界級車廠並進行生產，而這個變化顯示出其整體生產能力的進步，當中國產業的競爭能力由低階製造轉換成為中高階生產的相關產業，這對於原先全球產業均衡與經濟運作將會帶來更大的衝擊。

## 二、需求面的角度

過去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以外銷為導向，本國企業作為生產者以面向全球市場為策略，但在近年來，由於國際經濟衰退，境外市場需求快速下滑，如今中國改變其經濟發展策略，改以內需帶動成長為主，而這個全新的策略是否能夠有效，最主要的關鍵便在中產階層的消費潛力能否發揮。由於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意識較高，其所匯聚的影響將會左右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

學者指出，當前大陸中產階層的消費趨勢是「兩端特徵明顯、中間部份趨同的現象」，也就是說富有的消費人群、經濟貧困兩個群體的表現與其他人不同，而中產階層的消費特性越來越類似（李春玲，2011），當其之消費特性大致歸納為（田蕊、馮文華，2010）：（一）崇尚消費主義；（二）追求象徵性消費；（三）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是西方消費文化的追隨者，在此本文選擇以若干個案來簡單介紹中國大陸中產階層消費對於其產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 （一）汽車產業

鑑於美國汽車市場的快速衰退下，世界主要品牌紛紛在中國設廠製造，其主要的目標便是期待中國新興的消費族群，能夠撐起疲弱的汽車消費，例如 2010 年 6 月的中國經濟網<sup>19</sup>中指出，隨著中產階層的興起，對於汽車需求開始增加，許多汽車公司在中國的銷售戰略也開始轉變，目前全球各大車廠莫不瞄準以中產階層消費的主力--中低價位車，推出為中國市場量身打造的低價汽車。例如通用汽車，其在中國大陸便透過合資方式建造汽車工廠，生產寶駿轎車和其他車型，年產量超過 10 萬輛。另外，在廣西所設之新廠將在 2012 年底前開工，屆時汽車年產量將達到 40 萬輛。又如 2010 年別克旗下推出的幾款新車目標客群皆為中國的中產階層。許多汽車廠商在中國打出的廣告基本上都圍繞著「年輕人應該比老一輩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宣傳主旨，試圖說服更多年輕人加入購車大軍成為有車一族。

中國的汽車消費熱潮與上個世紀 50 年代的美國非常相似，這個現象的出現並不是偶然，因為中國目前已經具備汽車普及的物質基礎。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為中國帶來一大批中產階層，這些人不僅有能力而且希望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此外，大陸當局也希望通過刺激汽車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許多銷售商和分析師預測，在未來 20 年內中國汽車銷量每年都將實現兩位數增長。

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市場行銷部部長胡絲羽在 2010 年 12 月舉行的「2010 中國豪華車行銷管道創新戰略論壇」上指出，2010

---

<sup>19</sup> 2010，〈中國中產階層已成推動全球汽車消費的主力軍〉，中國經濟網：<http://big5.beinet.net.cn/topic/kdnx/gwmtbd/201006/t603694.htm>，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12 日。



年大陸國內進口車市場保持高速增長，全年的上牌量在 65 萬輛左右，同比增長 80%。市場的迅速擴張，各品牌的突出表現，歸因於穩定的行業政策、充分的產品供給以及良好的車市大環境。

車市場銷量的急劇增長還得益於中產家庭的數量不斷擴大。據中國汽車諮詢中心提供的資料，2011 年，年收入 15 萬元以上的（具備購買中高級車及以上級別能力）的大陸家庭將接近 1600 萬戶。大陸轎車消費的主力人群已從先前的高收入者逐漸轉移到以 30-40 歲的新興中產階層。這類人群更加年輕化、個性化，他們更注重個人空間的營造，也更多追求駕駛樂趣，消費群體的改變也在逐漸影響一些國際汽車廠商在中國大陸車市發展的市場策略。

## （二）服飾業

全球企業管理顧問機構波士頓顧問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15 日指出，在中產階層消費層擴大的帶動下，今後 10 年中國大陸的時裝市場發展將大幅成長為 3 倍規模，突破人民幣 1.3 兆元（約合 2,013 億美元）。波士頓諮詢在報告中指出，與成熟的歐美市場相比，中國人均消費支出仍較低，但這使得中國有潛力成為全球更為重要的市場，並在未來五年內佔據全球時裝市場增長的 30%。

其認為在未來十年中，中國服裝市場將呈現六大發展趨勢：年輕一代的時裝消費將增加，女性的時裝消費將佔較大比重，更多高消費群體將來自較小城市，休閒場合與活動增多，消費者對時裝的見解越來越多涉及情感層面，將出現新的分銷渠道和零售業態。波士頓諮詢建議企業應該關注這些變化趨勢，並給出了適當的建議。例如，在進軍小城市方面應該進行規劃，以及與情感需求相關的價值定位，獨特的、差異化的消費者體檢等。

波士頓顧問集團表示，目前大陸時裝市場由運動服品牌與本地休閒服品牌主導，去年度市場規模約達人民幣 4,000 億元。都市地區消費者每人每年平均花在時裝上的支出僅達人民幣 1,150 元，而歐美兩大運動用品廠商愛迪達（Adidas AG）、Nike Inc. 皆進入大陸多年，並積極廣布零售通路。BCG 估計，要想在 2020 年接觸到 80% 的大陸中產階層時裝市場，廠商就必須要在 568 個大陸城市佈下據點才行。

### （三）精品產業

中國大陸中高端消費人群增加，中國的精品消費動力持續上升。2015 年前中國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精品市場。數據顯示，2010 年，全球精品銷售基本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其中，中國人的貢獻相當大。貝恩諮詢公司估計，2010 年，美國、歐洲及亞太地區（不包括日本）的精品銷售升幅分別為 12%、6% 及 22%；其中，中國的精品銷售上升多達 30% 的增幅，升幅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毫無疑問，這跟中國人的收入提高、富裕人群不斷擴大密切相關。

《2010 年胡潤財富報告》稱，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全中國共有 87.5 萬名千萬元富豪和 5.5 萬名擁有超過 1 億元資產的富豪，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費者自由開銷如醫療、娛樂、教育和精品的消費等會逐漸增加，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等要求也隨之提高。

有調查顯示，購買精品的動機排名中，大部分都跟自身的選擇和感受有關，而非產品的功能。其中，「寵愛、善待自己」從 2008 年的 36% 上升到 2009 年的 44%。自我獎勵在 2008 年和 2009 年的調查中成為促使消費者購買精品最重要的因素，分別占 44% 和 54%。說明中國消費者越來越重視自身品位，尤其是女性。

此外，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注重「禮尚往來」。除自用外，送禮也為重要的精品消費用途。根據羅德公關及信天翁的報告，在大中華地區的精品用途中，為親朋好友購買的占 29%，送禮尤其是商務饋贈占 28%。其中，28%的一線城市受訪者表示購買精品用做商務饋贈，二線城市比例則達 36%。

隨著全球精品品牌都越來越重視中國市場，目前大部分世界知名的精品品牌已經相繼進入中國市場，而中國市場占許多品牌的總銷售比重亦不斷提升，例如中國已經代替美國成為萬寶龍最大的銷售市場。路易·威登和愛馬仕在 2010 年分別有 25%和 38%的銷售收入來自亞洲(除日本外)，其中來自中國市場的收入正不斷提升。

除了一線城市外，精品品牌近年積極向二三線城市擴張，如商務和休閒旅客經常到訪的陝西西安、山西太原、雲南昆明、內蒙古呼和浩特等。剛在 2010 年將 50 家特許經營店轉為直營的英國奢侈時尚品牌 Burberry 在 2011 年 1 月表示，希望 5 年內將現有在中國店鋪數目增加到 100 間，它在 2010 年已經進入太原和常德。路易·威登自 2007 年以來已經進入了太原、呼和浩特、烏魯木齊等二三線城市。

為迎合中國的消費者，一些品牌推出了專為中國消費者設計的產品係列。例如愛馬仕在中國以即將失傳的手工藝技法為基礎，創建了「可消費得起的中國精品牌-上下」。「上下」於 2010 年 9 月在上海淮海路開設首家零售店鋪，產品由中國設計師設計，由中國人製造，只在中國銷售。

龐大的中產階層所構築的消費能力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精品業眼中的一級戰區，而這些精品業者進駐中國生產與銷售的影響，便

是改變了大陸消費者的產品意識與品牌認知，也迫使其整體產業為了符合中產階層的消費習性而不得不強化產品品質與品牌發展，進而帶動了其產業的轉型。

#### （四）民生消費產業

中國中產階層人數劇增，掀起中國對於食物的需求量暴增，從以前的只求溫飽、到後來品質要好再到最後的健康為主，都顯示出中國現在可支配所得正在迅速上升，就會開始對於民生必需方面有如此劇烈的增加。

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中產階層的逐漸擴大，也為食品業帶來了龐大的消費人群，特別是中高端食品業方面。根據「2011 年城市藍皮書」顯示，2000 至 2009 年的 10 年間，中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年均增長 3.8%，到 2009 年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 2.3 億人，占城市人口的 37% 左右。除此之外，從 2010 至 2025 年，中國大陸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將以每年 2.3% 的速度擴大，在 2023 年前後可能要突破 50%。此情勢將會推動人們對食品的消費不斷升級，促進食品業進一步提升。

在整個消費品市場不斷增長的前提下，開始凸顯食品業的投資價值，尤其是在食品安全問題頻出的情況下(如：毒奶粉)，對安全、健康、綠色的食品需求日益高漲，這自然會對食品產業的整個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中產階層開始要求品質更高的產品，喜歡加工食品和包裝食品的方便性。10 年前，綠色食品在中國還幾乎是不存在的，如今卻需求旺盛。根據資料顯示，預計 2014 年前綠色包裝食品的銷售

額將從 2009 年的約人民幣 1.70 億元增至人民幣 5.43 億元（合 8,500 萬美元）。<sup>20</sup>

另一方面是食品進口市場，由於中產階層對進口食品的喜好，從基本的肉類，水果，蔬菜，海鮮到調味品和香料，茶與咖啡到霜淇淋，糖果到烘焙食品，以及包括對葡萄酒與烈酒的情有獨鍾。根據預測，中國在 10 至 15 年間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食品及飲料進口市場。

同樣也根據資料顯示，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大幅成長是衝擊食品供給和價格的主要原因，「未來 10 年，每年全球至少增加 7,000 萬名新的中產階層，到 2020 年中產階層新增人數就會達到 8 億人。<sup>21</sup>」而龐大中產階層的民生消費需求，正是帶動食品價格上揚的主因。

隨著中產階層的快速發展，除了改變大陸產業發展的策略與樣態外，對於其民生消費產業也造成了影響，例如當前在中國，許多新興的白領階級在城市消費，吃的多是西方食品，而隨之所引起的肥胖問題又帶來了新的飲食趨勢，例如因為有機健康飲食風潮的興起，2011 年間，中國所採購的黃豆占全球黃豆貿易的 60%，在 4 年之前還不到一半，可見成長幅度驚人。

此外，中產階層的增加帶動了肉類的消費，新興國家的肉類消費增加帶動作為飼料的全球玉米需求成長，而美國農業部（USDA）在

---

<sup>20</sup> 2011，〈外資 PE 大舉投資中國食品業 未來幾年步伐將加快〉，慧聰食品工業網：  
<http://info.food.hc360.com/2011/10/261035567115.shtml>，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10 月 25 日。

<sup>21</sup> 2011，〈新興國家中產階層『吃』出通脹〉，星島日報：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1-02-21/world1298284061d3018459.html>，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10 月 25 日。

2011年7月指出，美國對大陸銷售54萬噸玉米，此已超過原本USDA預計大陸一整年的進口量。現在USDA預計2011/12年度大陸將進口200萬噸玉米，許多交易商與經濟學家相信，大陸將在未來5-10內取代日本成為美國玉米的最大買家。

### (五)房地產業

中產階層由於持有對於未來的不安定感，因而非常重視房產消費，將之視為安身立命的指標，也因此在大陸，擁有一套房已經成為中產階層家庭的象徵與必備品。根據李春玲（2011a）年所提供的資料：「2007年中產家庭擁有自有住房的比例達97.3%，其中78.5%擁有1套住房，17.5%擁有2套住房，1.4%擁有3套及以上的住房。儘管中產階層家庭基本都有私有住房，但略超過五分之一（21.9%）的中產階層家庭還在償還購房貸款，其中17.6%的全年房貸還款數額低於1,000元，49%的全年房貸還款數額在1,000-10,000元之間，27.5%的全年房貸還款數額在10,001-49,999元之間，5.9%的全年房貸還款數額在50,000元及以上。」中產階層自有房的比例雖高，但大部分都是上一代的中產階層繼承社會主義時期的配房或是在房地產市場開展初期所購，新興或年輕一代中產階層購屋的慾望，持續推升房價。

然而，中產階層的收入漲幅遠遠跟不上房地產的漲幅。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但與此相比，同一時間漲幅超過50%。這種現象如果長期持續下去，一個年輕的中產階層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費能力，造成他們對其他物品的消費力轉弱。

中產階層對於房屋的需求遠高於他們所能承載的房價，這將使得中產階層不再有能力擔任房地產市場的購屋主力。政府面對此現象，只能推出更強的打房政策。打房成為近年來中國主要的宏觀調控對象，陸續出台的房產稅、抓緊房貸以及提高購屋自備款都被視為是打擊房市的利器。中國指數研究院 11 月 7 日發布「中國主要城市房地產每週交易數據情報」顯示，當期監測的 35 個城市，28 個城市樓市成交量同比下降，6 城市成交量降幅在 50% 以上。從這個簡單的數據來看，中國政府的打房的確讓市場降溫，但是交易的降溫不代表價格的下跌與鬆動。2011 年一項調查顯示「有 45% 的民眾認為地方政府執行調控政策非常不到位或比較不到位，只有 15% 的受訪者認為地方政府執行調控政策非常到位或比較到位。如果給地方政府執行調控力度打分的話，滿分為 100 分，東中西部的受訪者打出的平均分數均低於 60 分。其中東部一線城市得分最高，為 51.9 分；中西部三線城市得分最低為 41.3 分。」由此可見，打房並沒有降低人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民眾的購屋痛苦指數。另一方面，打房也造成社會階級的分化與衝突的激化，有些居民抗議房地產商降價求售損害有房者的利益，不應為了「少數人買不起房」，而打擊大多數已經有房者的財產。

### 第三節 中產階層的興起與經濟過熱

總的來說，若從中產階層興起對於整體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則其之出現對於總體經濟的佈局與發展亦有深遠的影響。從生產力的角度來看，一般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工業化的階段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工業化初期、中期、晚期。而人均 GDP 在 10,000 美元之後，一個國家就進入了工業化後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之中，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會有下列的趨勢（鄔曉霞、祝爾娟，2011）：

- 一、產業結構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
- 二、結構升級以科技引領為主導
- 三、產業布局呈現新型產業分工格局
- 四、城市空間結構從單中心轉移到多中心
- 五、社會民生注重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和福利水準
- 六、生態環境建設崇尚人與自然和諧
- 七、中產階層空洞化現象明顯

上述的產業發展轉折，直接與中產階層出現對於總體經濟的影響相一致，所以，當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後期的階段時，這將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許多新的趨力，例如現代化製造業、現代服務業、金融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醫療產業等等，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契機都是源自於大陸中產階層出現對於整體產業經濟發展的新趨力。

本章主要針對中國大陸中產階層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而從中產階層對於整體經濟供給面、需求面的影響分別來看，鑑於中產階層興起對於產業管理能力、經濟分工條件的提升，這將直接有助於中國製造、銷售能力的提升。其次，若就需求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數目將有 2 億 5 千萬多人，而這個規模相當於日本加上美國的市場需求足以支撐全球經濟的市場需求。而若從家庭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家用電器擁有狀況、消費行為模式、住房及汽車消費等方面的階級特徵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的中產階層消費能力與文化正在快速成形（李春玲，2011）。也因此全球廠商莫不針對中國中產階層的需求性而制定相適應的策略。換言之，中國的中產階層興起其除了優化中國供給面的製造能力之外，其更使得中國消費市場將有能力成為影響全球的主要角色，而由中國中產階層醞釀的市場能力將足以左由



全球經濟的遊戲規則，並帶動中國對於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層面。

然而另外一個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則是，中產階層的消費起飛影響到中國經濟是否有可能陷入發展過熱的問題，這將使得整體經濟出現泡沫化的疑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每年幾乎都以兩位數的成長率發展，人均國民所得也跟著水漲船高（見下表 5-1）。

表 5-1 中國大陸歷年 GDP 指標

年份	GDP 總量（百萬元）			人均 GDP（元）		
	人民幣	折合美元	增幅（%）	人民幣	折合美元	增幅（%）
2010	39,798,315	5,879,063	10.3	29,748	4,394	(N)
2009	34,090,281	4,990,526	9.2	25,605	3,748	8.6
2008	31,404,543	4,521,827	9.6	23,708	3,414	9.1
2007	26,581,031	3,495,664	14.2	20,169	2,652	13.6
2006	21,631,443	2,713,495	12.7	16,500	2,070	12.0
2005	18,493,737	2,257,619	11.3	14,185	1,732	10.7
2004	15,987,834	1,931,644	10.1	12,336	1,490	9.4
2003	13,582,276	1,640,966	10.0	10,542	1,274	9.3
2002	12,033,269	1,453,820	9.1	9,398	1,135	8.4
2001	10,965,517	1,324,818	8.3	8,622	1,042	7.5
2000	9,921,455	1,198,475	8.4	7,858	949	7.6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 2011》，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連結：2012/6/22。

從這兩個數據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時期更顯得亮眼，2010 年中國 GDP 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總量增加了 10.3%，但是這樣的數據在黃亞生的眼中卻是極為脆弱，黃在 2009 年就已經表示：「如果中國還是像過去那樣子，只增加供給，而不去實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調整以促進消費內需，轉變成消費型的經濟，以後不可避免會產生生產過剩、泡沫破滅。任何政府都不能強迫老百姓消費。所以我對中國以後一年、兩年的經濟走勢非常擔憂。」老百姓

姓不願意消費來自於高通貨膨脹對於未來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感，即使中產階層的消費被視為是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但其儲蓄率表現出來的卻是中產階層對於消費的疑慮。

2009 年中國私人消費只佔 GDP 35.1%，政府消費則佔 12.9%。由此可知，中國的總和儲蓄率佔了 GDP 的 52%（雷鼎鳴，2011）。中國這麼高的儲蓄率來自於人民對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過去靠社會主義，凡事都由政府包辦，現在則是自己照顧自己，儲蓄自然是自我保障的重要途徑，因此人民寧可存款放在銀行坐視通膨吃掉利息，也不願將錢放入投資報酬率還不錯的資本市場（Wen, 2011）。

高經濟增長、高通膨、高儲蓄加上低消費意願，這似乎是經濟發展過熱的重要指標現象。近幾年來中國不斷推出各式各樣的宏觀調控政策，正是為了防止經濟發展過熱而來。然而，中產階層的消費取之於個人對金錢的態度與自由的意願，這兩樣都不容易透過政府的政策強制而來。對照前一節中產階層的消費提升，相較於整個中產階層人數的增長，這些提升顯得微不足道。但是，在媒體的推波助瀾與商業公司的行銷策略下，卻很容易在消費者心中造成市場供不應求的假象，而這也是中國大陸最近幾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快速飆高的主要原因，而其結果便是導致如：2011 年 6 月中國大陸的 CPI 創下三年來的新高，顯示中國大陸的宏觀調控政策並無法抑制節節高漲的物價。

最後，我們擬對於中產階層在當前中國社會下的困境提出進一步的說明。在本文第四章曾經指出，大陸目前從消費的支出上面，中產階層的家庭年支出是農民階層的 3.4 倍，是產業工人和商業服務業工

人的 1.9 倍和 2.3 倍；家庭人均支出是農民階層的 4.5 倍，是產業供人和服務業工人的 2.3 倍和 2.5 倍。家庭日常支出是農民階層的 5.6 倍，是商業服務業工人的 2.6 倍和 2.4 倍。雖然中產階層家庭的消費支出看似比較高，但是中產家庭只把 60% 的收入用於消費，另外的 40% 成為家庭的經濟結餘，這顯示出中產階層有巨大的消費潛力，未來是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第五章中本文說明，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發展：第一波為 2001 年 2010 年，主要的成長是發生在中產階層較低階的部份，其定義為年所得 5 千至 4 萬元人民幣的家庭；第二段是在 2010 年之後的 10 年，主要成長趨勢是發生在中產階層的高階部份，主要是指家計年所得為 4 萬至 10 萬元人民幣。到了 2011 年左右，中產階層的低階部份其人數大約可達 2 億 9 千萬人，成為中國都市地區最大的族群，占都市人口比例約 44%，此一族群的成長，將於 2015 年達到巔峰，總消費能力達 4.8 兆元人民幣。到了 2025 年，該族群人數將高達 5 億 2 千萬人，超過中國預估都市人口的一半，可支配所得合計達 13.3 兆元人民幣。

同樣是第五章，吾人已知 2000 至 2009 年的 10 年間，中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年均增長 3.8%，到 2009 年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 2.3 億人，占城市人口的 37% 左右。除此之外，從 2010 至 2025 年，中國大陸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將以每年 2.3% 的速度擴大，在 2023 年前後可能要突破 50%。

重述上面的數據是在說明，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規模與所得是持續增加，但由於中產階層為了維持生活形式的穩定，故仍以穩健收支

的方法來管理家庭帳目，僅有 60%之所得用於消費，之所以如此，主要在於中產階層十分顧慮全球總體經濟環境惡化、社會福利制度發展遲緩與消費需求獲得跨期滿足等等因素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而導致其節省開支並強化儲蓄，這是其平均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

換言之，中產階層的成长並不是大陸物價快速上揚的主要推手，目前大陸物價上升的壓力主要來自於中盤商的屯貨投機，以及進口原物料上升因素所導致，是一種屬於供給層面因素所拉動的物價上揚模式。

其次，由於中國大陸所得轉移機制與公平稅賦制度尚未發展成熟，使得中產階層同樣也面對了社會分配的不正義，不過貧富差距或所得差異惡化的因素對於中產階層的衝擊並不會太大，因為其總收入仍有穩定的成長，只是仍比不上資產階層的成长速度。但中產階層基於穩定生活的價值形態，故對於社會福利制度的需要甚高，一般中產層級多為工薪階級，工作為其收入的主要來源，故社會福利制度的好壞將會直接影響其未來生活的品質，故當大陸社會福利制度進程緩慢時，其便會以強化儲蓄的方式來自力救濟，以免晚年失依。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中產階層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中的角色

#### 一、中產階層崛起與黨國體制的潛在衝突性

從理論的邏輯來看，中國已成為階層化和市場化的社會，而這和一黨專政的體制在運作上很難並存。中國政府未來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全能政府」或「極權政府」要如面對利益關係的市場化？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利益分配完全依靠政治邏輯，處於黨國體制高位的行動者，可享有資源分配的優勢。市場化改革的初期，雖然引入市場的分配機制，權力運作的邏輯依舊，官僚能夠利用掌握的政治資本，延續其在計畫時期優勢，市場只是彌補再分配所帶來的不平等。市場化改革後期，中國制度的規範逐漸從權力（power）走向權利（right），表面上人民在法律與制度上平等，但是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權力往往干預行動者權利的運用（訪談紀錄 20110901）。

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已有 30 年，但市場基本上還是個權力結構，因此市場上權錢交換尋租層出不窮，貪污變成一種制度化，因此弱勢只會不斷被壓迫。在這種情況底下，市場原該發揮的平等優點並不為國家所接受。因為平等就必須保障任何人，避免有一方獨大，國家的不僅做不到這一點，反而透過體制將此規則化。由於單一政黨（一黨獨大）的體制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它與市場化、階級化的社會完全不相容。現在看來，有一個新富階級與黨國逐漸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利益集團，並且形成一股穩定社會的力量，這與共產國家過去所發展的新階級（New Class）類似。然而，這樣的新階級會不會是

人數逐漸成長的中產階層呢？根據前面的分析，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內生的中產階層因為掌握了權力，所獲得的利益來自於黨的庇蔭，因此希望維持一黨專政的體制，持續享有資源分配與市場競爭上的優勢。但是，大部分的中產階層的形成外源於市場機制，他們的學歷、技術、以及勇於冒險的投資精神，讓他們在市場改革的過程中達成經濟地位的提升，所處了社會分層地位也會慢慢提升。當經濟高速運轉的時候，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可以讓內生與外源的中產階層和平共處，因為黨國的普照之光讓所有人都受益，改革因而成為一場經濟學家劉遵義所說的「沒有輸家的改革」（reform without loser）。

但是從學理上來看，黨國與市場結合藏有很深的矛盾。因為新富階級與黨國體制的結合將帶來一個「無效率的社會」，而無效的社會不可能永遠運轉下去，所以現在用來穩定社會的利益集團關係肯定無法持久。在經濟成長趨緩時候，也就是經改的果實變小時，原本和平共處的兩種中產階層會為了搶奪有限的資源將產生衝突，此時兩種中產階層迥異的立場就會更加突出。內源的中產階層希望維持黨國體制的優勢，因此在政治上相對保守，強化自己與權力菁英的結合，希望持續藉著權力掌握自己的市場位階。外生的中產階層原本就不是依靠黨的再分配機制取得收入，因渴望市場平等的優點能夠完全發揮，希望降低權力對市場分配的干涉，降低政治資本的回報。在這兩股力量拉扯的過程中，有些中產階層可能會從原本的位置往下滑，而有些會往上升。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當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兩極社會，中產階層也會往兩端來移動，上升的人少而下滑的人多，使得中國斷裂社會的特徵更為明顯。

## 二、中產階層的政治保守性格將坐實黨國體制的社會管理創新

中國的中產階層並不支持非制度化的政治行動，也還未準備成為政治改革的代理人（Tang, 2011: 373）。但是從大陸學者對中產階層所做的調查都發現，中產階層對政府政策與社會公平問題較關注，也擁有較強的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但這種意識在短期是否有可能轉民主發展的良性動力與公民社會的先聲則有待觀察。

近年來，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歷經幾個重要階段：（一）公民四權：2007年於「十七大」政府報告中，首次出現「表達權」，後與「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合稱公民四權。（二）公民社會元年：2008年奧運和汶川震災中，均曾動員大量的民間組織、民眾積極投入義工行列或救災行動，展現公民社會的能量。而後又有劉曉波等人倡議「零八憲章」，故全國政協委員徐永光稱2008年為「大陸公民社會的元年」。（三）首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於2009年發布的藍皮書，指稱大陸已邁入公民社會，大陸民間組織正在形成之中。（四）納入「十二五規劃」：2010年「人大」與「政協」第十一屆第四次會議所提出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談到「廣泛動員和組織群眾依法有序參與社會管理，培養公民意識，履行公民義務，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深圳市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更率先寫入公民社會建設。

然而，黨國對此的態度相當保守，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於今年（2011年）5月的《求是》雜誌發表文章，稱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切實解決社會管理中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防止誤信、誤傳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

此文一出，於中國大陸學界與 NGO 領域引發極大的震撼。此文強調：

(一) 中國與西方國家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的國情、根本不同的發展階段；(二)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是過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給社會去辦，而是要確保黨委和政府的社會管與公共服務到位；不是過多強調按照人口比例發展社會組織，而是要加快群眾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改革，完善職能；不是過多強調社會組織的「第三部門」屬性，而是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規範、引導，將其納入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體系，確保其健康有序發展，真正成為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重要補充。

(三) 當前一些人對國外社會管理的認識有兩個誤區：一是「小政府、大社會」；二是社會組織屬於「第三部門」，似乎獨立於政府的社會管理體系之外。指出「培育、發展社會組織，一定要制定好行為規範，事先設好『安全閥』，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社會組織繁殖起來。」針對此文，我們觀察如下：

1. 此是否僅代表「政法系統」的觀點，但此系統的權力頗為龐大，使得目前民政部所要推動的「雙重管理體制」鬆綁一事，可能有所耽擱。就此而言，關於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各部門可能出現不一致的觀點。
2. 今年（2011 年）年初，中宣部通知，要求大陸媒體禁止在報導中提及公民社會（特別是南方報系的《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和《21 世紀經濟報導》）。之後多數媒體多以「公共社會」取代「公民社會」。
3. 整體而言，此種發展代表兩層意義：（1）此為 2009 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管理明顯「左轉」的延續；（2）此代表中共對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後的「再管制」。



4. 此文發表時的題目為「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但後來各媒體轉載時改成：「走中國特色社會管理創新之路」，改而以黨中央所定的調子為基礎。

從國家與社會角力的過程來看，中國政府對於強出頭的社會運動者與社會組織往往以殺雞儆猴的方式，防止公民社會的發展失控，而中產階層的保守性格則坐實了國家對於社會的「管理」與「監控」。因此，管理不論如何「創新」，都是以統治者的思維，進行由上而下所發動的控制行為，這與由下往上觸發的政治革新有很大的差別。在中產階層相對保守的政治態度下，很難有足夠的壓力，強迫黨國有主動變革的決心，因此短期來看國家所實施的相關管理政策，是以管理作為防堵社會發展的武器，管理作為限制人民行動的口號，以管理壓抑社會力量成長，以管理防止社會組織的串連，這些都是消極性的管理，而非如孫立平所說的積極式主動變革的管理（孫立平，2011）。

### 三、中產階層、社會力量與網路行動

隨著網際網路興起，新興公共領域於焉產生，網路成為輿論反映的重要平台。前面的分析中我們提到，中產階層在政治上保守，但是也同時關心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議題。在正式的渠道上不敢表達的意見與監督，可以透過非正式的方式與制度達到問責的效果。蔡曉莉證明存於中國農村的連帶團體（solidary groups）（村廟、村教堂、血緣團體）能夠代替民主制度下的選票機制，發揮監督地方官員的功能，獎懲地方官員在地方公共物品供應（public goods provision）的表現，在沒有民主機制的情況下對官員進行「問責」（Tsai, 2002, 2007；蔡曉莉，2006）。這種非正式制度的監督力量，在城市中產階層身上是透過另外一種方式呈現。

過去幾年中國憑著網路所帶來的新經濟在全球嶄露頭角。全世界最大的網路交易平台「淘寶」，以及最大的微網誌平台「新浪微博」，都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然而，網民劇增和微網誌（微博）興起，促使網民透過網路表達對社會時政的針砭意見，改變過往公民意見的表達方式。除了網路議論的輿論空間，網民亦具體身體力行實際行動。對此，官方採取軟硬兼施手段，一方面正視網路輿論影響，促使各級政府官員，建立網站與民溝通，形成「網路問政」。而在 7 月 23 日「溫州動車事件」以及 9 月 27 日上海地鐵十號線撞車事件，都可看到網路傳播的力量。胡錦濤更曾在 2011 年 2 月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上，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準，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

此外，官方仍不遺餘力於管制、監控網路資訊。鑒於目前中國大陸擁有 4.5 億網民，其中行動上網者增加快速，而網路通訊又是此次北非、中東國家的主要動員與傳播工具。故大陸政府正對網路、手機進行監控，在手機方面，如「北京市市民出行動態資訊平臺」；而在網路方面，以「茉莉花」為例，增強「防火長城」，利用技術過濾危險關鍵字，抑或透過網路警察、五毛黨、斷網等手段。據聞，許多地方政府曾建議中央取締、關閉「微博」，但為黨中央反對，一方面，中共目前也無法逆此一潮流，另一方面，在「微博」上開一口子讓民眾宣洩也有助於減輕民怨，且網民亦可成為中央獲知地方「民情」的重要管道。因此，政府改走微博實名制，在開放與關閉之間走一條「創新管理」之路，這樣的管理之路引起社會的強烈反彈，未來會如何則必須持續關注。

#### 四、中產階層的消費意願是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的動力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促使中產階層崛起，而中產階層在供給面與消費面的作用，是支撐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認為即使中產階層的消費力逐漸提升，但在對未來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情況下，大部分的人選擇將所得存到銀行而不是投入消費市場。中產階層的經濟行為讓中國變成高經濟增長、高通膨、高儲蓄加上低消費意願，這是經濟發展過熱的重要指標之一。為了防止經濟的崩盤，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中，特別將擴大內需做為主要目標之一。

大陸「十二五」規劃主要政策方向便在於擴大內需消費和產業結構調整，它將帶來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的轉型。不過，在規劃執行的過程仍將面臨諸多的制約因素。以擴大內需消費為例，根據大陸方面的資料顯示，2000-2008年，中國大陸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1.4個百分點。中國大陸居民消費不足，儲蓄率高，基本上有其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因素，但主要原因還在於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偏低、收入分配不合理、產業結構層次低、城市化質量不高、政府公共服務不足、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低等因素（魏艾，2011）。從這些問題來看，當提升中產階層的消費意願成為執政的首要目標時，如何降低他們對環境的不確定性就變得很重要。

#### 五、中產階層興起的經濟效應

就大陸中產階層形成因素差異的角度來觀察其對經濟方面之影響，主要可以從經濟成長的策略、經濟分配的態度、經濟成長目標的

偏好等三個角度加以敘述。基於市場經濟利益而成的中產階級，其階級屬性使其重視個人所得的增加、生活環境的改善與社會資源分配的正義。而受益於黨國關連所建構初來的中產階級，由於其承繼黨國庇蔭，因此在階級屬性上較重視個人社會地位的維持、既得利益的確保與權力關係網絡的發展。換言之，不同的階級屬性，其所發展出來的思考模式自然也就會有所差異。

然而相異之外，亦有相同之處。由於中產階級基本上受限於經濟能力，對於本身利益與權益的關注會高於對社會整體福祉的思考，其重視穩定與持續發展，如此才能有效並妥善的規劃人生以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在這個部份中，無論是市場利基或黨國背景所形成的中產階層都會表現出趨同的政策。

例如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中產階級的反應多期待政府能夠採取積極的介入作為，以財政政策的力量來持續推動本國經濟成長，以避免風險擴大導致自身所得受損，這個立場無論是市場利基或黨國背景，多數的中產階層大致都能同意。

然而，面對政治改革的議題上，市場利基所成就的中產階層主張在黨國體制之外進行制度改革，然而黨國背景為重的中產階層則採取保守的立場，認為仍宜以共黨領導為主軸。如最近大陸政治學者俞可平所言之「人民民主」此一觀點，便是如此。

俞可平認為，目前大陸若欲推動民主則宜走「增量民主」的模式，什麼是增量民主？這主要來自於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增量改革」概念，也就是說不去處理過去經濟分配的模式，而是走把餅作大、增加福利的路線。那麼「增量民主」的概念也就指涉著，不正面處理共

黨統治下的國家社會關係，而是透過在新興領域、公共部門的政治空間中進行民主處理程序的引入。例如，俞教授認為的重點包括：程序民主決定實質民主、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社會、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依法治黨帶動依法治國、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及動態穩定取代靜態穩定等等。<sup>22</sup>而更重要的是，俞可平指出：「中國的民主政治不僅不能離開中國共產黨，且很大程度取決於黨自身的民主化」，而這也無疑點出了其最重要的觀點，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將會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俞可平的觀點其實是反射出中國中產階層中，那群由黨國關係所建構的群體，其心中的主要想法。

然而，如劉曉波等人所期待的中國民主，則便未必如此，例如在大陸零八憲章中，這群民主人士所主張的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強調分權制衡，要求立法民主、司法獨立等等的主張，其之跟本則是立足於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民主價值之中，而這種觀念則受到市場利基所建構之中產階層的高度歡迎。

綜觀所言，不同建構中產階層的原因將會導致其在重大問題上的不同態度，而這也將會是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最明顯且最常見之社會衝突形式。

## 六、大陸當局對於新興中產階層的態度

大陸當局目前對於新興中產階層的態度主要有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

<sup>22</sup>俞可平，「人民民主為最終目標」，中國時報，20120614，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4/112012061400110.html>。

新興中產階層所建構的消費市場潛力。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之影響，大陸消費市場已經成為拯救全球廠商的最重要的一個戰場，故國際知名品牌莫不加大步伐、擴大程度地來強化在中國市場中的作為與影響，以期能搶占新興中產階級的荷包。然而，這個市場對於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重要性也很高，故大陸官方開始對於其市場採取保護作為，例如透過商品進入障礙的設置或各種消費者保護權益措施的設立等等，以此來避免自身經濟利益為外商所獨有。

避免中產階層出現精神文明污染的問題。近年來大陸對於娛樂媒體、流行文化的主導力量逐漸增加，此一唐突的作為背後所凸顯之因素在於避免中產階層因為受到過多境外反中思想或不利共黨統治觀點的污染，故採取了管制作為。這種在思想層次上的政府作為是否有效？在茉莉花革命的過程中大致可以獲得部份結論，由於中國對於網路控制與媒體掌握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故運用網路社群或新聞媒體所建構的反對意見很容易被國家力量所阻擋或隔離，進而導致其無法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產生對民眾的影響，而此舉將延緩大陸思想解放的時間表。

強化社會福利作為以收攏中產階層。目前大陸當局對中產階層正積極採取收攏或懷柔的政策作為，以此軟化中產階級對於統治當局的不滿，並藉助福利作為來降低國家與社會間矛盾的激化，此種福利國家的發展趨勢是否能達成穩定政局的目標？對此值得進一步的觀察。

## 第二節 中產階層興起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臺灣要如何應對中國社會中產階層崛起的現象？順著前面的理論與現實的分析，我們首先瞭解到中國有一群人數眾多的中產階層，

而且人數在近期之內將持續成長，依照開發中國家的經驗，中產階層的人數會介於國家總人口的 25-75%之間。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群中產階層將對中國內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產生全面的影響，而這不可能不牽動台海兩岸的關係。中產階級接受過教育，享有中高收入而且具有自主意識，他們在中國享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富裕，但是卻也是最早體認到自身在政治權利上所受到的限制。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現代化理論的預示，隨著人民經濟收入的提高，民眾對於政治自由的需求將推動國家的政治改革，台灣、韓國以及更近的新加坡（進行中）都經歷過這樣的歷史軌跡。因此，從兩岸互動的角度來看，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壯大，加上台灣實施大陸人民到台灣自由行的政策，大陸的中產階層將是最有機會瞭解台灣實際情況與真實民意的一群大陸人。

當大量有消費能力以及有知識的人進到台灣，將有可能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產生以下的衝擊。首先，台灣的內需市場將因為大陸人士的觀光與自由行擴大。2010 年陸客已經是台灣旅遊最大的客源國，而根據商業週刊最新的估計，隨著陸客自由行開放，可為台灣帶來超過一千億的新消費商機（實際的數字則有待檢驗），從飯店、飲食、景點門票、紀念品、伴手禮到各式各樣的消費，都有可能改變台灣目前的產業型態與薪資結構。其次，大量陸客來台將改變大陸人對臺灣的觀感與印象，不再只能透過中國官方媒體來認識台灣。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新聞與網路的管制，大陸人民所能接觸到的訊息都是被篩選過的新聞，不僅台灣的電子媒體看不見，連平面媒體、網站在大陸內地都遭告封鎖。台灣有大量的記者駐地採訪大陸新聞增加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識，但卻僅有少數幾位大陸駐台記者，如此資訊不對等現

象，將造成大陸民眾對台灣的片面理解。隨著來台人數的增加，甚至是不再透過套裝的行程遊覽台灣，大陸民眾有機會更深刻理解台灣的各方面。

面對如此龐大的來台人數，在兩岸關係發展上，台灣應凸顯中產階層社會所具有的公民文化（civil culture），而非民主優越感，作為與大陸民眾對話的基礎。任何制度的都有其優與劣的一面，民主雖然是可追求的價值，但不見得是普世價值，然而威權或極權在殘害人權的歷史卻已經證明被人民所唾棄。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兩邊的交往不再是軍事時代大必然勝過小的絕對局面。硬實力比較小的一方，可以透過各式這樣的軟實力，展現其社會的可貴之處，改變大的一方。中產階層具有獨立判斷與思考的能力，他們將臺灣的公民文化昇華為一面檢視自身社會的鏡子。臺灣的集會遊行，政黨競爭，自由選舉、眾聲喧嘩，多元媒體存在與報導，都能夠引起中國中產階層對本身處境的反思。

因此，面對中國中產階層的崛起，臺灣除了維持政治上自主的聲音，也應該更廣泛的開展民間社會的交往。如此一來，台灣社會的公民文化才能透過媒體進一步傳達給來到台灣的大陸中產階層，藉由這群人之口將台灣的民意轉達到更多無法接近實際情況的大陸人民。兩岸當前的競爭並非一種武力或經濟實力的競爭，而是總體制度的競賽，在兩岸互動的過程中，中產階層是對兩岸制度差異感受最深的人，他們並非由資本家之眼看待兩岸的政經互動，而是用身體實際感受到兩岸文化、政治與制度的差異。這樣的差異點會在中產階層內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中產階層在兩岸關係的態度上有更為客觀與持平的想法，在研究團隊訪談以及意見交流的過程中，常常會聽到



大陸知識份子對自身處境的揶揄。「再怎麼樣，有選擇總比沒得選好？」、「那都是黨的宣傳」、「臺灣民主才是真民主」等等充滿無奈的話語，在這樣的制度環境底下，如何讓中產階層看到另一種出路和可能性，是臺灣能提供給中國中產階層思想的養分。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不僅要客觀看待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也應該期待其不斷地壯大，因為這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會有正面的助益。而台灣方面則必須在經濟交往增加的同時，掌握住台灣開放社會所具備的優勢，透過大陸民眾去改變中國政府目前相對保守的心態，如此才能建立兩岸長久的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兩岸的交往帶進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力，這有可能在兩岸經貿的互動上使得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更大，而且產業從外銷的製造業，開始滲透到內需的服務業。台灣 14% 的 GDP 來自對岸的中國大陸居世界首位，比位於第二位的南韓高出 3.9%。台灣大約 44% 的出口運往中國大陸。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目前也佔對外投資總額的 40% 左右。如此強的經濟依賴關係，將使得台灣的整體經濟情況更容易受到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消費的影響。除此之外，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也提醒我們在政治與經濟互動的過程中，經濟往往扮演著催化政治交往的角色，兩岸互動的微妙，在經濟依賴的加深下，台灣有可能因為中國大陸中產階層消費力量的增加，而喪失其經濟自主性，進而影響其政治意志。當然，事情的發展往往不會如理論所預設，正因為理論的提醒，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的觀察理論與實際上的落差，台灣近幾年在經濟互動增加的情況之下，仍持續政治自主的立場是一條必然堅持的道路，而高層政治的互動是否會受到經濟互賴的影響必須持續的觀察。

### 第三節 政策建議

兩岸的互動與發展，可以從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所提出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概念，層次二(level II)包含了官僚體系、國會、選民、輿論等。兩岸關係的相關協議，最終能否得到決策層內部核准權成員的多數支持，即兩方「共識圈」(win-set)重疊，才是理論的關鍵。

相較於台灣，雖然大陸在政治局下由總書記直接領導的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在對台政策的運作上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權。但隨著改革開放帶動中共政權體質的轉變，藉著維繫「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和諧關係，並倡導愛國主義情緒，成為政權穩定的基礎，而北京的對台政策也在此基礎上擺盪。

不過，觀察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發展，該階層的擴大有利於緩和社會上層與下層的矛盾，成為社會穩定的因子。加上中產階層影響政治的獨特方式，有三個方面值得重點關注。包括網路政治參與、社區參與及社區組織參與。這三種參與除了在制度範圍內，為政府所容許，同時也具有公共議題的串連效果，得以獲得社會的共鳴。因此，台灣應凸顯中產階層社會所具有的公民文化，而非民主優越感，作為吸引大陸民眾認同的基礎。另一方面，中產階層在社會上代表溫和、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佔據主導地位時，極端의思想和衝突觀念就很難有市場。因此，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和平訴求，在中產階層當中較具說服力。加上經濟利益是中產階層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這也讓兩岸經貿發展議題，較統獨議題更具吸引力。

今年（2011 年）以來，中共高層不斷強調「社會管理創新」，從 2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央黨校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人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輿論控制。接著，2 月 20 日，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強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努力使社會衝突與糾紛消失在萌芽狀態」。「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七一講話」則提及「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但仍「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就此看來，「社會管理創新」勢將成為「十八大」政治報告的重要組成。

根據中產階層在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社會與經濟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政府政策所提的建議如下：

### 一、政治政策的建議

- （一）政府應該避免把陸客自由行的效益，僅限於經濟層面之宣傳。在政治領域，自由行是陸客體驗台灣公民文化與民主價值的重要管道。
- （二）政府應該提供陸生與自由行陸客參國內各種民主活動，包括如青年領袖、審議民主、立法研習、選舉觀摩等研習營，實際體驗民主生活與規範。
- （三）針對在台陸生與自由行陸客進行社會調查，藉以比較兩岸中產階級的政治與社會意識。

## 二、社會政策的建議

- (一) 持續擴大兩岸民間的交流，特別是以公民文化為特色的參訪及交流行程，例如臺灣的社區營造、臺灣的環保經驗等。
- (二) 協助臺灣非政府組織與大陸同類型草根 NGO 的互動及交往，有助於瞭解 NGO 在中國發展的實際困境，並由臺灣經驗提供大陸類似團體發展所需的養分。
- (三) 在微博上建立分享臺灣資訊的平台。微博是大陸目前最自由、最開放、訊息流動最快的平台，有些訊息雖然在發出之後會遭到過濾，但是在網民快速的傳播之下，幾乎可以完全無礙的傳出，這有助於大陸中產階層或知識階層第一時間掌握臺灣的變化，並瞭解臺灣的聲音與意見。
- (四) 建立研究團隊持續掌握中國中產階層抗爭策略的轉化，持續追蹤中產階層崛起與社會運動的聯動關係，特別是環境保護運動。因為環保是近幾年來中國政府極為重要的政策，環境保護運動在大陸發展的空間相對較大。

## 三、經濟政策的建議

- (一) 建立大陸中產階層消費趨勢的定期分析報告，引導台灣廠商了解相關情況，掌握市場先機。
- (二) 建議政府在下一階段兩岸 ECFA 商品的討論中，從現有的清單以影響較低、對臺灣生產衝擊較小的產業，轉向台商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協助企業打進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消费過程。

- (三) 持續推動臺灣精品在大陸的品牌策略，特別是鼓勵外貿協會針對大陸所展開的相關商品展與促銷活動。
- (四) 為了因應更多中產階層到臺灣消費，建議政府簡化在台購物之大陸民眾相關的退稅作業。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Charles Taylor, 2002, 〈市民社會模式〉, 鄧正來、Jeffrey Alexander 編, 《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頁 1-31。
- 于建嶸, 2010, 《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仇立平, 2007, 〈社會結構與階級的生產 結構緊張與分層研究的階級轉向〉, 《社會》, 2：31-38。
- 王占璽、王信賢, 2011, 〈中國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與場域分析：環保與愛滋 NGO 的比較〉, 《台灣政治學刊》, 15(2), 頁 115-175。
- 王信賢, 2002, 〈經濟改革與政治穩定：中共十六大前的社會分析〉, 《中國事務》, 10：5-21。
- 王信賢, 2006, 〈中國大陸國家權力與社會運動分析〉, 《政治學報》, 40：85-114。
- 王信賢, 2008, 〈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 《中國大陸研究》, 51(3)：37-58。
- 王信賢, 2010, 〈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變與常：以環保組織的發展為例〉, 《政治學報》, 49：1-39。
- 王信賢、李宗義, 2008, 〈尋找中國 NGOs：兩種路徑與困境〉, 《社會科學論叢》, 2(2)：113-145。
- 王建平, 2007, 《中國城市中間階層消費行為》,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2002，〈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戰略與管理》，3：27。
- 王漢生、吳瑩，2011，〈基層社會中「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國家：發生在一個商品房小區中的幾個「故事」〉，《社會學研究》1：63-95。
- 田蕊、馮文華，2010，〈論中國新中產階層的消費主義精神〉，《大連海事大學學報》，9(1)：94-96。
- 朱凌，2006，《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海口：海南出版社。
- 何雨、陳雯，2010，〈藍領中產階層及其在轉型期城市中的孕育〉，《上海城市管理》，3：51-55。
- 吳同、文軍，2010，〈自我組織與遵紀手法：工人依法維權的集體行動策略—以上海 sns 企業工人抗爭為例〉，《社會》，30(5)：121-141。
- 吳忠民，2005，〈中國社會公正的現狀與趨勢〉，《江海學刊》，2：82-88。
- 吳曉剛，2009，〈1990-2000 年中國的經濟轉型、學校擴招和教育不平等〉，《社會》，29(6)：60-84。
- 李友梅、孫立平、沈原編，2006，《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理論與實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春玲，2003，〈中國當代中產階層的構成及比例〉，《中國人口科學》，6：25-32。
- 李春玲，2005，《斷裂與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証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春玲，2008，〈中國中產階層的增長及其現狀〉，《江蘇社會科學》5：68-77。



- 李春玲，2011a，〈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狀況〉，《黑龍江社會科學》，12：75-87。
- 李春玲，2011b，〈中產階級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方式〉，《廣東社會科學》4：210-218。
- 李春玲，2011c，〈尋求變革還是安於現狀：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測量〉，《社會》，2：125-152。
- 李培林、李強、孫立平編，2004，《中國社會分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培林、張翼，2008，〈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認同和社會態度〉，《社會》，28(2)：1-19。
- 李強，2001，〈關於中產階級和中間階層〉，《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17-20。
- 李強，2004a，《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強，2004b，《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瀋陽：遼寧社會出版社。
- 李強，2005，〈關於中產階級的理論與現狀〉，《社會》，1：28-42。
- 李煜，2009，〈代際流動的模式：理論理想型與中國現實〉，《社會》，29(5)：88-113。
- 李路路，2008，〈中間階層的社會功能：新的問題取向和多維分析框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4：125-135。
- 李路路、王寧，2008，〈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存在：階層認知與政治意識〉，《社會科學戰線》2008(10)：202-215。
- 李路路、王寧，2009，〈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存在：社會生活狀況〉，《江蘇社會科學》，2009(1)：34-40。

-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異類：當代中國城鎮中產階級的類型化分析〉，《社會學研究》，6：15-37。
-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曉，2009，〈市場轉型與單位變遷：再論單位研究〉，《社會》，29(4)：1-25。
- 李路路、邊燕杰編，2007，《制度轉型與社會分層：基於2003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李漢林、魏欽恭、張彥，〈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結構緊張〉，《中國社會科學》，2：121-143。
- 沈原，2006a，〈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23-25。
- 沈原，2006b，〈「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5：1-25。
- 邢占軍，2011，〈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感關係的研究〉，《社會學研究》1：196-219。
- 周志家，2011，〈環境保護、群體壓力還是利益波及：廈門居民PX環境運動參與行為的動機分析〉，《社會》，31(1)：1-34。
- 周曉虹，2010，〈全球化、社會轉型與中產階級的建構—以中國為對象的比較研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49：61-69。
- 周曉虹編，2005，《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宗弘、吳曉剛，2010，〈中國的制度變遷、階級結構轉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會》，30(6)：1-40。
- 俞可平，2006，〈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中國社會科學》，1：109-122。
- 施芸卿，2007，〈機會空間的營造：以b市被拆遷居民集團行政訴訟為例〉，《社會學研究》，2：80-110。
- 紀碩鳴，2006，〈人民代表競選人代表〉，《亞洲週刊》，20(34)：10-11。

- 孫立平，2004，《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孫立平，2005，《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孫立平，2008，〈利益關係形成與社會結構變遷〉，《社會》，3：12-14。
- 孫立平，2011，〈走向積極的社會管理〉，《社會學研究》，4：22-32。
- 桂勇，2007，〈鄰里政治：城市基層的權力操作策略與國家—社會的黏連模式〉，《社會》，27(6)：102-126。
- 康曉光，2002，〈未來 3-5 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3：1-15。
- 張沁潔、王建平，2010，〈行業協會的組織自主性研究：以廣東省級行業協會為例〉，《社會》，30(5)：75-95。
- 張宛麗、李煒、高鴿，2007，〈現階段中國社會新中間階層構成特徵研究〉，《北京工業大學學報》，7(2)：11。
- 張執中，2008，《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出版社。
- 張磊，2005，〈業主維權運動：產生原因及動員機制—對北京市幾個小區個案的考查〉，《社會學研究》，6：1-39。
- 張靜，2010，〈社會身份的結構性失位問題〉，《社會學研究》，6：41-57。
- 張翼，2008，〈當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中國社會科學》，2：117-131。
- 張歡華，2007，〈國家社會主義市場轉型：問題與爭議〉，《社會》，27(6)：54-79。
- 曹海濤、葉日崧，2008，〈中國大陸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1(1)：31-63。
- 許抄軍、許曉運、魏宇，2005，〈我國勞動力閒置的深層次原因及解決措施〉，《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36-37。

- 陳光金，2011，〈中國私營企業主的形成機制、地位認同和政治參與〉，《黑龍江社會科》，124：63-76。
- 陳那波，2006，〈海外關於中國市場轉型論爭：十五年文獻評述〉，《社會學研究》，5：188-212。
- 陳映芳，2006，〈行動力與制度限制：都市運動中的中產階層〉，《社會學研究》，4：頁 1-20。
- 陳映芳，2010，〈行動者的道德資源動員與中國社會興起的邏輯〉，《社會學研究》，4：50-75。
- 陸益龍，2008，〈戶口還起作用嗎？戶籍制度與社會分層和流動〉，《中國社會科學》，1：149-162。
- 陸學藝主編，2001，《當代社會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陸學藝主編，2004，《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陸學藝主編，2010，《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陸學藝編，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陶慶，2004，〈嬗變、缺位和彌補：政治安排中私營企業主利益表達——皖南宣城市實證分析〉，《社會科學研究》，6：99-104。
- 游華奎、李純純、羅荀新，2010，〈試論我國當代中產階層的現狀與作用〉，《社科縱橫》，2010年12月，頁24-25。
- 馮仕政，〈重返階級分析？論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範式轉換〉，《社會學研究》，5：203-227。

- 馮仕政，2007，〈沈默的大多數：差序格局與環境抗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122-132。
- 黃榮貴、桂勇，2009，〈互聯網與業主集體抗爭：一項基於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會學研究》，5：29-56。
- 楊文鐘，2004，〈大陸勞動環境對工廠管理的影響之研究—以食品包裝製罐業為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葉曉楠，2007，〈中國新社會階層引起關注〉，人民日報（海外版），2月13日，版1。
- 葛楠，2010，〈當前我國社會中間階層的現狀分析〉，《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4：56-57。
- 鄔曉霞、祝爾娟，2011，〈人均 GDP10000 美元後經濟社會發展特徵的國際經驗借鑑及對北京的啟示〉，《開發研究》，1：19-22。
- 管兵，2010，〈維權行動和基層民主參與：以 b 市商品房業主為例〉，《社會》，30(5)：46-74。
-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1999，〈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收錄於涂肇慶、林益民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35-56。
- 齊杏發，2010，「當前中國中產階層政治態度的實證研究」，《社會科學》，8：3-11。
- 劉平、王漢生、張笑會，2008，〈變動的單位制與體制內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國有企業為例〉，《社會學研究》，3：56-78。
- 劉能，2004，〈怨恨解釋、動員結構和理性選擇—有關中國都市地區集體行動發生可能性的分析〉，《開放時代》，4：57-70。

- 蔡昉，2010，〈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路易士轉捩點〉，《經濟研究》，4：4-13。
- 鄭輝、李路路，2009，〈中國城市的菁英代際轉化與階層再生產〉，《社會學研究》，2009(6)：65-86。
- 鄧正來，2002，〈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收錄於鄧正來、Jeffrey Alexander 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77-100。
- 蕭文濤，2001，〈中國中間階層的現狀與未來發展〉，《社會學研究》，3：93-98。
- 譚瑞、宋基弘，2008，〈中國的中產階層消費者在哪裡〉，《商學院》，2008(12)：82-83。
- 邊燕傑主編，2002，《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市：三聯書店。

## 二、英文部分

- Andrew G. Walder.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1060-1073.
- Andrew Walder. 1995.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rchon Fung. 2003.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ories, Hopes and Re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515-539.
- Bourdieu, Pieere. Richard Nice trans.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lter, Tim and Mike Savage, eds, 1995.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 London: UCL Press.
- Chen, Jie and Chunlong Lu. 2006. "Does China's Middle Class Think and Act Democratically?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toward Urban Self-Govern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1(2): 1-20.
- Cheng Li, 2010.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David Stark and Laszlo Rruszt.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ik Olin Wright. 1985. *Classes*. London : Verso.
- Erik Olin Wright. 1997. *Class Cou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ik Olin Wright. 2000. "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957-1002.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3.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ligstein, Neil and Jianjun Zhang. 2009. " A New Agenda for Research on the Trajectory of Chinese Capitalism. "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DOI: 10.1111/j.1740-8784.2009.00169.x , pp.1-24.

- Gamson, William A. and Davi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sman, Ronald M.. 1995. *The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Netherlands: E. J. Brill.
- Goldthorpe, John H.. 1982."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in Anthony Giddens and Gavin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ssays in honour of Ilya Neustad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ohn H.. 1990. "A Response. " in J. Clark, C. Modgil, and S. Modgil, eds., *John H. Goldthorp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Falmer Press.
- Goodman, David. 1999."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41-261.
- Gordon White. 1993. "Prospect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29:63-87.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van Szelenyi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1082-1096.
- Kerr, Clark, and Frederick H Harbison, and John T. Dunlop, and Charles A. Myer. 1973.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ester M. Salamon. 1994.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 *Foreign Affairs* , 73(4):109-122.
- Li, Cheng. 2010.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 Li, He. 2003. "Middle Class: Friends or Foes to Beijing's New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 8(1&2): 87-100.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 69-105.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Lowell Dittmer and Lu Xiaobo. 1997.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Danwei: Macr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Micropolitical Change." *China Studies*, 3:115-122.

-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663-681.
- Nee, Victor.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3):267-282.
- Nee, Victor.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908-949.
- Parish, William L. and Ethan Michelson. 1996. "Politics as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1042-1049.
- Petrova, Tsveta, & Sidney Tarrow. 2007. "Transactional and Participatory Activism in the Emerging European Polity: The Puzzle of East-Central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1):74-94.
- Plattner, Marc F.. 1996. "Democratic Moment."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D. Putnam.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43):427-460.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zelenyi, Ivan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1082-1096.
- Szelny,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g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1-2): 63-87.
- Tang, Min and Dwayne Woods, and Jujun Zhao. 2009. "The Attitude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Towards Democrac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1): 81-95.
- Tang, Min. 2011.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4): 373-387.
- Walder, Andrew G. Bobai Li, &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e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Walder, Andrew.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1060-1073.
- William L. Parish and Ethan Michelson. 1996. "Politics as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1042-1049.
- Wright, 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 .

Yang, Dali L. 2007. "Chinas' long march to freedom. "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 58-64.

Yi Wen, 2011, "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xcessive Foreign Reserv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Series*.

### 三、網路資料

中共中央，2006，〈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

江迅，2006，〈李凡：中國選舉須公正公平公開〉，多維新聞網：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11\\_27\\_0\\_5\\_28\\_987.html](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11_27_0_5_28_987.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0 月 30 日。

江逸之，李雪莉，2010，〈消費大軍（2）年年加薪，買筆電如買菜〉，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40952>，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20 日。

何永紅，2006，〈中國選舉制度的現狀與趨向——法律實證分析的視角〉，法律教育網：

<http://chinalawedu.com/news/15300/157/2006/4/li71915580111460028250-0.htm>，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0 月 30 日。

- 余美慧，2010，〈大陸新興中產階層消費力受重視，車廠推低價搶市〉，理財網財經資料庫，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a9987bbd-39c5-4045-9327-020e9187af38>，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11 月 10 日。
- 金正平，2011，〈中產階層帶動大陸時裝起飛 BCG 估今後 10 年市場大上 2 倍〉，理財網財經資料庫：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983dd4f3-342f-453e-9296-b85972fd73e6>，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9 月 30 日。
- 林怡婷，2011，〈中國大陸大舉投資黃金實物〉：  
[http://www.wtocom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14817](http://www.wtocom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14817)，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11 月 9 日
- 林芸，2011，〈中國已快速邁向豪華消費時代〉，上海汽車報：  
<http://auto.ifeng.com/buycar/leadbuy/20110106/506560.s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
- 國家統計局，2007，〈中國約 8000 萬中產階級〉，大公網：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7/12/28/ZM-843573.htm>，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9 月 3 日。
- 張厚義，2008，〈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成長過程中的政治參與〉，中國社會學網，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gz/shgz42/P020080218335108758352.pdf>，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9 月 27 日。
- 張潔平，2008，〈零八憲章展現憲政運動新旗幟〉，亞洲週刊電子雜誌：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184216972/51ae2.cfm](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184216972/51ae2.cfm)，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8 月 25 日。

- 彭志平，2007，〈大陸基層民主升溫 制度成痼疾〉，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Print/0,4634,110505x112007070800058,00.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0 月 30 日。
- 黃文章，2011，〈《農產品》大陸玉米需求增加引起關注〉，理財網財經資料庫，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C9177DEC-87EF-45C2-B135-210AAA5D5A1D}>，檢索日期為 2011 年 11 月 10 日。
- 董偉，2011，〈社科院：2015 年前中國或成全球最大精品市場〉，中國青年報：  
<http://big5.workercn.cn/finance.workercn.cn/c/2011/06/20/110620071849178355106.html>，檢索日期於 2011 年 10 月 8 日。

## 附錄一 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之研究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與會人：王占璽、王信實、王信賢、李宗義、林宗弘、寇健文、張弘遠、張執中

會議記錄：邱韋智、黃奕鳴、楊將傳

議程：

- 一、 中國大陸「中產階層」興起的機制與現象分析
- 二、 「中產階層」對中國的影響
  - (一) 對中共思想理論的衝擊與政治影響
  - (二) 對社會的影響（含社會組織與社會抗爭分析）
  - (三) 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 三、 「中產階層」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中的角色
- 四、 「中產階層」興起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座談重點

- 一、 林宗弘認為中產階級應該採取狹義的定義，也就是在私部門工作擁有技術資產和組織權威的人。
- 二、 林宗弘的研究指出中產階級經濟上重要性上升，但政治上中產階級對民主的影響仍存疑。
- 三、 王信實從消費面探討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規模有多大。
- 四、 私營部門的中產階級將較為保守支持現有秩序，近於幹部集團，與私營企業家也相近。
- 五、 中產階級有沒有可能出現自主的政治意識？

六、王占璽認為突發性的風險與災難事件有可能是中產階級採取集體行動的觸媒。

社會不公平的事件（例如拼爹現象）有可能成為引發中國大陸不安的因子。

會議討論（依發言順序）：

王信賢（開場介紹）：

關於大陸中產階級研究領域，邀請數名專家參與討論：寇健文，菁英政治專家；王信實，專長產業經濟、財務理論，以經濟學角度觀察大陸；林宗弘，研究社會階層化；王占璽。會議主要討論方向為，目前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真的興起了嗎？機制為何？影響？未來的發展？

林宗弘：

以自身研究經驗與各位分享。本身研究處理階級結構及分析中產階層的數量，投稿經驗顯示，「階級」在中國為敏感詞語，例如私有化變為民營化、資本主義變為市場經濟等詞語調整。以 CGSS 資料（排除 2008 年的數據）估計大陸的中產階級，先做切割再看數據，顯示每一次數據都不同，難以界定。

本身曾發表相關議題之文章，文章中界定中產階層的方式：擁有技術資產和組織權威在私部門工作者為新中產階級，屬於較狹義的定義。然而如果從收入面來看，會把國有部門的成員也吸納進來，但他們的行為模式會和私有部門不同，這是研究原意不願納入的範圍，因此採取較狹義的定義較為適合。



以研究定義抽樣調查發現 88 年以來的差異極大，但中產階層人數及收入確實在上升，約佔全國的 4~9%（王信賢：曾看過以消費來定義中產階層的文章，約占 35%）。消費信用額度不足，有所限制，所以難以從消費去定義，於是用管理權來看，有雇用人員者及有管理人的行為者方符合標準。

研究結果單薄但重要，數據的上升（寇健文：哪一方面的重要性上升？），經濟上重要性上升，但政治上中產階級對民主的影響仍存疑。新中產階級對共產黨滿意，所以沒有成為民主化的動力（王信賢：是不是如同李路路的觀點，因為新中產階級是保守的，且與共產黨有掛勾，所以不會成為民主化的動力？；寇：相同觀點），國家幹部認可平等的觀念，但新中產階級並不太認可平等的概念。

王信賢：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問題確實敏感，但近來社會力量增加，中共當局面對的壓力也確實增加（因為茉莉花革命）。

王信賢：

經濟學家的角度比較不會去界定是否為私營，是否在制度面提供誘因（是否能激發制度內各體的動力）及保險（風險，在面對不確定性時能有一定保障）更為重要，雖然兩者為緊張關係，且改革開放以來兩股力量不斷對抗。誘因的激勵是否能讓個體努力去工作，如此誘因制度才發揮作用，例如台灣的三七五減租、大陸的包產到戶等。生產力釋放的關鍵在於所有權（產權），這與市場經濟密不可分，制度是否能保障努力所得的回報，若否則沒有動力。

從消費面、總體 GDP 的組合來檢視中產階級，2009 年大陸 GDP 為 3600、台灣為 16000，同年大陸購買力為 1600，台灣為 30000。GDP 在不同階段，消費者的需求會變化，GDP 在 1000 以上消費品會多樣化、3000~6000 會對代步工具有強烈需求（去年大陸超過 18000 萬輛），消費條件提升。

十二五規劃擴大內需就需要中產階級這個消費族群，中國大陸分為三區塊，一四八，一為金字塔頂端，四為四億內需市場，八億為底層人口。內需與中產階級消費之間的連結非常重要。從消費的角度來看，穩定的消費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中產階級興起但在政治參與中並沒有像台灣一樣拿到主動權。

**王信賢：**

過去研究發現 GDP 超過 3000 後出現民主化現象，中產階層除了消費外還關心政治影響。

**寇健文：**

觀察中產階級的特徵，宗弘的區分方式較有意義，（從陸委會的角度看）私營部門對政治民主重要性較高，國家幹部為利益集團，不能期望他們對民主政治有興趣。但中產階層對民主化的需求也有疑慮：

1. 私營部門較為保守，支持現有秩序，近於幹部集團，與私營企業家也相近。
2. （李路路觀點）也許這些私營部門沒有強的意識，但有共同的利益。至少已擁有的東西不允許被剝奪，若利益受傷害就會發聲，例如三鹿奶粉事件中趙連海就站到政府的對立面。

社會學者認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與民主國家不同(與台灣威權時期也不同)，體制會制約中產階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現有的秩序下中產階級利益受保障，不易出現反對意見；即使中產階層利益真的受損，也必須看國家運作是否出錯，若否，中產階層也不會造反。

**王信實：**

努力是否換來收穫以及是否能被保障？若努力成果無法有回報，會去影響本身利益，就連國企內幹部也會從同樣角度思考此問題。中產階層會不會在越來越富有後，思考的方向又會改變，突破原來滿足於現狀的思考？在外界的影響下，藉由網路來瞭解外界的世界，開始出現自己的意識，出現比較的心態。

**寇健文：**

未來的事難以預測，可能會改變也可能否。但在預測的時候，必須注意到中國大陸與他國相異之處。例如美國為台灣民主的源頭，台灣的統治者(威權時期)從未反對民主政治，但大陸明確反對西方的三權分立。

**王占璽：**

本身做社會組織及社會抗爭之研究，切入主題前與各位分享一些在中研院一個開放性演講中的數據。世界奢侈品消費協會認為 2007 年中國有奢侈品消費能力的族群約占 13%；2009 年政協常委會提出一個數據，中國 4%的人口擁有 70%的財富；亞洲銀行統計，中國有 8.17 億中產階層(約占總人口的 60%)，界定的標準是每天消費人均約 20 美元，但這是以消費來定義，以 20 美元來計算，其實和台灣每

的最低工資差不多，其中有 3 億隨時會回到底層；中國商務部估計中國每天收入低於 1 美元的人數約 1.5 億。我思考的方向是中產階級到底在想什麼？反映什麼思維與行動？社會學角度中社會風險的觀點，包括對於安全的不信任，理應享受的東西可能隨時被拿走，應該保障的東西未被保障，災難性事件對於生活的不安全感等，中國大陸十年來事件不斷再發生(疾病、交通意外、上海大火等)，國家應該提供的公共財未能提供。是否顯示人在有一定經濟地位後才會顧慮是否安全？例如趙連海會去買三鹿奶粉，就有一定經濟能力，住房、交通的安全與風險亦同，在一定政治效應存在的前提下，才開始會去追求。中層階層位於社會中階，有一定消費能力，但又完全無法用經濟能有政治力迴避掉所有風險。這群人在大環境下會有什麼樣的思考取向？例如災難性事件後網路上的意見表達。前年山西疫苗安全事件，經媒體報導成為全國性議題（寇健文：是哪些人的小孩被注射），有經濟能力者，疫苗為自費，經過媒體便為全國性議題後，有經濟能力打疫苗的人開始會關心。（寇健文：什麼樣的媒體），揭黑媒體（中國經濟時報），（林宗弘：有訪問過嗎？），王克勤似乎成為民間領袖的角色，各大入口網站都為此事件成立專屬網頁，在輿論界有一定效應存在。疫苗安不安全為一管控事件，此議題被媒體型塑為山西衛生廳與廠商勾結，衛生局下來做解釋。中下層的官員也會在意此議題。貪腐也開始在災難性事件後成為大眾關心的對象，政府是否能有廉潔制度題公共保障。汶川地震後，國內外企業捐款，有些企業捐款大眾覺得過少（王信實：大陸首富捐太少、眾人：王石），角色認知的框架，怎麼看別人，別人怎麼看自己。觀察不到內部如何思考，但看得到意見凝聚的過程。體制會制約，但不代表他們不期待，他們不一定期望民主，但期待穩定的秩序，民主可能是其中一個管道。微觀角度：去

累積他們的想法。從趙連海事件可以得知，學歷在高中以上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社會抗爭的組織能力非常強、持續力也是，不一定是追求單一事件的解決，可能是要政府或廠商的道歉，這種人出現會成為該類型抗爭的能量中心，能後和各界對話，有資源及動員基礎，有異於烏合之眾的抗爭，他們是抗爭中的重點人物，現在要觀察意識與行動之間連結的趨勢。政治效能感低落與追求公共保障之間的效應，是中產階級的觀察重點。

王信賢：

占璽談的是中下階層，例如廈門PX事件、上海磁懸浮的業委會抗爭等，這些運動中開始有理念出現。

張弘遠：

期望解讀中產階級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例如專業知識養成後治產能力來源為何？是否受保障？能夠成為中產階層的原因為何？如果從社會關係、社會流動來觀察，又會有什麼變化？大陸中產階層有多少人是透過上一代的庇蔭而成為的？這些人會維持社會穩定還是衝撞體制？這就是拚爸拚爹現象。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看，例如一位社科院研究者透過所有關係將女兒送入國營銀行，這種人在研究中占多少比例？這種人還是會捍衛既有秩序。大陸中產階級到底是穩定還是流動的現象，因為他們還是在一個無法定義的狀態。DAVID WRIGHT 的定義，概念是在硬套。假設他們是穩定的，他們是大陸政治社會體制中是穩定還是風險的主要來源？

**王信賢：**

拚爸或拚爹現象下成為中產階層者，這群人是否穩定？對於社會扮演什麼角色？

**寇健文：**

討論一下拚爹現象。進入國企真的不容易，副部級關說還不一定有用，正部級官說才有用，反映出社會上的不公平，社會流動是停滯的。已進入中產階層的那群人是安定來源，因為他們是受益者。大陸交換生反應，社會的不公平並不是從大學開始，在中學就已經出現。也許這與中產階級無關，但是無法進入中產階級，是不穩定的來源。

**王占璽：**

靠父母庇蔭者是如此，那不是的人會如何看待他們？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參加過革命實驗研究院的人在他人眼中從優勢變有問題，有些人就是為了得到資源成為黨員，東吳政治系較具綠色色彩就會批判國民黨，他人就會認為這樣符合民主的意識。大陸的中產階級的批判就是如此，在大眾化的網路論壇掛個兩天，只要跟這個邏輯有關的，就一定會被罵翻。衝突朝向和諧對抗特權，明顯能夠感受到，網民的交流也是視為政治正確的來源。他們是否是發動變革的那群人？扮演什麼角色？既得利益者是否為保守的？態度如何？中產階級是流動或穩定？是自在階級還是自為階級？又是什麼時候成型和凝聚？

張執中：

2007 年統戰部新社會階層，國家統計局統計 2007 年中產階級約有 8000 萬，在公部門內工作者是納入的。如果只是算個體的話，一個家戶內有不同組成，對於意識會不會有衝突的現象？杭亭頓的界定模糊，意識產生非常困難，會成為現有體制的支持者或反對者？

林宗弘：

中產階級約有 8000 萬的數據與自身研究相近，在一億上下是合理的，如果是四億的話則是高估，從技術和資產或管理面來看，這樣的數據是合理的，基本上不會超過兩億。

（回應張弘遠）關於社會流動與穩定，國有單位成為資本家（公私營難以界定），但可視為資產階級的群體。本來就在國企內的工程師，掉出國企體制外才是中產階級。若有能力留在國企，就不算是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是穩定的來源。公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差異，他們的意識型態不同，公有部門內的有政治資本留在公部門內，私部門則無。2003~2008 年中產階級是保守的，但 08 年後就變得比較不明顯，災難性事件使社會浮躁，這些風險是社會的突破點，他們對風險的看法不一樣，表達意見的方式更有趣。對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失去耐心。溫州、上海動車事件，中產階級較會使用各種方式表達意見，有利於觀察他們的反應。BBC 對於相關報導及評論，標題為「和諧號事件讓中產階級感受到了恐懼」，來源為政府治理的失靈，顯示出中產階級開始浮躁了。（王信賢：會切 08 年的原因為何？是不是因為 08 發生很多重大事件如川震、金融海嘯）奧運是個時間點，還有各個事件，訪談經驗也是看到 08 年後不相同，大家對於生活更為關心，若政治不動這些治理領域就不會透明化。

王占璽：

政府提供公共財與體制相關，單位不再是社會的基礎。現在社會已經意識到單位不再扮演重要的服務角色，但政府仍無法不提供公共財，社會大眾已經透過繳稅購買服務，政府無法拒絕。公務機關內人員的態度，在政府內的層級的下層是否支持共產黨有討論空間，中央部會較地方同地位者資源多很多，但地位感受不高。地方官較有地位感受，但中央則沒有太高地位感受。從政府機關內的觀察，政府機關內的人員認知到在國家體制內沒有什麼發展前景，到私部門反而憑著自己的資本夠有未來性。政治資本可以換取經濟資本，但有經濟資本換取政治資本則不一定穩定，所以最重要的還是政治資本，政治資本少的人如何看待多的人？

王信實：

人力資本是透過教育及人際關係累積，政治資本是透過管制、競租行為來管理，一旦有了這樣的制度後，剛剛討論社科院研究者透過所有關係將女兒送入國營銀行的例子，老爸弄到這樣的位子，女兒要不要接受，幾乎一定接受。如果不是幹部的女兒當然覺得不公平，但如果是，就算覺得不公，也一定會接受。從前從事社會運動國外留學回國者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有了小孩、穩定的工作，不會再從事社會運動，這就是扮演的角色改變。BBC 的觀點是想探究這些重大災難性事件背後的成因為何？溫州和上海事件背後的廠商是同一家公司，得出這個不透明的體制有競租行為的發生。中產階層是否會有意識遇打破這個體制？



**張弘遠：**

政府從公共事務的管理已經進入一個臨界點，處理績效慢但又不開放給民營，開始出現一些磨擦，公共治理能力衰退，可以觀察是否會有激進的改革出現。太子黨的權力傳承是否能發揮穩定的功能，究竟是會唾棄過去的遺產，還是身為既得利益者而維持體制也值得觀察。

**王占璽：**

十八大後薄熙來可能是不穩定的來源，中產階層基本上受到上下階層未變化而鎖死，十八大後為中產階層改變的時間點，胡錦濤新社會管理、深化管理改革等。但現在中國人民不是黨拿什麼他們就要什麼，共黨也知道，長時間內觀察中產階層面對來自社會階層後有何變化。現在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為秩序的鞏固者，現存秩序是否是最好鞏固利益的方法，會不會改革更好的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弘遠：就像俄國普丁的改革？），是，也有歷史涵養，會觀察。

**王信賢：**

薄熙來的倡紅打黑並不被同階層認同，反而是獲得下層的政治市場。

**李宗義：**

中國大陸市場轉型改革的輸家是誰？就目前觀察至此輸家尚未出現。中國大陸社會的不滿沒有產生，是否大陸市場夠大，能夠讓所有人都成為贏家？現階段社會流動已經僵化，下一步的改革不會讓輸家出現，而是讓贏家越來越少，相對的輸家就真的出現。中產階層什

麼時候能把共產黨換下？首先經濟要先自主，機會結構改變時權力管道是否暢通，網路使得權力（話語權）不再被壟斷，掌握此工具把傳統的權力結構稍微改變，中產階級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做中國大陸民主化研究者，通常是與較底層的人打交道，大家都希望共產黨下台，但為何就是動不了共產黨？有兩派對中產階層民主化期待的看法：李路路認為死氣沉沉；相對地沈原則認為希望很大。

**王信賢：**

社會觀點對社會斷裂過於期待。

**王信賢（結語）：**

感謝專家學者對團隊提供靈感，畢竟團隊訪談和研究時思考較為片段。

## 附錄二 中產階層興起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影響訪談紀錄

編號：2011083101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

### 當前社會結構

中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造成階級流動的固化，形成一個相對不流動的等級社會，孫立平教授稱此為「新總體性社會」。不同於過去的極權體制，新總體性社會的黨國體制是以市場為基礎，市場所開發出來的機會結構被固定的利益集團所把持，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論是在上的等級或在下的等級，兩者都有往前的動力，而這兩股力量的矛盾與拉扯就成為中國社會不穩定最主要的潛在因素，而歸根究底這就是一個階級的問題。

### 維持社會穩定與社會力量的吸納

中國的國家（政府）是個普照之光，只要政策不是太壞基本上都可以帶動社會的發展。對於民間社會來說，要如何將無法組織的人組織起來（organize unorganizables）則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譬如說農民工要如何產生集體的行動。在國家強勢而社會相對分散的情況底下，地方可以透過進一步的政策讓大型的工廠產生階級分化，以廣東的工廠為例，核心的工人享有各式這樣的福利及保障，但是邊緣工人卻什麼也沒有。因此，無組織的工人必須自己創造機會，特別是在極端的情況之下，機會往往比較容易浮現，例如動車事件之後，網路上有大量的點擊關注，只要類似的極端情況重複的出現，城市中產階級就會

逐漸找到自己與國家議價的模式。另一方面，國家長期以來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要的目標，但是維持穩定就是「不解決問題」。這樣的策略在最近已經出現改變，因為國家慢慢的體認到與其打壓社會力量，不如吸納妥善利用，或者是提供管道讓社會有發揮的空間。

## 中產階級

從社會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逐漸成形，他們會在偶發事件中凝聚共識，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極端事件，抗爭行為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模式與樣態（pattern），例如幾年前的廈門散步事件，今年（2011年）大連的居民以同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於政府的不滿，最終改變了決策。這樣的現象成為當今中國內部國家與社會關係反覆角力的場合，並且從中顯露出社會改革的契機。然而，政權也同時意識到這些事，而且有計畫的吸納、轉化、分化中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將社會力量為他所利用（例如汶川地震的救災），另一方面是透過一次次事件把國家的權力扎根（grounded）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之中。例如，透過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完全將農村開發，當產權被改造，國家就更深入到社會之中。因此，國家權力與中產階級的社會空間類似零和的拉扯，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之下，會延續下去。

編號：2011083102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

誰可以上清華大學？

根據清華大學 2007-2010 年的新生入學資料發現，各省招生的計畫比例、機會指數的兩極之間相差巨大。北京的招生計畫占全國計畫比例的中位數為 16.23%，而排名第二位的湖北省占 5.14%，比例最低的西藏僅占 0.05%。機會指數方面，北京機會指數的中位數為 15.97，第二位的天津考區為 3.42，排名最後的廣東考區為 0.45。雖然由於北京的生源減少，招生計畫數從 316、296、270 到 243 人有所下降，但其機會指數卻從 14.61、14.76、17.23 到 18.81 繼續升高。可以看出，北京作為首都，考生進入清華的機會優勢明顯。一方面北京經濟發達，教育經費充足、基礎教育水準較高、高等院校集中，歷年的優質高中生源得到了清華的肯定，歷史上充足的招生計畫名額一直延續。另一方面，清華受教育部和北京市的雙重領導，與北京市存在共建協定且得到一定的資金、政策支持，這促使清華在招生計畫上對北京有一定的傾斜。這種招生“偏向”本地的情況在全國許多高校有所體現，例如北京大學 2010 年校本部與醫學院 3280 名的招生名額中，北京考生的錄取計畫是 635 人，遠多於在其他省份，而西安交通大學每年在陝西省的招生數也占招生總數的 30% 左右。

**入學保護造成城鄉差距擴大與固化**

清華大學的生源結構呈現出很嚴重的城鄉差距與區域差距，這種情況主要受到高考保護主義、城市化以及入學管道多元的影響。首

先，戶籍制度與高考的掛勾，讓所有的高中生都必須回到自己的戶籍地參與高考，這讓高海所帶來的地域流動顯得更加困難。其次，家庭背景、自主加分等因素也深深影響到高校的生源。清華的新生中每年有約七分之一是保送，有七分之一獲得自主加分，這些先天條件的不平等，讓高考做為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已經「幾乎」不可能了。以上海為例，復旦大學的生源有 70%來自於上海。即便政府有意識到這件事，也透過一些方式來進行矯正與彌補（例如少數民族加分），但整體的效果有限，整個入學體制已經將將社會流動固化，讓無法出頭的人更無法出頭。

### 僵化造成的不滿

當向上流動之路被體制關死，年輕人就慢慢顯示出對社會結構的不滿，並且走向極端採取較為激烈的抗爭方式。這種情況目前雖然未大量浮現，但是社會不滿的情緒卻逐漸累積，有可能在一次偶發事件中爆發。

編號：2011090101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

### 中產階級存在與否？

從主觀與客觀看來，中國社會上就是有這樣的位置，也確實有人填補在這個位置之上，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有沒有形成一個階級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受訪者提到 2008 年曾經《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發表了一篇探討中國中產階級的文章，原本要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但因為主編認為比較敏感所以後來未發表。這篇文章處理了兩個問題：第一，從中產階層在社會等級結構中的矛盾位置解釋多維特徵的結構基礎，第二，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條件下中產階層會彰顯出特定的功能特徵。從這兩點來看，社會上的中產階層之所以沒辦法稱做一個階級，在於這一批教育水準與經濟收入的人，有沒有一個共同的階級意識？他們有沒有辦法採取一致的行動？不論從文化解釋（中產階層來自於教育）或市場解釋（中產階層來自於市場經濟的勃興）都無法合理地解釋中產階層所彰顯出來的第三種社會功能特徵，即「依附性」，以及中產階層社會功能的轉換。

受訪者認為「依附」是指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中間階層作為一相對獨立的階層或群體存在，但是，它們沒有相對獨立的作用和行為，而是依附於某一個社會階層或利益集團，特別是某種威權主義的政體。所以，中國的中產階層雖然從主觀與客觀意義上雖然存在，但是他們並非具有自主意識的行為主體，而是依附在國家政權底下，大部分的行為都是在回應國家對社會的統治與控制，而不是主動改變國家的治理行為。

## 政府對中產階級的警惕

即使如此，政權對中產階級的形成及壯大一直都充滿著警惕。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來源可以分成體制內與體制外，特別是城市的菁英，一是透過擁有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本的上一輩進行「階層再生產」，另一方面則是有部分的人士來自於市場經濟深化過程中所達成的代際轉換，中產階級的來源不同，就會產生相對獨立的利益。因此，雖然中產階級的內部的利益分化相當嚴重。

中國大陸與其他社會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其中產階級的形成是從「社會主義體制」出發，因此欠缺組織化的基礎，沒有宣傳沒有組織，所以大部分的抗爭終流於騷亂（riots）而無法變成社會運動，欠缺領袖與策略，只能在混亂中發出怒吼而無法形成具體的訴求。政府對這樣的情況有一定的瞭解，只是對於事情的客觀變化沒有足夠的認識，因此政府回應中產階級的一切做為都是「加強控制」。

## 國家與社會體制的不相容

中國階層化和市場化的社會已經確定，這樣的社會與一黨專政的國家在運作邏輯上是很難並存的，這也是中國政府在未來一直是個很大的挑戰：「全能政府」要如面對利益關係的市場化？但是，中國是一個從權力（power）走向權利（right）的社會，雖然市場改革已經三十年，但是市場的結構基本上還是個權利結構，弱勢只會不斷被壓迫。市場經濟的優點，平等，並不為國家所接受，因為這必須要做到給工人保障，避免有一方獨大，但是國家在追求平等上很難做到。所以，受訪者還是強調，單一政黨（一黨獨大）的體制與市場化、階級化的社會是不相容的，因為它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現在看來有一個新富階級與黨國逐漸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利益集團，並且形成一股穩定社會的力量。但是從學理上來看，這樣的社會肯定無法持久。因為新富階級與黨國體制的結合必然造成一個「無效（率）的社會」，而一個無效的社會是不可能永遠運轉下去的，所以現在用來穩定社會的利益集團關係必然無法持久。

### 中產階級議題的敏感性

中產階級議題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特別是年初茉莉花革命之後，「公民社會」不能談、「中產階級」不能談，普世價值也不能談，就連原本所提的社會建設也改能社會管理創新。2008年地震之後，中國公民社會的確有一段時間看到了契機，但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非政府組織現在聽從政府，但無法保證他們永遠都會聽政府的話，所以在近來對於社會的控制的確是比較緊張。如此強大的政權體制，既不受監督，也不受其他人的制約，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透過公開、透明化來制約國家的權力，甚至必須依靠領導人的自覺才有可能朝向一個比較良性的方向來發展。否則，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永遠無法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而利益集團化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從這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的發展很難樂觀的看待。

編號：2011090102

地點：中央編譯局

### 中東巨變與中國政治體制變遷

從今年（2011 年）年初開始的中東巨變（茉莉花革命）將帶領更多的非洲國家走向民主化的道路，這股效應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之間將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

此次中東巨變很有可能向南傳導到其他非洲國家。除了北非阿拉伯國家的其他非洲國家中，有 16 個國家在超過 15 年時間裏由某個個人或家族統治。16 個國家與此次發生巨變的中東國家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即政治上長期封閉，經濟上普遍貧困，失業率高。由於它們的民族和宗教成分比阿拉伯國家複雜，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比阿拉伯國家低，民眾的國家認同較低，在短期內相對難以採取集體行動反對統治者。但是，在未來 10 至 15 年內，這些國家很有可能發生政治巨變。

面對這樣的情勢，中國政府應當居安思危，在問題還比較小、條件還比較有利的情況下，主動採取有效措施，防患於未然。尤其應當在當前的制度框架內採取措施，大力提高人民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度。例如，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直接選舉，應該提倡和鼓勵公民個人自薦為候選人，提倡和鼓勵候選人之間展開競爭，讓群眾自由投票選舉人民代表。不要害怕讓那些愛挑地方政府刺的人當選。村級幹部的選舉實施了將近 20 年，取得了良好效果，應當儘快提升到更高層級，創造容許和鼓勵縣鄉官員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制度框架，增強人民對地方官員的監督。

然而這都只是賴教授個人的見解與政策建議，實際的發展還有待政府對於自身體制漏洞的體認。

### 從溫州動車事件看中國社會力量

中國是一個不習慣有反對聲音的政府，但是從動車事件來看，中國政府的表現是有回應的政府（responsive government）。溫州動車事件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換人，其次是成立調查組，最後則是將鐵道部的人排除在調查組之外。另外，動車事件之後網路上的成千成萬的回應也顯示出，中國政府在管制網路所顯示出來的無力感，因為網路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產業鍊，關係到中國整體的經濟成長，所以根本無法收緊。從這個角度來看，黨國體制無法阻止環境的改變，而是只能適應環境的改變。社會對於民主的需求，已經透過動車事件很清楚的表達出來，民眾所塑造出來的環境將會制約黨國體制的改革。黨政如何劃分比較簡單，但是國家與社會如何劃分才難。